

冊手迅 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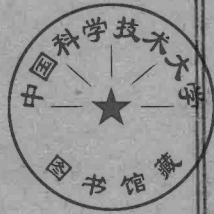
校編仁聚曹

行印局書覽博



魯迅手冊

鄧珂雲編
曹聚仁校



博覽書局印行

三十八年九月廿七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魯迅手冊

定價十一元

外埠酌加匯水運費

編輯者 鄧 珂 雲

校訂者 曹 聚 仁

發行者 博 覽 書 局

上海林森中路五九九號

發行人 陳 三 洲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再版

劫後重版前記

曹聚仁

二十六年夏天，我着手寫述魯迅先生評傳，珂雲替我整理史料。她那時候編次中國文藝辭典初稿，對於搜集、整理、編排的工作，非常純熟；魯迅先生的史料，給她一整理，就很有頭緒。恰巧書店要這部稿子，我們就商量定了「魯迅手冊」這樣一個名詞。書既發排，而人一事戰事發生，市場一切都已停頓；印刷所却已把稿排了出來，珂雲也把校樣都弄齊全了。我卻已上了戰場，作隨軍記者的工作，已無暇顧及這些小事；而且我料想這部書的命運一定不會好，因此，答應寫的前記都沒動筆；連珂雲所寫的「一個女孩子眼中的魯迅先生」，也放在行篋中，沒仔細看過。戰局突變，我軍自淞滬引退，這部書本已不必出版了。我們離開上海以後，陷區情形，完全隔膜；書店方面，却依舊印了出來，而且用「曹聚仁編」的字樣，這更加這部書的厄運；出版不久，敵方就來搜抄，全部存書，都被燒毀，流行在外面的，不過二百餘本。

現在，我們的敵人倒下去了，這部書，也從黑牢中解救出來了，所幸紙版猶在，隨即重行出版。我把坊間研究魯迅先生的集子看看，這部書還不失爲足備參考的史料集。我們本準備在尾上編訂參考書目，可是我們都將遠行，而且藏書散失，編理也不容易，只好從缺。珂雲的「魯迅述評」，也無暇重寫，都付之懸案，以待將來。

八年滄桑巨變，人畜之相全分，魯迅先生生前站在路角上，剝露那些紳士們的外套，露出那長長的尾巴來，恨他早死十年，不及見這些紳士們的嘴臉了。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魯迅手冊

鄧珂雲編
曹聚仁校

目次

劫後重版前記	曹聚仁	一
自序傳略		一
敘記		三
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三
二、第二個師父		七
三、山海經		九
四、父親的病		一一
五、在南京		一五
六、在神戶		一九
七、辛亥革命前後		二五
八、死		七二
關於魯迅		三二五
關於魯迅		七四
魯迅傳		二五
魯迅傳		四五
創作經過		七五
吶喊自序		一二四
阿Q正傳的成因		七五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八〇
		八八

寫在一墳一後面.....九二

自選集.....九八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導言.....一〇二

二心集序言.....一〇五

魯迅在東京時的文學修養.....一一五

社會觀.....一二五

這樣的戰士.....一八一

北京通信.....一二五

論睜了眼看.....一二六

論一費尼潑積一應該緩行.....一二九

最先與最後.....一三四

燈下漫筆.....一四二

記談話.....一四四

略論中國人的臉.....一五二

紀念劉和珍君.....一五七

理想.....一六〇

雷峯塔的倒掉.....一六六

在廣州.....一六七

一點比喻.....一七三

由雙面啞.....一七七

文藝觀.....一八〇

怎麼寫.....一八二

革命與文學.....一八三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一八八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九二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九八

幾個重要問題.....二〇〇

關於翻譯

一〇四

小品文的危機

一一一

作文秘訣

一一四

論大眾語

一一八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一二一

作品評論

二二五

三二〇

阿Q正傳

啓明

一二五

魯迅雜感集序言

何凝

一二九

魯迅論

茅盾

一五九

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

蘇雪林

一九三

魯迅：一個頌讚

英 HESHAPICK

三一六

印象記

三三一

三五六

初次見魯迅先生

馮珪

三二一

訪魯迅先生

曙天

三二四

一面

阿累

三二七

致志摩

棟源

三三三

魯迅先生

張光璜

三三九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三五二

哀思錄

三五六

四一四

魯迅先生

黃源

三五七

最後一天

景宋

三七二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宇造

三六六

大眾的殯葬

珂雲輯

三九二

葬後另訊

四〇八

親友談話

四一〇

自敘傳略

魯迅

我於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
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
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我又走出，改進路礦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豫備學校畢業，我已經決意要學醫了，原因之一是因爲我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我於是進了仙台（Sendai）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我便棄了

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畫，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又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

我一回國，就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堂去做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紹興光復後，我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我去做部員；移入北京，一直到現在。近幾年，我還兼做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誌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纔用「魯迅」的筆名（Peunann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現在彙印成書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其餘還散在幾種雜誌上。別的，除翻譯不計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國小說史略。

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却
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里低唱，蟋蟀們在這里彈琴。翻開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班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竅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着，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擁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喫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會因此弄壞了泥牆，却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可無味；雪一下，可就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

朔雪羅漢需要人們鑒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薄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着，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頰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却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父袋裏叫着撞着的。我曾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着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着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

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里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于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却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蠟梅花，在地上或

花樹上尋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喂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實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着：——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噀，千杯未醉嚙……」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着，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于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

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荆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游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一一 第一個師父

我生在周氏是長男，「物以希爲貴」，父親怕我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裏去，拜了一個和尚爲師了。拜師是否要費見禮，或者布施什麼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後來偶爾用作筆名，並且在「在酒樓上」這篇小說裏，贈給了恐嚇自己的姪女的無賴；還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論理是應該用各種破布拚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欖形的各色小網片所縫就，非喜慶大事不給穿；還有一條稱爲「牛繩」的東西，上掛零星小件，如歷本，鏡子，銀飾之類，據說是可以避邪的。

這種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沒有死。

不過，現在法名還在，那兩件法寶却早已失去了。前幾年回北平去，母親還給了我嬰兒時代的銀飾，是那時的惟一的紀念。仔細一看，原來那飾子圓徑不過寸餘，中央一個大極圓

，上面一本書，下面一卷畫，左右縱着極小的尺，剪刀，算盤，天平之類。我於是恍然太悟，中國的邪鬼，是怕斬釘截鐵，不能含糊的東西的。因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經去問上海的銀樓，終於買了兩面來，和我的幾乎一式一樣，不過縱着的小東西有些增減。奇怪得很。半世紀有餘了，邪鬼還是這樣的性情，避邪還是這樣的法寶。然而我又想，這法寶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險的。

但因此又使我記起了半世紀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爲「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鬚的，他却有兩縷下垂的小鬍子。對人很和氣，對我也很和氣，不教我唸一句經，也不教我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鉢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唸經，因爲是住持，只管着寺裏的瑣屑事。其實——自然是由我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髮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師母，就是他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塊牌位，用金字寫着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我是徒弟，他是師，決不能抗議，而在那時，也決想不到抗議，不過覺得似乎有點古怪。但我是很愛我的師母的，在我的記憶上，見面的時候，她已經大約有四十歲了，是一位胖胖的

師母，穿着玄色紗衫褲，在自己家裏的院子裏納涼，她的孩子們就來和我玩耍。有時還有水果和點心吃，——自然，這也是我所以愛她的一個大原因；用高潔的陳源教授的話來說，便是所謂「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因此我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的孩子，捨在寺裏，或是賣在寺裏的；其餘的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和尚的兒子做小和尚，我那時倒並不覺得怎麼稀奇。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對我守着秘密，這一點，就可見他的道行遠不及我的師父，他的父親了。而且年齡都和我相差太遠，我們幾乎沒有交往。

三一 山海經

我渴慕着繪圖的山海經，這渴慕是從一個遠房的叔祖惹起來的。他是一個胖胖的，和藹的老人，愛種一點花木，如珠蘭，茉莉之類，還有極其少見的，據說從北邊帶回去的馬纓花。這老人是個寂寞者，因為無人可談，就很愛和孩子們往來，有時簡直稱我們爲「小友」。在我們聚族而居的宅子裏，只有他書多，而且特別。制藝和試貼詩，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書齋裏，看見過陸璣的毛詩鳥獸草木虫魚疏，還有許多名目很生的書籍。我那時最愛看的是花鏡，上面有許多圖。他說給我聽，曾經有過一部繪圖的山海經，畫着人面的獸，

九頭的蛇，三脚的鳥，生着翅膀的人，沒有頭面以兩乳當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現在不知道放在那裏了。

我很願意看看這樣的圖畫，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尋找，他是很疏懶的。問別人呢，誰也不肯真實地回答我。壓歲錢還有幾百文，買罷，又沒有好機會。有書買的大街離我家還得很遠，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間去玩一趟，那時候，兩家書店都緊緊地關着門。

玩的時候倒是沒有什麼的，但一坐下，我就記得繪圖的山海經。

大概是太過於念念不忘了，連阿長也來問山海經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我向來沒有和她說過的。我知道她並非學者，說了也無益；但既然來問，也就都對她說了。

過了十多天，或者一個月罷，我還很記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後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藍布衫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包書遞給我，高興地說道：——

「哥兒，有書兒的『三哼經』，我給你買來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個霹靂，全體都震悚起來；趕緊去接過來，打開紙包，是四本小小的書，略略一翻，人面的獸，九頭的蛇，……果然都在內。

這四本書，乃是我最初得到，最爲心愛的寶書。

書的模樣，到現在還在眼前。可是從還在眼前的模樣來說，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糙的

本子。紙張很黃；圖案也很壞，甚至于幾乎全用直線湊合，連動物的眼睛也都是長方形的。但那是我最爲心愛的寶書：看起來，確是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沒有頭而「以乳爲目，以臍爲口」，還要「執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後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于是有了石印的爾雅音圖和毛詩品物圖攷。又有了點石齋叢書和詩畫舫。山海經也另買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圖譜，綠色的畫，字是紅的，比那木刻的精緻得多了。這一部直到前年還在，是縮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經記不清是什麼時候失掉了。

——長媽媽與山海經

四 父親的病

我曾經和名醫周旋過兩兩年，他隔日一回，來診我的父親的病。診金是一元四角。現在的都市上，診金一次十元並不算奇，可是那時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張羅的了；又何況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確有些特別，據輿論說，用藥就與衆不同。我不知道藥品，所覺得的，就是「藥引」的難得，新方一換，就得忙一大場。先買藥，再尋藥引。「生姜」兩片，竹葉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碼是盧根，去到河邊去掘；一到經霜三年的甘蔗，便

至少也得搜尋兩三天。可是說也奇怪，大約後來總沒有購求不到的。

這樣有兩年，漸漸地熟識，幾乎是朋友了。父親的水腫是逐日利害，將要不能起牀；我對於經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漸失了信仰，採辦藥引似乎再沒有先前一般踴躍了。正在這時候，他有一天來診，問過病狀，便極其誠懇地說：——

「我所有的學問，都用盡了。這裏還有一位陳蓮河先生，本領比我高。我薦他來看一看，我可以寫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緊的，不過經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歡，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轎。進來時，看見父親的臉色很異樣，和大家談論，大意是說自己的病大概沒有希望的了；他因為看了兩年，毫無效驗，臉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難以爲情，所以等到危急時候，便荐一個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脫了干係。但另外有什麼法子呢？本城的名醫，除他之外，實在也只有一個陳蓮河了。明天就請陳蓮河。

陳蓮河的診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醫的臉是圓而胖的，他却長而胖了：這一點頗不同。還有用藥也不同。前回的名醫是一個人還可以辦的，這一回却是一個人有些辦不妥帖了，因為他一張藥方上，總兼有一種特別的丸散和一種奇特的藥引。

盧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他就從來沒有用過。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

「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離，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牠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然而還有「平地木十株」呢，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問藥店，問鄉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搖頭，臨末纔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愛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為「老弗大」。

「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藥引尋到了，然而還有一種特別的九藥：敗鼓皮丸。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尅伏他。可惜這一種神藥，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離我家就有五里，但這却不像平地木那樣，必須暗中摸索了。陳蓮河先生開方之後，就懇切詳細地給我們說明。

「我有一種丹，」有一回陳蓮河先生說，「點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見效。因為舌乃心之靈苗……價錢也並不貴，只要兩塊錢一盒……。」

我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我這樣用藥還會不大見效，」有一回陳蓮河先生又說，「我想，可以請人看一看，可有什麼冤愆……醫能醫病，不能醫命，對不對？自然，這也許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親沈思了一會，搖搖頭。

不肯用靈丹點在舌頭上，又想不出「冤愆」來，自然，單喫了一百多天的「敗鼓皮丸」有什麼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腫。父親終於躺在牀上喘氣了。還請一回陳蓮河先生，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舊泰然的開了一張方，但已停止敗鼓皮丸不用，藥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藥就煎好，灌下去，却從口角上回了出來。

父親的喘氣頗長久，連我也聽得很喫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

早晨，住在一門裏的衍太太進來了。她是一個精通禮節的婦人，說我們不應該空等着。於是給他換衣服；又將紙錠和一種什麼高王經燒成灰，用紙包了給他搜在拳頭裏……

「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衍太太說。

「父親！父親！我就叫起來。」

「大聲！他聽不見。還不快叫？！」

「父親！！父親！！」

他已經平靜下去的臉，忽然緊張了，將眼微微一睜，彷彿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說。

「父親！！」

「什麼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說，又較急地喘着氣，好一會，這纔復了原狀，平靜下去了。

「父親!!!」我還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氣。

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却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父親的病

五 在南京

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道稱爲什麼了，光復以後，似乎有一時稱爲雷電學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牠那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功課也簡單，一星期中，幾乎四整天是英文：「It's a cat」「Is it a rat?」一整天是讀漢文：「君子曰，穎考叔可謂純孝也已矣，愛其母，施及莊公。」一整天是做漢文：「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論」，「穎考叔論」，「雲從龍風從虎論」，「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論」。

初進去當然只能做三班生。臥室裏是一桌一櫈一床。牀板只有兩塊。頭二班學生就不同了，二桌二櫈或三櫈一牀，牀板多至三塊。不但上講堂時挾着一堆厚而且大的洋書，氣昂昂

地走着，決非只有一本「潑賴媽」和四本左傳的三班生所敢正視；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將肘彎撐開，像一隻螃蟹，低一班的在後面總不能走出他之前。

可愛的是桅杆。但並非如「東鄰」的「支那通」所說，因為牠「挺然翹然」，又是什麼的象徵。乃是因為牠高，烏鴉喜鵲，都只能停在牠的半塗的木盤上。人如果爬到頂，便可以近看獅子山，遠眺莫愁湖，——但究竟是否真可以眺得那麼遠，我現在可委實有點記不清楚了。而且不危險，下面張着網，即使跌下來，也不過如一條小魚落在網子裏；況且自從張網以後，聽說也還沒有人曾經跌下來。

原先還有一個池，給學生學游泳的，這裏面却淹死了兩個年幼的學生。當我進去時，早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還造了一所小小的關帝廟。

我的前輩同學被關聖帝君鎮壓了一整年，就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雖然我並不知道是怎樣的好處。所以當這些時，我每每想：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

總覺得不大合適，可是無法形容出這不合適來。現在是發見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烏煙瘴氣」，庶幾乎其可也。只得走開。於是毫無問題，去考路礦學堂去了，也許是礦路學堂，已經有些記不真。試驗並不難，錄取的。

這回不是 *It is cat*，是 *Der Mann, Die Weib, kas Dind*。漢文仍舊是「穎考

叔可謂純孝也已矣」，但外加小學集註。論文題目也小有不同，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是先前沒有做過的。

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但是還得聲明：後兩項，就是現在之所謂地質學和礦物學，並非講輿地和鐘鼎碑版的。只是畫鉄軌橫斷面圖却有些麻煩，不行綫尤其討厭。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

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翻開一看，是寫得很好的字，開首便道：

「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南，背山而面野，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

乃懸想二千年前，當羅馬大將愷微未到時，此間有何景物？計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裏那癡想，而且想得那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學堂裏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還有譯學彙編，那書面上的張廉卿一流的四個字，就藍得復可愛。

「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輩嚴肅地對我說，而且遞過一張報紙來。接來看時，「臣許應駢跪奏……」，那文章現在是一句也不記得了，總之是參康有爲變法的；也不記得可曾抄了沒有。

仍然自己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一有閒空，就照例地喫倭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

但我們也曾經有過一個很不平安的時期。那是第二年，聽說學校就要裁撤了。這也難怪，這學堂的設立，原是因為兩江總督（大約是劉坤一罷）聽到青龍山的煤礦出息好，所以開手的。待到開學時，煤礦那面却已將原先的技師辭退，換了一個不甚了然的人了。理由是：一，先前的技師薪水太貴；二，他們覺得開煤礦並不難。于是不到一年，就連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來，終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燒那兩架抽水機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來抽水，結一筆出入兩清的眼。既然開礦無利，路礦學堂自然也就無須乎開了，但是不知怎的，却又並不裁撤。到第三年我們下礦洞去看的時候，情形實在頗淒涼，抽水機當然還在轉動，礦洞裏積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點滴而下，幾個礦工便在這裏面鬼一般工作着。

畢業，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年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麼？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

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麼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鑽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餘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留學的事，官僚也許可了，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個因為祖母哭得死去活來，不去了，只贖了四個。日本是同中國很兩樣的，我們應該如何準備呢？有一個前輩同學在，比我們早一年畢業，曾經游歷過日本，應該知道些情形。跑去請教之後，他鄭重地說：

「日本的襪是萬不能穿的，要多帶些中國襪。我看紙票也不好，你們帶去的錢不如都換了他們的現銀。」

四個人都說遵命。別人不知其詳，我是將錢都在上海換了日本的銀元，還帶了十雙中國襪——白襪。

後來呢？後來，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國襪完全無用，一元的銀圓日本早已廢置不用了，又賠錢換了半元的銀圓和紙票。

——瑣事

六 在仙台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

念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我到仙台也頗受了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於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真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切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麼？」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尾，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裏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為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腳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修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回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為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回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識熟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於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刻，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

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閉着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安慰他的謊語。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嘆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使通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

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藤野先生

七 辛亥革命前後

辛亥那年，到冬初，我們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着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着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開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

「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爲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却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爲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鎗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着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却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認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彷彿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却使我爲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于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爲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爲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爲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葦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淒涼，說：

「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准，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博力臣。

——范愛農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文 (Kaethe Kollwitz) 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 (A. Smedley) 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他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文——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則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為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書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虛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隨便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

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糊糊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為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爲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曾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轍，自以爲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

。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喫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沈沈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盛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顯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

「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一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

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躺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

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關於魯迅

知堂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鐫上。後來阿Q正傳與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即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傅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帳」至今我還是看不懂，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就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

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為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爲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裏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論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時適有張——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爲命名曰張，或以爲與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爲名，蓋非也。書名定爲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羣從譜名爲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爲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爲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爲拉稿，豫才爲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介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侯，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爲兩部，甲爲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爲創作。今略舉於

下：

甲 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二，謝承後漢書（未刊）。三，古小說鉤沈（未刊）。四，小說舊聞鈔。五，唐宋傳奇集。六，中國小說史。七，嵇康集（未刊）。八，嶺表錄異（未刊）。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乙 部

一，小說：吶喊，彷徨。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為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

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詩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歛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砂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書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湜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里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錄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酉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游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泉草木記。豫才則抄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頭本已

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措華」吧，當時是珍重耽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祕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拚搗坳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鐵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戛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子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煙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飭，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葦花離志二闕云：

「晚香玉本名十鬚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苦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變爲紅，遇鹼水則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卽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曾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與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C.Lyell）的地學淺說（案即Principles of 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爲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稷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璠田的釋

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穎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為輯古逸書收存鄉邦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叙，題曰太歲在關逢攝提格（民國三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叙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里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叙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

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為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爲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爲古小說鈎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爲謝偉平是由陰人的緣故，特爲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與故書雜集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爲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爲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爲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鈎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

，編選北平的詩箋，爲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爲「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質不明的革命軍的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閒漢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惲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衆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爲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俟，我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署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爲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可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並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

，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曾）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會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惡與惡，而惡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爲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末，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

（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魯迅傳

佐藤春夫

魯迅是在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的。他底父親是讀書人，雖然他底母親是鄉下人，但她是很努力自修自讀的。在他幼小的時候，家中置有四五十畝良田，因而生活亦很可過去。他底祖父在清朝是已獲得翰林底學位；可是當他在十三歲的時候，祖父已因某一事件被捕入獄了。於是親戚和隣舍對於他底家族都加以凌辱，家裏底財產也都被攜取精光；接着父親就生起大病來。他在發表於語絲半月刊上的自傳裏說：

『……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爲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

還有在那處女作小說吶喊底自序裏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時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當舖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當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海蕩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

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都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因為祖父是做官的，所以家裏便有着相當的產業；但這些都為父親長期生病而用光了。因為被親戚所欺凌，以致沒有飯吃，他就這樣地說道：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

在家裏既無飯吃了，便非向外發展不可。但因為他是個讀書人的子弟，不用說是要受教育的了，即使讀書，那便只能進免費的學校；於是他底母親就籌劃了八元旅費，他也就拿了這筆旅費到南京去。在南京他既非常貧窮，且又很用功；終於考入了路礦學堂，這學校是由新黨（當時的洋學派）所主持的。他對於洋學很感興趣，既醉心於進化論，又愛讀新科學書，尤其對於生理，解剖，衛生等醫學底知識加緊努力自修着。

「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藥方，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吶喊序）

所以他後來就都寫了出來。的確，他年輕時感情上所受的父親底病的刺戟，無時不都深印在腦底裏。他爲了父親底藥價，爲了搜集藥方的藥材，曾整整化費了三年多的工夫奔走四方。因此就研究出了父親底病是爲庸醫所殺害了的。所以他想做醫生，要來救不幸的國人。而且當時已覺悟的青年，無論誰都好像是有這樣的思想似地，燃燒着爲拯救快要滅亡的中國而振作起來的革命精神。自從鴉片戰爭發生以來，接着什麼中日戰爭呀，什麼義和團事件呀，都爲外國所擊敗，正因爲是倒了霉，所以所有一切都受外國底壓迫和威脅，於是中國就漸漸地被蠶蝕了。因此滿洲人所建立的清朝，就是漢人底仇敵。所以什麼推翻滿州人底政府，同時非馬上建立中國底政權的風潮，就橫溢着在知識青年之間。那時，日本已仗老練之力興隆了起來的，所以說日本就是他們底模範。但日本之興隆，完全是由於明治維新底變革之所致；因此中國也便非起來革命不可了。魯迅是已看清了，日本維新和西洋醫藥底關係。所以他便以爲已被悠久的腐敗的傳統所束縛着的中國國民底精神，應該是依於科學底知識，以及醫學和醫術來啓發的，這就是喚醒中國國民底覺悟的第一步。

『因爲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吶喊序）

那時，他是沉醉於像少年似的浪漫的人道主義，興奮地在努力着。在路鐵學堂畢業第一名，過後就領得省費到日本去留學。在東京的弘文學院有二年間是研究日本語和普通科，終於，希望做醫生的他，做考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了。第一年的考試，就在日本人的學生中，他底成績是中等的。有一部分學生以為『中國因為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無論如何總是低能兒』（根據朝花夕拾）。對於他底成績都起懷疑，有的說要派出級代表來檢查他底課卷，有的說有部分的教師把題目洩漏給他的。自從給他知道了這些學生對於自己底誤解之後，他對於學校便大失其所望了。於是到了第二年，他便非離開仙台不可了。（參考藤野先生）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室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些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先在畫片上忽然會看我久違的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精神。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吶喊序）

那時，他底美夢完全粉碎了。同時他底一生就以此為契機而轉變了方向了。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強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序）

在東京的留學生們，想研究法政、理化、警察、工業的很多，可是研究文學和美術的却沒有。於是在那些人當中集攏了幾個同志，此外加入幾個經濟援助等的，討論之後，第一步自然是出版雜誌了。那時，魯迅已經是推翻滿清的革命黨員了；但他既在德國協會學校裏讀德文，同時又參加各種實際運動，出入於宮崎和滔天的什麼地方等。因為其雜誌也是滅滿興漢的，所以可說是當時革命運動之一了，因此其雜誌就定名為新生。「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都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繼續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非生產的新生的結局」。（吶喊序）

終於雜誌出版底計劃是失敗了，學校也被拋棄了，意氣沮喪的他，想到德國去的理想也失望了。還有，那時，和他底弟弟周作人，（周作人也是現代著名的文學家，是永遠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其文壇的聲名是與其兄魯迅並駕齊驅的）共同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出版了，但祇

出版到了第二集，這也終於失敗了。他從仙台回到東京的第三年，那時已有二十九歲了；但在國內的母親以及其他的人都非要他援助經濟不可，所以他就祇得回國了。回國後，他是在杭州師範學校裏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可是祇一年就辭職了；接着就當紹興中學校底教務主任；但他又不到半年跑掉了；這是因為他和無論那一個上自校長下至所有古董的道學先生的同事吵架，思想上不對的緣故。他自離開了學校之後，爲了生活，就想在某一書店裏當編輯員，結果又被拒絕了。但這時間，他已是革命黨員而拼命地爲革命在奔走着。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革命軍在武昌起義，清廷便很脆弱地潰滅了，忽然各地就接二連三地歸於革命黨底手裏。魯迅底故鄉——紹興——也早已是革命黨底地方了；但其內部仍然是照舊未動絲毫；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由這幾個腐敗的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像什麼鐵路的大股東做行政局長，錢莊的老闆做軍事局長之類，當然這一軍政府是無容年輕的知識青年加入之餘地了。學生們就先騷動起來了，那時就有一個革命軍隊中蠻有勢力的帶了軍隊，爲了鎮壓騷動分子，從杭州開到了那裏，本來那軍隊底首領是承奉大多數的破落戶以及真正的革命黨員們而舉爲都督的。可是做了都督之後，馬上就神氣活現起來，壓迫民衆，已變成了專橫放恣的軍閥了。那時已如同革命黨的同志的魯迅，是有着了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

「無論怎麼樣，總是毫無趣味，他們底計劃是沒有的。」
有一個魯迅底學生某次訪問他說道：

「我們不得不辦一報紙監督他們，所以該報發起人得要借一借先生底名字。」
魯迅底學生們出版報紙，是罵軍政府以及其內部的人們，不但如此，而且罵都督，和都督底親戚，以及同鄉人。終於說都督要殺魯迅的消息帶到他那裏，魯迅就拔腳逃到了南京去。那時，剛巧革命政府在南京統一了，孫文做大總統，蔡元培做教育部部長。蔡元培是魯迅底同鄉，是老先輩。魯迅由他底關係一躍而爲南京政府底教育部的人了。南京政府，不久遷移到北京去，魯迅也跟政府一起遷移到北京去在教育部裏做事。他其在教育部裏十五年當中，除做過教育部僉事和做過京師圖書館長外，曾執教鞭於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關於他學術的方面，則有名著中國小說史略，這是將在北京大學裏的講義原稿整理而成的。

他從在東京和同志想出版的新生失敗了之後，研究文學底意志也便好像消滅了似地。但他在東京的時候，常常寫文章投寄於革命黨底機關報浙江潮和河南等的刊物上；不過那主要的太多是關於解說科學史或進化論等的論文。尤其把文學家介紹了進來。當時，在一般青年底心裏，因爲是都已充滿着了革命思潮，所以凡是反抗和復仇的東西，便很容易得到了反應。

。北方拜命之援助希臘獨立運動的熱烈，是最為青年所崇拜者，尤其是對於拜命的讚揚；但除拜命之外，青年魯迅曾力說介紹荷爾底復仇詩人阿達姆·彌凱維支，匈牙利底愛國詩人彼多菲·沙特，菲律賓底文人為西班牙政府槍殺的蓋沙路（其祖父係中國人）等過的。另有一部分人，從東京及其他的圖書館中搜集明末遺民底著作，將滿州人底暴虐事跡抄印出來，拿回中國來，企圖使已被忘記的舊恨復活。藉以幫助革命的成功。那時，像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宋舜水集、張蒼水集等等都已被翻印了出來。魯迅在東京的時候，據說是個革命黨員努力從事於文學運動的；但一旦革命成功而清朝被推翻了之後，那樣的文學也就不必要了。

由於一九一一年底辛亥革命而推翻了清朝底專制政府，中國則一變而為中華民國，名目上却使已是共和政體了；但清朝推翻後的政治的統治者，仍然是所謂「軍閥」。中央政府不過是任命各地方具有軍隊和行政權的督軍的形式而已；但事實上，剛巧相反。在各地方具有勢力的軍閥之間的勢力均衡上，仍然是操縱在北京政府底手中。總之，北京政府不過是這些軍閥獲得政權後競爭的巢穴而已。但這些軍閥，不但是常常為各列強所支配着，而且列強將這些軍閥，當作走狗，使其互相間對立抗爭起來。藉以爭奪在中國的經濟利益。辛亥革命雖是已把清朝推翻了，但自清朝崩潰之後，這却可以說是比以前更容易促進列強侵略中國；事

實上，列強是用了種種的方法來援助推翻清朝的。可是從把清朝推翻之後，列強就利用各個軍閥，在中國拚命地擴張自國底勢力範圍，供給軍火、彈藥於軍閥，同時把軍事顧問推薦給他們，總之，是已把軍閥視同手足似地在活動着；但作為財政的，軍事的援助底代價的，就是逍遙自在地可獲得鐵路、礦山、以及其他各種經濟的特權。因此，龐大的外國資本，每年就好像潮水一般湧現進來。中國由於外國資本首先就是促成近代工業勃興了起來。同時跟着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出現了；然而那時恰巧歐洲大戰已開始，列強對於中國却使非暫時停止經濟的活動不可。那時雖然給與自國民族資產階級可由於土着資本急激地發展的機會，但等到歐洲大戰一停止，同時，列強又捲土重來再向中國開始了猛烈的侵略以獲得市場。因此在歐洲大戰中已急激地發達起來，做着美夢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受到列強底經濟的壓迫，以及列強所操縱着的封建軍閥，列強相互間利益底對立便都急加尖銳化。同時，那些為列強所操縱着的軍閥繼續不斷地發生國內戰爭，而那些軍閥殘酷的苛捐雜稅就阻害着了民族資產階級底發展。那末，這時有兩個敵人擺在那些民族資產階級底面前，就是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於是那些民族資產階級首先對於容易戰勝的自國軍閥，即列強底走狗，同樣對於代表地主、土豪、劣紳等底封建勢力的軍閥，不得不應該為打開他們底血路而鬥爭的。的確，民族資產階級底代辦者，無論什麼時代，都是知識的急進的小資產階級。因此，急進的小資產階

級受了軍閥外交底失敗而起來活動，站在最前線上組織學生，推動各地的總商會，展開了從反軍閥到排外底大運動。這就是打開中國近代民族革命運動底萌芽，即可謂『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確是有着重要的意味；但運動勃發底直接動機，就是二十一條件。大一點說中國底近代社會運動，即發端於排外運動，或立刻結束於排外活動，這就是半殖民地中國底宿命。）

所以，五四運動就是從北京大學生底燒打事件，立刻展開到全國底實際鬥爭，因此在政治上就是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底運動；但思想上却是對封建的舊文化的革命。可是關於這次五四運動關頭作其前哨戰，却不得不溯到所謂『文藝革命』運動了。在這裏就據中國批評家丙申說『五四』是已有了一貫的目的，即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是以鬥爭底形式接受了民衆底要求的；換句話說，已經企圖要想組織民衆底意識了的。這次運動最初是以意識形態爲組織想選擇最有力的武器——文學來作爲第一線底突擊隊。反對文言文和舊戲，就是他們底口號。其次，這次運動已擴展到了在全文化戰場上，反對舊禮教，攻擊儒家底人生哲學；最後主張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底政治。這時『新青年社』底某一次宣言，已成了形式上『五四』底中心的大本營。（丙申五四運動的檢討）

魯迅是在這『新青年社』即『新青年』刊物上，才開始發表了他底作品。最初的一篇狂

人日記忽然在讀者中掀起了異常的高潮。過後就絡繹不斷地發表了傑作；但是當時的中國底文學到底是怎樣的呢？

科舉制度（官聲考試），因為是由古文來決定其攷試的，所以古文——文言文就是文學底正宗了，使用白話的小說，是很流行着的；但那是當作通俗的文學，不是不認為文學的；因為文壇是被古文所佔領着。比方：唐宋八家和八股底混合體的『桐城派』，繼承思綺堂和袁隨園底四六駢體文，以黃山谷爲偶像的『江西派』等，都是當時的所謂文學。因此，在國民之間所使用的文章，像碑銘墓誌似地寫起來，確是不能獲得讀者的歡心，因為是盡量模倣古例而專門讚美死人的。縱令是普通一般的信札，自始至終都滿載着誇張式的諛詞。碰到了喪事，即使華居美食，但在死亡通知書上，大吹其牛地寫着『蓆草枕土而昏迷』。假使拿扁項贈送給醫生，則寫着『藝高岐伯』、『術高黃帝』、『着手回春』等的，雖是窮鄉僻壤的小荳腐店，在正月所掛的對聯，老是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這樣的法螺。總之，無論什麼，都是阿諛、虛僞、誇張、開天闢地是模倣貴族底古典文學的，還有一種叫做山林文學，就是獨創一格寫深晦艱澀的文章，自以爲高尚雅緻的，甚至於自己以爲今世的俗人都不是到底對手而會寫文章的。把自己所寫的文章藏入名山裏，讓百年後的賢人看出其價值來的所謂『名山著述』，這種逃避現實的空想文學，像一部分人所說似地，確是已

經沒有文學思想底根幹了，這些古典文學，貴族文學、山林文學，對於一般大衆什麼裨益都沒有，其形式是陳腐的，祇有肉而沒有骨，不過是裝飾品罷了；內容是並沒有考慮到人生或社會，其眼界總是因於帝王，權威，神仙、鬼怪及個人底窮通利達。這種文學，是由於阿諛、誇張、虛偽、迂闊的國民性互相而成的原因和結果。假使不首先革新這種醜陋的文學，則不能革新社會（以上是根據陳獨秀底文學革命論），因此所謂「文學革命」就起來了。

文學革命運動 實際上是在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上所發表的一篇從美國寄來的胡適底文學改革駁議 是其導火線。新青年底主筆陳獨秀馬上對於他表示同意，在第二個月的新青年月刊上就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 這是以政治運動作爲前提的開始。新青年在一九一五年誕生的，最初是不爲世人所聽得起的，後因其主筆陳獨秀是北京大學文學系主任，加之他是北京大學底進步的教授，所以等到他出來提倡文學革命，立刻就引起了世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們底動聽。當然，一向古文學家是反對它的，就用了種種的方法，甚至於用了政治底方法，想來防止壓迫這種運動。可是時代底大勢使然，所以無論怎麼樣是不可能的，很快地舊文學不打而倒了，數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就爲之一新，這就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文學革命底旗幟，因爲是反對古文提倡白話文，所以這就叫做「白話文運動」。因此，一向在民間非常流行而當作通俗文學瞧不起的白話小說，加以新的批評，教授與相當

的價值。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非創造出新的白話小說的作品不可了。

文學革命底理論基礎，是由於胡適和陳獨秀，以及其他如錢玄同、劉半農等創立出來的。不像陳獨秀似地，傲然地說：『爲要改革中國底文學，必須以白話爲文學底正宗。這是很明白的；反對的人更無討論的餘地。』所以白話文學底主張便照樣得到了一般人底歡迎；但實際上能代表白話文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的作品，同時這一運動能夠在社會上得到絕對的勝利，這却可以說是魯迅底功勞了。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底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上，就足以使青年們興奮了的。某一青年後來在歡迎魯迅到廣東去的文章中這樣地寫着：『狂人日記中最初在新青年上發表之時，本來不知文學爲何物的我，讀了異常的興奮。一到朋友的地方去，總向他們說——中國文學創一新時代了，你們都應該讀狂人日記呀！甚至於在路上走的時候，也想向路人發表我的意見。……（魯迅在廣東）』

狂人日記是描寫被害妄想狂的人的日記體的小說，這個患精神病的人，的確，是大膽地明確地痛罵着中國封建的舊社會底惡弊。對於他底鄰人更甚，尤其對於他底家庭放了加緊攻擊的矢箭。所謂家庭——家族制度也者，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當作社會的單位，無論怎麼樣，在一概總是覺得煩瑣的事情。封建的家族制度，在已完全形式化了的儒教之流的宗法社會觀念之下，在無可無不可的時候，那確是近代社會成長的最根本的障礙橫在已覺悟了的人們

底眼前。在一個家庭中，包含有同姓的許多家族，與其說大家族主義，毋寧說是氏族主義底組織來得恰當些，他們互相依附其他的東西，互相利用其他的東西，假使犧牲得不恰當，那末，就無立足的餘地了。同族間勞働的人，常常非負擔不勞働的人底生活不可。由於龐大的國際資本，以及與其打成一片的自國底軍閥官僚資本而勃興起來的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當然是要把以土地爲主要的產生手段，以土地爲中心而成立的封建的大家族主義導入於不得不崩潰的命運中；加之，中國特殊的情形，國際資本主義，已如上述造成了軍閥不斷的內戰，和苛捐雜稅，結果，中國必然激成遍地皆兵匪，橫行掠奪，這都就使他們更貧窮化，更使土著的百姓困難化。但像這樣的政治上或經濟上瀕於崩潰的家族制度，無論是在道德上或習慣上即已形式化了，仍然存在者儒教主義底宗法觀念。魯迅底狂人日記雖在那時出版，但已剔抉了已腐敗不堪的封建社會底舊習慣。因爲這已給與知識的青年學生大衆以異常的興奮，所以就很受歡迎了。

魯迅平生是慨嘆中國社會已斷送在祖宗已歪曲了的孔子哲學中；但在狂人日記中，確是比攻擊家族制度更進一層，尤其是使封建社會本身能道德化的儒教之流底仁義道德，已經不過是失掉社會意義的固定化了的觀念而已，而不僅如此，在中國底歷史上雖是充滿着仁義道德，但實際上誰都在欺負着他人——以他人爲餌食而肥自己的。不僅祇現在的社會，即在從

前，也已這樣地在痛罵着中國了的。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中之一節）

因此，是已暗示着可咒咀的醜惡的社會，都是不得不由次一時代的青年人來改革了，而狂人日記這一篇小說最後是用了『救救孩子』這一句來結束了的。

『救救孩子』——這是已極端地表白了他底理想。新的中國應該是說由純潔的青年來建設的，當然，這一句話是能使當時的一般青年覺悟到了重大的任務；自此以後，這句話就成了當作能使青年從數千年來的封建社會裏解放出來的口號，而廣佈在世間常用的格言。事實上，自此以後的中國青年學生，就站在一切大衆底社會運動的第一線上，成了最活潑最勇敢最戰鬥的指導者和組織者。無論是五四運動，五卅運動，還有國民革命，站在最前線上指導着大衆的，都可算是學生組織的了。

繼狂人日記之後而陸續發表在新青年月刊上的，有：孔乙己、藥、明日、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風波、故鄉等。最後，一九二二年阿Q正傳連載於北京晨報底副刊上後，他便一躍而爲文壇的第一個人物，這些作品大概是描寫辛亥革命前後的社會生活的；既描寫出了如何

舊社會必然非崩潰不可的特殊性，且又暗示着如何產生新的社會。所以說他是用最忠實的手法描寫出了革命及革命底風潮，是怎樣浮現在人們底心裏和生活的局部上的。的確，他可以說是善於描寫農民生活的農民作家。在他底小說裏，是主張不願露出非常生硬的觀念，所以，他之作家底手腕是超羣拔萃的。他能把無智的農民拉來作為小說的主人翁，但具有稀奇古怪氣味的那些主人翁，既可笑又可憐，像演戲一般，而且發揮着最真實的各種行動，當然，作為個人底行動的背景，無論什麼時候，社會本身是被當作最重大的眼目而描寫和批判着的了，這是不用說的。這種古怪的主人翁，就是孔乙己底孔乙己和阿Q正傳底阿Q，都是非常明顯地表現了出來的。孔乙己是舊時代底讀書人，是時代底殘渣，雖然沒有差使，志氣是昂揚的，但因沒有生活能力而行乞，欠着酒店裏十九文錢，一直寫在粉板上，已經好久不見他，大概是死了吧。阿Q是失業農民——幫短工，是輕浮的人，非常喜歡造反，愛鬧革命，隨便怎麼樣總是勝利的，等到祭祀時吃醉了酒就要加入暴動的黨人，結果連性命都犧牲了，就誤會為乘機而起的暴徒底掠奪事件之黨人（從其中素的輕舉妄動的言動和行爲）而被殺底。阿Q底性格，在那時候的中國的人，誰都有全部分或一部分相似的地方。阿Q底思想和行動是左往右往的，獨自的而沒有一個確定的精神。因為他恐弱的習性是驕傲的，所以和人家小衝突則無反抗心。由於憐憫對方底粗暴而是特別自以為自己底氣量大方的結果，總把自己底

弱點瞞着以爲是了不起的人，對手確是弱者無理取鬧的。所以這點，魯迅已把阿Q是曝露出文藝底真實來了的。阿Q正傳一發表，接着和魯迅不睦的人們，到處說壞話，好像青蛙似地騷擾起來。像阿Q這樣的人，是封建底遺物，不僅祇在農村裏，所以阿Q之存在，可算是當時社會的普遍現象，當時的時代，確是阿Q時代；所以魯迅底阿Q正傳一發表，批評家就以『阿Q相』『阿Q時代』的句子當作成語在使用了。

五四運動之前鋒隊新青年文學運動底時代的任務，如在前面引用丙申之指摘似地是組織民衆底意志的。魯迅自佔有了新青年之後便不可以做越出這一範圍的工作了。據說他現在是主持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可不能把他底五四後的作品（在從他指導作家活動之後那時起，以後他便沒有小說了）看做是無產階級底小說，即在他自己也是這樣說的；但他是優勝的農民作家，這倒是可以這樣說的吧；可是還不能說他是無產階級作家，這是僅就其所發表的作品來說的。

二三年前革命文學論鬧得熱烈的時候，錢杏邨等年輕的標準的共產黨的批評家，出來大地攻擊魯迅，其立論是說魯迅作品不是革命，所以阿Q是無革命性的；但在魯迅底作品裏都並沒有共產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的。然而魯迅參加作家的活動的時候，中國底無產階級在那裏是怎麼樣呢？中國共產黨不是已隨時隨地在發現了嗎？那時可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

政治思想並沒出現的時候嗎？資產階級革命的所謂國民革命，可不是以五四為前哨戰而已勃發起來了嗎？

魯迅在做了教授成了作家之後，安定的生活已經完結了，同時他已經進入於『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魯迅答覆某人質問他近來為什麼不發表作品的話）的生活了。所以近來之沒有作品，是因爲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忙碌的緣故。他底小說，全部都照發表底年代收集在吶喊彷徨二本書裏，但吶喊卷頭底狂人日記是一九一八年作的，彷徨卷末底離婚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的。他也就是從寫了最後的離婚的翌年三月起開始了脚之逃跑比手之寫字更來得忙碌的生活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北京軍閥段祺瑞政府通飭逮捕五十名急進的左派教授和知識分子；魯迅是五十名中之一個。在此以前，一九二三年國民黨底首領孫文，是不滿於由這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的政客所構成的國民黨，因爲他已經知道對於封建軍閥是完全沒有力量的，所以就宣言和蘇聯提攜，同時允許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在同年秋天，已從蘇聯派來鮑羅廷及其他顧問到了國民黨底中心地——廣東。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決定了黨底改組和新政綱。由此宣佈了聯合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及勞動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封建軍閥的所謂國民革命底火勢，就以廣東為中心而燒

遍了全國各地。國民黨企圖借着和中國共產黨之提攜去獲得蘇聯底軍費、軍火及革命技術底幫助，而其產黨想利用國民黨在民衆中有歷史的勢力，來打倒在國際帝國主義箝制之下的那些封建軍閥，而作爲無產階級革命底前提，想首先完成民族革命。

『在革命，不，全國民的共同戰線的革命——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時期（廣東時期），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就是農民、都市的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等。中國革命運動團體特性之一，就是存在在這些資產階級代表者構成而爲國民黨的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之中國共產黨作共同活動的了。』（約瑟夫；關於中國革命）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文是與世長逝了；接着到了七月，在廣東成立政府。一九二六年七月，蔣介石就任總司令，組織北伐軍出發廣東。所到地方的都市資產階級、農民、工廠工人，都一致聯合起來援助革命軍。因此，那時雖在北京的知識分子，誰都加入國民黨，極力抵抗軍閥段祺瑞政府。青年學生就和段祺瑞政府走狗的教育部長，還有教育部長底走狗校長及反動教授作英勇的鬥爭。左派的急進教授和學生一致聯合起來，指導學生，攻擊反動教授及校長、教育部長及軍閥政府。軍閥政府眼看到全國國民革命底勢力一日千里地增大起來，便狼狽不堪，恐怖得腳手發抖，於是對於煽動革命的知識分子——急進教授和學生們加以壓迫。在學生羣衆中爲軍閥政府底衛兵槍殺的亦復不少。急進教授就被通緝。那時魯迅轉輾逃

向北京使館區域和外人經營的醫院及工廠，每天祇以求充饑過着日子。他一面在逃避，一面寫文章投刊於報紙雜誌上，不斷地痛罵政府，與其作頑強的戰鬥。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鎗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爲，不但在禽獸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衆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中國只任虐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使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省自躬，激發一點天良？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實彈打出來的都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能掩於墨寫的囁語，不醉於墨寫的輓歌；威力也壓牠不住，因為牠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那時，受傷的男女學生約數百人，被遺棄的屍體也有五十個之多。魯迅既被驅逐，又眼看流血，便更鼓勵青年作進一層的奮鬥。他底家庭，因為魯迅已被官廳驅逐，所以家庭也討

厭他。他既被官廳驅逐又被家庭見棄，在此情形之下住在北京祇有五十日；終於因為不能久住下來而離開了北京。當時在北京的國民黨系的知識分子，覺得在北京有點危險，同時南方的革命底氣焰漸漸地熾烈起來他們於是便都向武漢方面或廣東方面走去。那時他因為接到了福建廈門大學聘請的密電，就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底學生許女士，（他教過書的學生，因為她是學生運動的戰士，所以也已經不能留在北京了）同時南下了。途中，幾乎被在南京的江浙地方的軍閥孫傳芳的軍隊鎗殺的危險，終於是給他逃到了上海。可是在上海的報紙上，早已登載着魯迅經此到廈門大學去改革廈門大學的消息。學生們果然都已集中到廈門去。終於學生們就以他為中心開始潑刺地活動了起來；或者寫些白話文章，或者發表非難孔教的言論，或者發表關於社會及政治上的批評，因此他便很博得學生們底歡迎，聘請他的校長和反動教授們，猜疑魯迅好像是一個陰謀家的樣子，所以對於他便加以壓迫和譏謗。廈門是國民黨實力所不及的地方，對於革命底好意不過是當作一種時代底潮流而信奉着罷了。實際上反動的封建的據說魯迅在平靜的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件不幸的風潮，那就是他已被人壓迫着。在報紙上宣傳魯迅是思想界底權威者，是思想界底先驅者，其目的無非是借着他來改革廈門大學罷了，所以這一定是學校當局所幹的勾當了。那不過是為號召學生的廣告而已，終於這一件事是已被暴露出來了。

「今天也遇到了一件要打寒噤的事。廈門大學的職務，我已經都稱病辭去了，百無可爲，溜之大吉。然而很有幾個學生向我訴苦，說他們是看了廈門大學革新的消息而來的，現在不到半年，今天這個去，明天那個走，叫他們怎麼辦？這實在使我夾脊梁發冷，噁口無言。不科『思想界權威者』或『思想界先驅者』這一頂『紙糊的假冠』，竟是如此誤人子弟。幾回廣告（却並不是我登的），將他們從別的學校裏騙來，而結果自己倒跑掉了。真是萬分抱歉。」（華蓋集續編）

廣東中山大學底校長知道了魯迅在廈門被排斥的事之後，便接二連三地打電報給魯迅，說是聘請他來當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他便想帶着因他去後而感傷的廈門的學生們一同去，所以就以把這些學生不要考試進中山大學爲條件而到廣東去教書。終於三十幾個學生，便和他一同到了廣東。那時，廣東是國民革命底策源地，加之北伐軍得到全國民衆底援助，到處勝利，所以那時在廣東的革命空氣是像沸水一樣地在奔騰着。被北京底軍閥政府驅逐出來，逃到廈門，接着又被廈門底反動教授驅逐出來，來到了廣東的魯迅，是熱狂地被人們歡迎着了。廣東底報紙是把他當作革命底戰士而登載着的。那時有一個青年是這樣地寫道：

「魯迅——廣東來了。廣東的青年對他的來表示着渴慕和歡迎。開會啦，拍照啦，甚至於研究他鬚髯的人也有了。總之，是這樣熱鬧過的。我們也歡迎着魯迅，但是並不是因他是載

着「思想界的權威者」或「時代的先驅者」等等的大帽子；我們却因為魯迅是我們青年所值得歡迎的，知道他是很努力於思想革命的工作的」。（魯迅在廣東）

魯迅曾在歡迎會上鄭重地聲明過了：他是不敢當諸君所讚揚的「戰士」或「革命家」。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末就該留在北京或廈門奮鬥的了。可是他逃到「革命的後方」的廣東來。所以這就可以證明他並不是戰士。但革命政府的某一委員兼主席教授繼魯迅之後站起來演說，他說可以拿出證據來證明魯迅是個謙遜家。他底人格是很高尚的，假使就他到現在的事實看來，的確，他是個可尊敬的戰鬥者，革命家。於是坐滿在會場裏的來賓，一齊地發出了鼓掌聲。魯迅關於這事是這樣地寫着：

「我被稱為戰士就這樣決定了，拍手之後，會就散了，我再向誰去辯說呢！我沒有方法，只好背了一塊戰士的招牌回到宿舍中去。」（而已集）

而且他接着還這樣地寫着：

「我的同鄉秋瑾女士，（秋瑾女士是辛亥革命的時候，世間最盛傳的一個女革命家，遂為軍政府所殺，實在是為世間過高的評論所殺，被殺後就在世間留下了偉大的名聲。同樣的在一陣掌聲中被殺了，我這樣想了之後，覺得我自己也在討死吧！」

這樣的文章驟看起來，也許以為他是在擺着自嘲的虛偽的架子。可是他並不會說自負的

話。不過是因爲激烈的憤激發出來的悲壯的譏刺罷了。這段文字是他發表在九月初的語絲上的通信之一節；那時他已幽默了的。正月到中山大學赴任，四月初已辭職了。他就在嚴重監視之下忍耐地等待着可脫走的機會。忽然國民革命起了『清黨運動』，他便不再住在學校了。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發生所謂『四一二』事件，由於蔣介石底果斷政策，就完全肅清了共產黨。接着，在上海之後的四月十五日廣東也忽然起來響應蔣介石進行了極端的白色恐怖。凡在廣東一省的工人和農民及急進的知識分子被殺戮者已達三千人之多，已被掛上『革命的戰士』招牌的魯迅。雖然他自己並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周圍的青年學生却都是激烈的分子，不是爲共產黨員，卽爲接近共產黨而被逮捕了。但他自己，當然也更受政府底壓迫了。各報紙上對於魯迅最初來的時候，就起來反對，製造種種惡辣的謠言。他在反動政府底白色恐怖的警戒之下祇是沉默地過着隱居的日子，急進的青年就起來責問他爲什麼沉默呢？他就這樣回答：開口不是被殺嗎？但當偵探的青年爲了探聽魯迅的思想去訪問，對魯迅露骨地滔滔不絕地講述蘇聯文學，反而慌張起來，恐怕自己也連累着和那樣的人談話的罪名，所以就不敢去報告上司。然而那時頂不幸的，就是他從廈門帶來的幾個學生。雖然從廈門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來到了上海，但魯迅忽然被排斥了，他們便流離顛沛了。這教魯迅是覺得頂難過的，他自己所受到社會上的變動什麼都不敢想像，說道：

「國民黨使有爲的青年陷入於陷阱中去。共產黨是車頭，國民黨是車身。共產黨引着國民黨而使革命成功，所以說是革命的恩人。在鮑羅廷前是受學生一同致敬禮的，由此可見青年是都很感激共產黨的了。現在突然給共產黨以片面的屠殺，這一點也有人會說舊式軍閥的方法是好的。他們最初是不容共產黨的，但到了最後仍然容留這一主義。他們底主義是討厭的，假使不容留牠或反抗牠，那倒是可以的。但國民黨所採取的方法，完全是卑鄙的，其殺人的方法亦很殘酷。例如同樣的殺，向腦殼放一鎗，那就可算是已經達到目的了，可是他們則不然，或切成一塊一塊或活埋，甚至於親兄弟也要殺的。我從這樣以來，就痛恨着國民黨，我的學生已有許多被殺了。」

魯迅那時是這樣對我說的。他還把當時的情形這樣地寫着：「……我的一種妄想是已破滅了。直到現在，我時刻有着一種樂觀。以爲壓迫或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因此這種老人假使一個個都死亡了的話，那末，中國也許比較是有生氣一點。但在現在我已知連這一點是辦不到的。殺戮青年的，爲什麼所殺的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憐惜。」（而已集）

這段文章，是他在因當時的壓迫而沉默着的時候，對於這加以揶揄的嘲罵答覆某君的通信之一節。他之沉默着的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爲「恐怖」，他還把這種「恐怖」，說是「

診察』這樣地寫着。在白色恐怖之下是不可以自由地發表有相當程度的思想。雖然這段文字的開頭他是聲明了自己底思想已轉變了，然而把他詳細地研究起來，這是不可能的，不過是暫時告退在那裏『診察』罷了。這段文字是已表示出了他之成長的新的階段。即從這以前是個進化論者，但他已揚棄了自己底思想的立場。不久他是找到了機會逃出了廣東，來到了上海了。

在上海，那時，由於國民黨底果斷政策而脫離了革命軍的共黨產的文學家們，都集攏在一起，於是『革命文學』的討論就鬧得滿城風雨。已不在前線做實際政治工作的他們，就拋棄了鎗桿而拿着筆桿了，而且非常地起勁。以從廣東逃回來的成仿吾爲領袖的馮乃超、李初梨等所估據的第二個創造社，還有從武昌逃出來的蔣光赤和錢杏邨等所領導的太陽社等，就是其主要的勢力。他們就依這革命底實際工作經驗，創立比以前的革命文學論更堅實的革命文學論；然而自負的英雄主義終於是宣告失敗了，他們以爲參加革命受了挫折的憤懣也可以幫助的，這就可以說是完全極左的機會主義者。他們就用這樣的調子來攻擊了魯迅的。魯迅因爲是已經知道了無產階級文學是怎麼樣的東西，應該是怎麼樣的東西，所以他專門翻譯介紹普力哈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底文學論及蘇聯底文藝政策，專門從事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之建設，而和英雄鬥戰鬥着。但因爲革命文學論鬧得太凶了，所以政府就來彈壓左翼

文學家，出版新書的書店被封，蘇聯作家，甚至至於契訶夫、安特列夫，總之，什麼都被禁止了。創造社太陽社也前後被解散了，其領袖們或逃亡國外，或反動化，或已死亡了。『他們想要打倒我，所以就鬧着假使不把魯迅打倒，則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學不能產生，結果，暴露出來所謂攻擊我的兒子的醜態，他們就先打倒了自己。他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是不夠的，並且沒有把握住客觀的現實形勢。英雄主義的公式主義者，在政治上是和中國共產黨的李立三路線同樣陷入於左傾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李立三是失敗了，他們也失敗了。現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擊我是反動，但他們什麼也不懂得，却都好像吃了辣椒似地，因為辣椒一時是會使人興奮的。』

因此他就說是很耽心他所以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一部分的青年。左翼作家聯盟是創造社太陽社的原班人馬及其他青年作家，推戴魯迅而組織成的（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但到了翌年（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強有力的左翼作家聯盟員五人被捕而祕密鎗斃了。聯盟對於這，曾將對各國的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爲人類進步而活動的著作家思想家的宣言分送全世界，其口號爲：反對中國的×色恐怖，反對各帝國主義底幫兇和直接鎮壓中國革命者，反對××黨和租界巡捕逮捕屠殺中國的著作家和思想家，反對××黨法西斯蒂壓迫文化，擁護中國××階級革命的文學戰線，擁護中國革命。那立刻響應到了美國、德國、法國及日本的左

翼刊物上。魯迅曾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底機關報前哨『紀念戰死者』專號上發表一篇題爲中國無產階級文學和先驅的血，這樣地寫着：中國無產階級文學是發生在今日和明天之交，成長於侮蔑和壓迫之中，終於在最黑暗之中用我們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百篇文章。我們的勞苦大眾一向是受盡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不僅不施與識字教育，且祇默默地委身於宰割和滅亡。繁瑣的象形文字還教他們不能得到自修的機會。知識的青年們應該想到自己所負的先驅的使命，和首先奏着戰號。這種戰號和勞苦大眾自身的反叛的吶喊是一樣地會使統治者恐怖，會使走狗文人羣起進攻，有的製造謠言，有的親自做偵探。而且這些都是秘密的匿名的，這就可以證明他們自身是黑暗的動物了。

統治者知道這種走狗文人不能對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面就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苛刻的出版法、通緝著作家！另一面就用最後的手段逮捕拘禁左翼作家，秘密地處以死刑，直至現在什麼都不聲明。……」

拿給我的紙張已經寫完了。雖然關於魯迅及其周圍活動着的，還有關於生動的中國成吉思汗，應該詳細地寫出來，但爲種種關係，我祇得這樣結束了。我會對魯迅說過想寫魯迅論，我把那腹稿告訴他之後，他立刻就寫了『搔癢不著讚何益，入木三分罵亦精』的鄭板橋底對聯給我。因此教我比被批評而覺悟更要留心批評。總之，希望好像入木三分似地能自負

，不管它有無益處。

一九三一年八月草稿於上海

一九三二年二月改稿於東京

同年發表於日本改造四月號

補記：魯迅最近沒有發表過小說，祇寫點社會小論文似的感想式的短文章，發表於報紙雜誌上的很多。這些現已印成單行本，如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准風月談等卻是。

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麼意味呢，而我偏苦於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

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於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裏，我纔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並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於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多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

因為這些幼稚的知識，後來便使我的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了，我的夢很美滿，豫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學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樣的進步了，總之那時是用了電影，來顯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時講義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還沒有到，教師便映些風景或時事的畫片給學生看，以用去這多餘的光陰。其時正當日俄戰爭的時候，關於戰事的畫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這一個講堂中，便須常常隨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都都為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然而我雖然自有無端的悲哀，却也並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歷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會館裏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裏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裏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願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着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裏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
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託，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

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釵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却也並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寞寂，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還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於且有成集的機會，無論如何總不能不說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雖使我不安於心，而懸揣人間暫時還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興。

所以我竟將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來，而且付印了，又因爲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稱之爲吶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於北京。（吶喊）

阿Q正傳的成因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

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
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於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終於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黨，即使真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

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寬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運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從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要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真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卽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於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即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於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曾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於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嘻嘻，善於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真是爲難……。」然而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

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篾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鏗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於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於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於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僚官」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之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事，以為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了七鎗。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栓子刀劍而死」，共分五節，現在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劍餘人鎗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為從了殺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會到場以前，刑場已預備好了劍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

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棹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容，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鋸，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常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鎗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震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鎗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又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真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敘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為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真是怎麼好……。

至於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

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爲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爲「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爲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譌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魯迅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裏還應該補叙一點的，是當我留心文學的時候，情形和現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爲文學家，所以並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並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裏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紹，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爲那時正盛行着排滿論，那些青年，都引那吶喊和反抗的作者爲同調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爲想知道作者的爲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紹介給中國。和學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會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鷗森外。

回國以後，就辦學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爲什麼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寫在『吶喊』的序文裏，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爲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爲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裏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此外的準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爲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爲『閒書』，而且將『爲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閒』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

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麼倍數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信對於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後。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牠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爲 Stylist。

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爲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脚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但倘有什麼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後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動和創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裏很不以爲然，於是小說裏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構的宏大

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幹，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髮，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學這一種方法，可惜學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裏，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他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後並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麼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燈下）

寫在「墳」後面

在聽到我的雜文已經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時候，我曾經寫了幾行題記，寄往北京去。當時想到便寫，寫完便寄，到現在還不滿二十天，早已記不清說了些甚麼了。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脚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後悔印行我的雜文了。我很奇怪我的後悔；這在我不大遇到的，到如今，我還沒有深知道所謂悔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這心情也隨即逝去，雜文當然仍在印行，只爲想驅逐自己目下的哀愁，我還要說幾句話。

記得先已說過：這不過是我的生活中的一點陳述。如果我的過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麼，也就可以說，我也曾工作過了。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不過我曾經嘗得，失望無論大小，是一種苦味，所以幾年以來，有人希望我動動筆的，只要意見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夠支撐，就總要勉力寫幾句東西，給來者一些極微末的歡喜，人生多苦辛，而人們有時却極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點筆墨，給多嘗些孤獨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說雜感之外，逐漸又有了長長短短的雜文十多

篇。其間自然也有爲賣錢而作的，這回就都混在一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這樣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這樣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終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麼。比方做土工的罷，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築臺呢還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築臺，也無非要將自己從那上面跌下來或者顯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當然不過是埋掉自己。總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陰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過如此，但也爲我所十分甘願的。

然而這大約也不過是一句話。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却也喜歡將陳迹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薰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爲放達，其實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的。

所以這書的印行，在自己就是這麼一回事。至于對別人，記得在先也已說過，還有願使偏愛我的文字的主顧得到一點喜歡；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嘔吐，我也很高興的。別的就什麼意思也沒有了。倘若硬要說出好處來，那麼，其中所介紹的幾個詩人的事，或者還不妨一看；最末的論『費厄潑賴』這一篇，也許可供參考罷，因爲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却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

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有時批評說，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我自然不想太欺騙人，但也未嘗將心裏的話照樣說盡，大約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鼻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變壞，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

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是也伴着哀愁，怕于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今天所要說的話也不過是這些，然而比較的却可以算得真實。此外，還有一點餘文。記得初提倡白話的時候，是得到各方面劇烈的攻擊的。後來白話漸漸進行了，勢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轉而引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運動』。又有些人便主張白話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話要做得好，仍須看古書。前一類早已二次轉舵，又反過來嘲罵『新文化』了；後二類是不得已的調和派，只希圖多留幾天僵屍，到現在還不少。我曾在雜感上掙擊過的。

新近看見一種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說起要做好白話須讀好古文，而舉例為證的人名中，

其一却是我。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慄。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爲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牠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沈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為懶惰罷，往往自己寬解，以爲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爲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爲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跟着起來便該不同了，倘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以文字論，就不必更在舊書裏討生活，却將活人的唇舌作爲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語言，更加有生氣。至于對於現在人民的語言的窮乏欠缺，如何救濟，使他豐富起來，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也須在舊文中取得若干資料，以供使役，但這並不在我現在所要說的範圍以內，姑且不論。

我以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還能夠博探口語，亦改革我的文章，但因為懶而且忙，至今沒有做。我常疑心這和讀了古書有些關係，因為我覺得古人寫在書上的可惡思想，我的心裏也常有，能否忽而奮勉，是毫無把握的。我常常詛咒我的這思想，也希望不再見於後來的青年。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現在呢，思想上且不說，便是文辭，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璜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這和勸讀古文說可有相關，但正在復古，也就是新文藝的試行自殺，是顯而易見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話合成的雜集，又恰在此時出版了，也許又要給讀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還不能毅然決然將他毀滅，還想藉此暫時看看逝去的生活的餘痕，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壠中，無非埋着曾經活過的軀殼。待再經若干歲月，又當化為煙埃，并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畢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記起了幾句陸士衡的弔曹孟德文，便拉來給我的這一篇作結——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緞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

『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爲文學史上的陳迹了，但在那時，却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並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却又懷疑於自己的失望，因爲我所見過的

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於『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爲什麼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爲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爲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於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隱，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爲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

意氣却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不料這大口竟誇得無影無踪。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後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後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爲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爲這麼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爲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於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却覺得也很難。因爲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爲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

的：

『並不願將自以爲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着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爲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

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於上海寓居記。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導言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澧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于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裏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却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

「；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裏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萊夫（A. Antreev）式的陰冷。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愛憎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後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劃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二 心 集 序 言

這是一九三〇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

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于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里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所搭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的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爲然的人，只有這樣纔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里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却又爲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纔有『庶幾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着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于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爲『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

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平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品報』上就發表過『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于『武臣』之說，却是很有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于腹誹，『臣罪當誅』今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經。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 (Franz Meining)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喫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纔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了，並且仿『三閒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于牆』，——但後來却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

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牠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墳』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和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却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併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

我和「語絲」的終始

同我關係較爲長久的，要算語絲了。

大約這也是原因之一罷，『正人君子』們的刊物，曾封我爲『語絲派主將』，連急進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還說我是『語絲』的『指導者』。

自然，『主將』和『指導者』並不是壞稱呼，被晨報館所壓迫，也不能算是恥辱，老人該受青年的教訓，更是進步的好現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但是，『不虞之譽』，也和『不虞之毀』一樣地無聊，如果生平未曾帶過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頌揚道『你真像拿破崙呀！』則雖是志在做軍閥的未來的英雄，也不會怎樣舒服的。我並非『主將』的事，『一九二七年』早已聲辯了——雖然似乎很少效力——這回想要寫一點下來的，是我從來沒有受過晨報館的壓迫，也並不是和孫伏園先生兩個人創辦了語絲。這的創辦，倒要歸功於伏園一位的。

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並沒有什麼稿件，於是就有人傳說，我是特約撰述，無論投稿多少，每月總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據我所聞，則晨報館確有這一種太上作者，但我並非其中之一，不過因爲先前的師生，——恕我僭妄，暫用這兩個字——關係罷，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爲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

並且爲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

那時的法蘭斯，威爾士，蕭，在中國是大有威力，足以嚇倒文學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萊兒一般，所以以那時而論，形勢實在是已經非常嚴重。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地跑到我的廂裏來爲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

『我辭職了。可惡！』

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忿，因爲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很容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園爲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

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週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

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本書，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那時我不在場，不知道所用是什麼書，是一次便得了語絲的名，還是點了好幾次，而會將不像名稱的廢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綫；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只是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爲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却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却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陳源教授痛斥『語絲派』的時候，說我們不敢直罵軍閥，而偏和握筆的名人爲難，便由於這一點。但是，吐吧兒狗險於吐狗主人，我們其實也知道，所以隱約其詞者，不過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獻功時，必須詳加說明，比較地費些力氣。

，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處而已。

當開辦之際，努力確也可驚，那時做事的，伏園之外，我記得還有小峯和川島，都是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對，自疊報紙，還自己拿到大眾聚集之處去兜售，這真是青年對於老人，學生對於先生的教訓，令人覺得自己只用一點思索，寫幾句文章，未免過於安逸，還須竭力學好了。

但自己賣報紙的成績，聽說並不佳，一紙風行的，還是在幾個學校，尤其是北京大學，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則不大有人顧問。倘若說，北京大學的法政，經濟科出身諸君中，絕少有語絲的影響，恐怕是不會很錯的。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着對我說道——

『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

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却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裏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譚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說的名目，來批評我的作品的經過的極伶俐而省事的話道：『魯迅始於「吶喊」而終於「彷徨」』（大意），我以為移來敘述我和語絲由始以至此時的歷史，倒是很確切的。

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裏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裏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裏也耿耿了好幾天。

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原定是撰稿者同時負擔印費的，我付了十元之後，就不見再來收取了。因為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贏餘。於是小峯就被尊為『老板』，但這推算並非美意，其時伏園已另就京報副刊編輯之職，川島還是揭亂小孩，所以幾個撰稿者便只好辦住了多睜眼而少開口的小峯，加以榮名，勤令拿出贏餘來，每月請一回客。這『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方法果然奏效，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舖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着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我和語絲的淵源和關係，就不過如此，雖然投稿時多時少。但這樣地一直繼續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實際上是誰在編輯。

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爲衆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到得廈門，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為相離已遠，不受催促，責任便覺得輕；二者因為人地生疏，學校裏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的口角，不值得費紙墨。倘能做魯賓孫教書記或蚊蟲叮卯脞論，那也許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沒有這樣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點極瑣碎的文字。這年底到了廣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廈門相同的；第二，先是忙於事務，又看不清那裏的情形，後來頗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那裏的敵人的治下去發表。

不願意在有權者的刀下，頌揚他的威權，并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有的態度。所以語絲在北京雖然逃過了段祺瑞及其吧兒狗們的撕裂，但終究被『張大元帥』所禁止了，發行的北新書局，且同時遭了封禁，其時是一九二六年。

這一年小峯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議語絲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囑我担任編輯。

以關係而論。我是不應該推託的。於是担任了。從這時起，我纔探問向來的編法。那很簡單，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除。所以我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書局，由那裏逕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餘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因為語絲是又有愛登碰壁人物的牢騷的習氣的，所以最初出陣，尙無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別一團體，而發生意見，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語絲暫時發生關係，待到功成名遂，當然也就淡漠起來。至於因環境改變，意見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爲不少，因此所謂『社員』者，便不能有明確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幾次，無不刊載，此後便放心發稿，和舊社員一律待遇了。但經舊的社員紹介，直接交到北新書局，刊出之前，爲編輯者的眼睛所不能見者，也間或有之。

經我担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爲登投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却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

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敘事夾在這裏太冗長了，且待下回再說罷。

但語絲本身，却確實也在消沈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餘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着我託辭不載的事由單。

還有一種顯著的變遷是廣告的雜亂。看廣告的種類，大概走就可以推見這刊物的性質的。例如『正人君子』們所辦的現代評論上，就會有金城銀行的長期廣告，南洋華僑學生所辦的秋野上就能見『虎標良藥』的招牌。雖是打着『革命文學』旗子的小報，只要看那上面的廣告大半是花柳藥和飲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讀者，仍然和先前的專講妓女戲子的小報的人們同流，現在不過用男作家，女作家來替代了倡優，或捧或罵，算是在文壇上做工夫。語絲初辦的時候，對於廣告的選擇是極嚴的，雖是新書，倘社員以為不是好書，也不給登載。因為且

同人雜誌，所以投稿者也可行使這樣的職權。聽說北新書局之辦北新半月刊，就因爲在語絲上不能自由登載廣告的緣故。但自從移在上海出版以後，書籍不必說，連醫生的診例也出現了，襪廠的廣告也出現了，甚至於立愈遺精藥品的廣告也出現了。固然，誰也不能保證語絲的讀者決不遺精，況且遺精也並非惡行，但善後辦法，却須向申報之類，要穩當，則向醫學報的廣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封幾詰責的信件，又就在語絲本身上登了一篇投來的反對的文章。

但以前我也曾盡了我的本分。當襪廠出現時，曾經當面質問過小峯，回答是『發廣告的人弄錯的』；遺精藥出現時，是寫了一封信，並無答覆，但從此以後，廣告却也不見了。我想，在小峯，大約還要算是讓步的，因爲這時對於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書局致送稿費，不只負發行之責，而語絲也因此並非純粹的同人雜誌了。

積了半年的經驗之後，我就決計向小峯提議，將語絲停刊，沒有得到贊成，我便辭去編輯的責任；小峯要我尋一個替代的人，我於是推舉了柔石。

但不知爲什麼，柔石編輯了六個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辭職了。

以上是我所遇見的關於語絲四年中的瑣事。

魯迅在東京時的文學修養

知堂

我爲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託都一律謝絕了，因爲我覺得多寫有點近乎投機學時髦，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事實，並不是普通官鄉要則裏的那些祝文祭文。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却也沒價值，因爲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蹟，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爲我在那裏邊曾經提及，却沒有敘述。這也成爲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

南京爲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東京及仙臺爲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東京爲後期。這里我所要說的只是後期，因爲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臺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二三十種罷。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還有一篇露俄（Victor Hugo）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同陳獨秀在國民日日新聞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囂俄成爲我們的愛讀書，蒐來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書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爲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爲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

，在校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麼。又有人（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有什麼用處？答云：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了，確實的人數裏有一位許季黻（壽裳），聽說還有袁文獻，但他往西洋去後就沒有通信。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會根據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雜誌的原稿紙却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實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册域外小說集。第一册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

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犖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籍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瀾興，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羣益書社願意重印，豫才又加了一篇新序（此文係署我的名字，但實豫才所作，故苦雨齋序跋文中未曾收入。）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的，可以抄在這里：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爲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爲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却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得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就在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爲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

。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註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册印了一千本，第二册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鴻林）代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畫甚為贊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一家綢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黻也。

域外小說集兩册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上邊可以看出一點特性來，卽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Leonid Andrejev）作11篇，伽爾洵（V. Garshin）作1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Fen Tobit），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介紹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着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

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爲主，其是丹麥瑞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義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賣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弗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樟屋書店向九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樟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Aus Fremden Zungen（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諷草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是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N. Lermontov）的當代英雄，契訶夫（A. Tchekhov）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V. Korolenko），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N. Gogol），死靈魂還居第二位，第

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爲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爲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歷史癖與考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捷克有納盧陀(Neruda)，扶爾赫列支奇(Vrchlicki)，亦爲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不佛林多(Pravrinta)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加利則有詩人裴象飛(Petőfi Sándor)，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爲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象飛爲之繼，甚致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卽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趣。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沈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趣

，德國則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拉如是說常在案頭，曾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册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裏多年沒有拏出來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年（一九〇七）同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滄），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治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 Korbe），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財力不繼而散。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邊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城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han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怕印刷為難，始將這些古字再改為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却並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只兩點，見樛字必覺

得討嫌，卽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篆字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爲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曾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爲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大炎先生每戲呼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藏，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云是「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了。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里也只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託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此打住了。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

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卽不知爲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爲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者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

這樣的戰士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鐵片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各有戰幟，繡出各樣的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顯然倒地——然而祇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

「他終於在無物之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利者。……

「但他舉起了投槍！」

北京通信

蘊儒，培良兩兄：

昨天收到兩份豫報，使我非常快活，尤其是見了那副刊。因為牠那蓬勃的朝氣，實在是
在我先前的豫想以上。你想：從有着很古的歷史的中州，傳來了青年的聲音，彷彿在豫告這
古國將要復活，這是一件如何可喜的事呢？

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
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
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

，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塗，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的罪孽。

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我爲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

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中國古來，一向是最注重於生存的，什麼『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咧，什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咧，竟有父母願意兒子吸鴉片的，一吸，他就不至於到外面去，有傾家蕩產之虞了。可是這一流人家，家業也決不能長保，因爲這是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所以到後來，他就活不下去了。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這實在是無可奈何，因爲我們要生活，而且不是苟活的緣故。

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的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慮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着，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眞眞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麼？我以爲人類爲了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到是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們總得將青年從牢獄裏引出來，路上的危險，當然是有的，但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險，無從逃避。想逃避，就須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監獄式的生活了，可是眞在第一監獄裏的犯人，都想早些釋放，雖然外面並不比獄裏安全。

北京暖和起來了；我的院子裏種了幾株丁香，活了；還有兩株榆葉梅，至今還未發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鬧了一個小亂子，許多學生被打傷了；聽說還有死的，我不知道確否。其實，只要

聽他們開會，結果不過是開會而已，因為加了強力的壓迫，遂鬧出開會以上的事來。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

夜深了，就此擱筆，後來再談罷。

魯迅。五月八日夜。

論睜了眼看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猛進十九期）。誠然，必須敢于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倘使并正視而不敢，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然而，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

但現在我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却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至于說對外却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

再回到「正視」問題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自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羣人圍着呆看，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髮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着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爲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吓！

我並未實驗過，但有時候想；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大概只好閉了眼睛。繼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于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

就有了難題。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自然只以與終于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并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過大帽子一壓，便成了半個鈞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是在出風頭，引異性；且遷怒于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發表機關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可以不取白話，或排斥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律刷成黑色，也還有破磁可割，粉筆可書，真是窮于應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却要隨時發表，雖然很有流弊，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于實寫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尙。和尙多矣，但披這樣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于別的人們，則早在册子裏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于奈何不得。然而後來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圓』

纔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癩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 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差之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後來的昏人，却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蘸紙火盆，妄希福祐，是見于元典章的；劇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爲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恆言中還說終于一同自殺的；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丈夫服後便全愈了。凡有缺陷，一經作者粉飾，後半便大抵改觀，使讀者落誣妄中，以爲世間委實儘夠光明，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

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却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爲，因爲我們已經籍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

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花，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這是互爲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牠更油。倘以油爲上，就不必說；否則，當參入別的東西，或水或鹼去。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

現在，氣象似乎一變，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瞞的心，用欺瞞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只可以嚇唬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滿足地以爲中國就要中興。可憐他在『愛國』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或者本來就閉着。

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七月二十二日。)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

一 解題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先生曾經講起『費厄潑賴』(Fair Play)，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謂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却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不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迴避觸目起見，即並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為都近于卑怯。我以為『打

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愛。至于「打落水狗」，則並不如此簡單，當看狗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別人打落者，（3）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于無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與狗奮戰，親手打其落水，則雖用竹竿又在水中從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者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足使我們奉為楷模。但我以為倘須附加一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鬪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堂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為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為無論牠怎樣狂吠，其實並不解什麼「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牠就先聳身一搖，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于是夾着尾巴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牠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已懺悔，不再出而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

總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無論牠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論叭兒狗尤非打落水裏，又從而打之不可

叭兒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稱為西洋狗了，但是，聽說倒是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

裏常常得到金獎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我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敵麼？牠却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爲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牠的事業，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象養，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街的時候，頸上拴了細鍊子跟在腳後跟。

這些就應該先行打牠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牠自墜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爲之歎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了，因爲牠們雖然非常勢利，但究竟還有些像狼，帶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騎牆。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係。

四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牠爬上岸了之後的態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爲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牠的。

現在的官僚和士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說是赤化，是共產；民國元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康黨，後是說革黨，甚至于到官裏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染紅頂子』之意。可是革命終于起來了，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臭臭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新氣，『文明』得可以；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他們爬上來罷。于是牠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中國又一天一天沈入黑暗裏。一直到現在，遺老不必說，連遺少也還是那麼多。這就因爲先烈的好心，對於鬼蜮的慈悲，使牠們繁殖起來，而此後的明白青年，爲反抗黑暗計，也就要花費更多的氣力和生命。

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後暫時稱爲『女俠』，現在是不大聽見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鄉就到了一個都督。——等于現在之所謂督軍，——也是她的同志；王金發。他捉住了殺害她的謀主，調集了告密的案卷，要爲她報仇。然而終于將那謀主釋放了，據說是因爲已經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罷。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却被袁世凱的走狗鎗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釋放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壽終正寢』了，但在那里繼續跋扈出沒着的也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

的故鄉也還是那樣的故鄉，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長在可爲中國模範的名城裏的楊蔭榆女士和陳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齊天。

五 論場臺人物不當與『落水狗』相提並論

『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喫。

俗語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也許太刻薄一點罷，但仔細想來，却也覺得並非咬人作惡之談，乃是歸納了許多苦楚的經歷之後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說，其成因大概有二：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前者且勿論；後者的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場臺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場臺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爲縱惡。即以現在而論，因爲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轉輪，壞人靠着冰山，恣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憐，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噬嚙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不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爲公理已伸，俠義這時正在我這裏。殊不知牠何嘗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了，食料是早經儲足的了，並且都在租界裏。雖然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以引起人們的惻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仍舊先咬老實人開手，

『投石下井』，無所不爲，尋起原因來，一部分就正因爲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說得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仁人們或要問：那麼，我們竟不要『費厄濼賴』麼？我可以立刻回答：當然是要的，然而尙早。這就是『請君入甕』法。雖然仁人們未必肯用，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士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爲這『費厄濼賴』也是其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却對他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喫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連要不『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

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爲倘不如此，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還沒有劃一。要是對『落水狗』和『落水人』獨獨一視同仁，實在未免大偏，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自由平等並非不好，在中國却微嫌太早一樣。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濼賴』精神，我以爲至少

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但現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爲人也則辯之，爲狗也則不管之，爲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護壞人。因爲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蹶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論者又『勿報復』呀，『仁恕』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却發生實效，並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爲然，而壞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爲佔了便宜，何嘗改悔；並且因爲是早已營就三窟，又善于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却不聽你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却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七 論『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兩種醫，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推而廣之，怨聲一定還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邇治。例如民國的通禮是鞠躬，但若有入以為不對的，就獨使他磕頭。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笞刑的，倘有人以為肉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碗筷飯菜，是為今人而設的，有願為燧人氏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喫牛肉；再造幾千間茅屋，將在大宅子裏仰慕堯舜的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裏面；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啣冤坐汽車。這樣一辦，真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就可以清淨許多罷。

但可惜大家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厄潑賴』尤其有流弊，甚至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估便宜。例如劉百昭毆女師大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恢復，陳西滢鼓動女大學生估據校舍時，却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吧？』毆而且拉，而且搬，是有劉百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厄』氣味之故。但這『費厄』却又變成弱點，反而給人利用了來替章士釗的『遺澤』保鏢。

八 結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麼兩派之爭，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罷。但我敢斷言，改革者對於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鬆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喫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

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爲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爲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却奉爲人的處世金鍼了。

中國人不但『不爲戒首』，『不爲禍始』甚至於『不爲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鬪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活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爲最先』

，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羣衆，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鏗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縫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罵，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人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佯爲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擡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爲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此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燈下漫筆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沈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喫。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却還有的；商民也自有私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

里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還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着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子，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舖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高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

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開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說：咱們嚮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方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方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喫，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人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願，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

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隳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里——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闢路的，所以說：『爲聖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種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爲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喫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喫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山海的珍珠，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 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於外人有着一「魅力」的這東西

。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着 democracy 呀，什麼什麼呀，而被魅力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守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醜。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爲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整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醜，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醜呢？待到享受盛醜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爲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爲作奴的贊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醜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纔是眞有良心的眞可

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喫，但也可以喫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陞而爲『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處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可便飯，有西餐。但

茅簷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饑餓；有喫燒烤的身價不賚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却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夠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喫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喫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四月二十九日。）

記談話

（培良）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週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他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于冷靜，過于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着熱烈的希望，發揮着豐富的情感的。在這一次談話裏，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

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裏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梭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裏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忒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于『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裏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梭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着的德文書裏挑

出來的。

那一堆書裏文學書多得很，爲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者的喫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將牠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喫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爲不受上司的辱罵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裏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着。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爲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殺害

他，他子是一變而爲向社會復讎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着，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評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盡然。我的家裏還住着一個鄉下人，因爲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裏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牠，甚至于連破壞者也誇耀牠，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裏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爲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纔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

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到他是什麼意思；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纔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着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起明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略論中國人的臉

大約人們一遇到不大看慣的東西，總不免以爲他古怪。我還記得初看見西洋人的時候，就覺得他臉太白，頭髮太黃，眼珠太淡，鼻梁太高，雖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說出租理由來，但總而言之：相貌不應該如此。至于對於中國人的臉，是毫無異議：即使有好醜之別，然而都不錯的。

我們的古人，倒似乎並不放鬆自己中國人的相貌。周的孟軻就用眸子來判胸中的正不正，漢朝還有相人二十四卷。後來鬧這玩藝兒的尤其多；分起來，可以說有兩派罷：一是從臉上看出他的智愚賢不肖；一是從臉上看出他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榮枯。于是天下紛紛，從此多事，許多人都戰戰兢兢地研究自己的臉。我想鏡子的發明，恐怕這些人和小姐們是大有功勞的。不過近來前一派已經不大有人講究，在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搗鬼的都只是後一派了。

我一向只留心西洋人。留心的結果，又覺得他們的皮膚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紅點，即因爲顏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們之黃。尤其不好的是紅鼻子，有時簡直像是將要熔化的蠟燭油，彷彿就要滴下來，使人看得慄慄危懼，也不及黃色人種的較爲隱晦，也見得較爲安全。總而言之：相貌還是不應該如此的。

後來，我看見西洋人所畫的中國人，纔知道他們對於我們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談或者安兒生童話中的插畫，現在不很記得清楚了。頭上戴着拖花翎的紅纓帽，一條辮子在空中飛揚，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這些都是滿洲人連累我們的，獨有兩眼歪斜，張嘴露齒，却是我們自己本來的相貌。不過我那時想，其實並不盡然，外國人特地要奚落我們，所以格外形容得過度了。

但此後對於中國一部分人們的相貌，我也逐漸感到一種不滿，就是他們每看見不常見的事件或華麗的女人，聽到有些醉心的說話的時候，下巴總要慢慢掛下，將嘴張了開來。這實在不大雅觀，彷彿精神上缺少着一樣什麼機件。據研究人體的學者們說，一頭附着在上顎骨上，那一頭附着在下顎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大的。我們幼小時候想喫核桃，必須放在門縫裏將牠的殼夾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齒好，那咬筋一收縮，便能咬碎一個核桃。有着這麼大的力量的筋，有時竟不能收住一個並不沈重的自己的下巴，雖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總以為究竟不是十分體面的事。

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閑是善于做諷刺文字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着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儘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

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着一點什麼。這多餘着的東西，他就給牠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 + 獸性 = 西洋人

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譏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于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了馴順。野牛成爲家牛，野豬成爲豬，狼成爲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歡，于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着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爲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 + 家畜性 = 某一種人

中國人的臉上真可有獸性的記號的疑案，暫且中止討論罷。我只要說近來却在中國人理想的古今人的臉上，看見了兩種多餘。一到廣州，我覺到比我所從來的廈門豐富得多的，是電影，而且大半是『國片』，有古裝的，有時裝的。因爲電影是『藝術』，所以電影藝術家便將這兩種多餘加上去了。

古裝的電影也可以說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戲；至少，決不至于有大鑼大鼓將人的耳

宋震聲。在『銀幕』上，則有身穿不知何時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緩慢地動作，臉正如古人一般死，因為要顯得活，便只好加上些舊式戲子的昏庸。

時裝人物的臉，只要見過清朝光緒年間上海的吳友如的畫報的，便會覺得神態非常相像。畫報所畫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喫醋，所以臉相都狡猾。這精神似乎至今不變，國產影片中的人物，雖是作者以為善人傑士者，眉宇間也總帶些上海洋場式的狡猾。可見不如此，是連善人傑士也做不成的。

聽說，國產影片之所以多，是因為華僑歡迎，能夠獲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帶了孩子去指給他們看道：『看哪，我們的祖國的人們是這樣的』。在廣州似乎也受歡迎，日夜四場，我常見看客坐得滿滿。

廣州現在也如上海一樣，正在這樣地修養他們的趣味。可惜電影一開演，電燈一定熄滅，我不能看見人們的下巴。

（四月六日。）

記念劉和珍君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爲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羣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爲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爲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爲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牠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爲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爲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雖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却覺得有點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爲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爲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纔有人指着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纔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却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爲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

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胡同，質屋授課之後，她纔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着，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爲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纔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纔知道上午有羣衆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鎗，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爲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着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羣君的。而且又證明着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爲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沈默呵，沈默呵！不在沈默中爆發，就在沈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鎗，立仆；同去的楊德羣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沈勇而友愛的楊德羣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爲證；只有一樣沈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裏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鎗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却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汗……。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却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免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却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自觀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爲之感歎。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是爲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四月一日。）

理想

新青年的五卷四號，隱然是一本戲劇改良號，我是門外漢，開口不得；但見再論戲劇改良這一篇中，有『中國人說到理想，便含着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話，卻令我發生了追憶，不免又要說幾句空談。

據我的經驗，這理想價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來的事。民國以前，還未如此，許多國民，也肯認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國元年前後，理論上的事情，著著實現，於是理想派——深淺真僞現在姑且弗論——也格外舉起頭來。一方面卻有舊官僚的攘奪政權，以及遺老

受冷不過，豫備下山，都痛恨這一類理想派，說什麼聞所未聞的學理法理，橫互在前，不能大踏步搖擺。於是沈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種兵器，有了這利器，纔將「理」字排行的元惡大憝，一律肅清。這利器的大名，便叫「經驗」。現在又添上一個雅號，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實」。

經驗從那里得來，便是從清朝得來的。經驗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這時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財強種的時候，而且帶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貨，愛國之士，義當排斥。所以一轉眼便跌了價值；一轉眼便遭了嘲罵；又一轉眼，便連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時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與衆共棄的大罪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種外來的舊理想；現在「經驗」既已登壇，自然株連着化爲妄想，合不分首從，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宗的成規。這一踏不覺過了四五年，經驗家雖然也增加了四五歲，與素未經驗的生物學學理——死——漸漸接近，但這與衆不同的中國，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學習諸公，早經竭力大叫，說他也得了經驗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腳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

奴才的腳底下學得。奴才的數目多，心傳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時代，那便是理想單被經薄，理想家單當妄人，還要算是幸福微幸了。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宗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却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學理法理，既是洋貨，自然完全不在話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許多經驗家，理想經驗雙全家，經驗理想未定家，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這事不但溢出了經驗的範圍，而且又添上一個理字排行的厭物。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敢妄談。經驗諸公，想也未會經驗，開口不得。

沒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請教受人輕薄的理想家了。

雷峯塔的倒掉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分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峯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爲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璜。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鐘』『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不在『！』形驚嘆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閨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迹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彷彿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

可缺了呵！『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于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歎。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却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託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脚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衆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却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爲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爲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爲利乎？罵

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爲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爲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讎敵，因爲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尙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却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猯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

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即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麼？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着。

雷峯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既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却難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峯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于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的所得，却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爲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盡。尙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爲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峯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于雷峯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二月六日。)

在 廣 州

我抱着和愛而一類的夢，到了廣州。白天來訪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懷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幾個熱心于改革的，還希望我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這熱誠很使我感動，但我終於說是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輕輕地推却了。那當然要使他們很失望的，過了幾天，尸一君就在『新時代』上說：

「……我們中幾個很不以他這句話爲然。我們以爲我們還有許多可罵的地方，我們正想罵罵自己，難道魯迅先生竟看不出我們的缺點麼？……」

其實呢，我的話一半是真的。我何嘗不想了解廣州，批評廣州呢。無奈概自被供在大鐘

樓上以來，工友以我爲教授，學生以我爲先生，廣州人以我爲「外江佬」，孤子特立，無從考查。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爲特別而記住的 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Tiu-na-na* 而已。

這兩句有時也有用。那是我已經搬在白雲路寓屋裏的時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個竊取電燈的偷兒，那管屋的陳公便跟着一面罵，一面打。罵了一大套，而我從中只聽懂了這兩句。然而似乎已經全懂得，心裏想：「他所說的，大約是因爲屋外的電燈幾乎 Hanbaran 被他偷去，所以要 *Tiu-na-na* 了。」于是就彷彿解決了一件大問題似的，即刻安心歸坐，自去再編我的『唐宋傳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測是無妨的，倘若據以論廣州，卻未免太鹵莽罷。

但雖只這兩句，我卻發見了吾師太炎先生的錯處了。記得先生在日本給我們講文字學時，曾說『山海經』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這古語至今還留存在廣東。讀若 *Tiu*。故 *Tiuheil* 字，當寫作『州戲』，名詞在前，動詞在後的。我不記得他後來可曾將此說記在『新方言』裏，但由今觀之，則『州』乃動詞，非名詞也。

至于我說無甚可以攻擊之處的話，那可的確是虛言。其實是，那時我于廣州無愛憎，因

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游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游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給一處做文章時，我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然而終於沒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里躲』，宋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於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說「在北平時受着

種種壓迫，種種刺激，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激，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而編輯者還很客氣，用案語聲明着這是對於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慫恿，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卻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喫一頓飯，有時只喫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鐘樓上」就是預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了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說出，終於反而擱下了。那兩句話是：

「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

但拉狄克的話，是爲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

後給自己唱了挽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沈沒，證明着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但我初到廣州的時候，有時確也感到一點小康。前幾年在北方，常常看見迫壓黨人，看捕殺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見了。後來纔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然而在夢中時是委實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鐘樓上』，文字也許不如此。無奈已經到了現在，又經過自觀『打倒反革命』的事實，純然的那時的心情，實在無從追躡了，現在就只好是這
樣罷。

一點比喻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喫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却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爲

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他恩惠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里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

？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Schopenhauer 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麼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ga und Paralipomena 裏有着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羣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牠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牠們靠近時，却又喫了照樣的苦。但牠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于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牠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纔有效力罷，因為牠們彼此的守着距離，

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豬們中夾着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樣叫，牠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却是豪豬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由聾而啞

醫生告訴我們：有許多啞子，是並非喉舌不能說話的，只因爲從小就耳朵聾，聽不見大人的言語，無可師法，就以爲誰也不過張着口嗚嗚啞啞，他自然也只好嗚嗚啞啞了。所以勃蘭兌斯歎丹麥文學的衰微時，曾經說：文學的創作，幾乎完全死滅了。人間的或社會的無論怎樣的問題，都不能提起感興，或則除在新聞和雜誌之外，絕不能惹起一點論爭。我們看不見強烈的獨創的創作。加以對於獲得外國的精神生活的事，現在幾乎絕對的不加顧及。於是精神上的『聾』，那結果，也就招致了『啞』來。（『十九世紀文學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這幾句話，也可以移來批評中國的文藝界，這現象，並不能全歸罪於壓迫者的壓迫，五四運動時代的啓蒙運動者和以後的反對者，都應該分負責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沒有譯出什麼有價值的書籍來，後者則故意遷怒，至罵翻譯者爲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瀾，有一時期，還至于連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讀者參考時，也就詆之曰『銜學。』

今竟何如？三開間店面的書鋪，四馬路上還不算少，但那裏面滿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尋一部巨冊，真如披沙揀金之難。自然，生得又高又胖並不是偉人，做得多而且繁也決不就是名著，而况還有『剪貼』。但是，小小的一本『什麼ABC』裏，却也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一道濁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乾淨而澄明，但蒸溜了濁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許多杯淨水在。

因爲多年買空賣空的結果，文界就荒涼了，文章的形式雖然比較的整齊起來，但戰鬥的精神却較前有退無進。文人雖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爲了出力的吹，穀子大了，裏面反顯得更加空洞。於是誤認這空虛爲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說給讀者們；其甚者還至於擺出他心的腐爛來，算是一種內面的寶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試看今年的選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續』之感。用糞穀來養青年，是決不會壯大的，將來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樣，可看尼采所描寫的『末人』。

但紹介國外思潮，翻譯世界名作，凡是運輸精神的糧食的航路，現在幾乎都被聾啞的製造者們堵塞了，連洋人走狗，富戶贅郎，也會來哼哼的冷笑一下。他們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聾而啞，枯涸渺小，成爲『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孀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甘爲泥的作者和譯者的奮鬥，是已經到了萬不可緩的時候了，這就是竭力運輸些切實的精神的糧食，放在青年們的周圍，一面將那些聾啞的製造者送回墨洞和朱門裏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怎麼寫

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像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沈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彷彿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牠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沈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

，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牠，但我愈想，牠却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着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纔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着蚊咬的傷，直到牠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搔，直到牠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喫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只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况千叮萬叮，而况一刀一鎗，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罷。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迹。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

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罷，橫豎也只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迹永遠鮮活，也只足證明文人是微倖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這麼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

在洪水第二十九篇上，達夫先生有一篇『日記文學』，他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叙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叙述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于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

同。倘有讀者只執滯于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爲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爲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于『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志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爲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穽，於是只得『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嘆』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爲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罣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爲不在假，而在以假爲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獅獅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衆裝出撒錢模樣道：Hu azaa! Huzaa 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Huzaa 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識着這是戲法，而全心沈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却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牠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爲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爲牠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却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爲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尙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爲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做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

革命與文學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麼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於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什麼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並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儘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喫起牠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於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於嚇窺，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爲沈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麼聲音了！至于富有什麼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爲怒吼。怒吼的文學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

早有復讎的文學，然而他的恢復，是靠歐洲大戰的。

(二) 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噓而轉入行動，大家忙着革命，沒有閒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麵包喫，且來不及，那裏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鬭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沈寂了。

(三) 等到大革命成功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餘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的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於舊社會的破懷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到有意義，一方面對於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於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弔舊社會的滅亡——輓歌——也是革命之後會有的文學。有些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

無須加以這麼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着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响到他們自身的一切，於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於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裏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輓歌來。但是懷舊，唱輓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輓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輓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於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於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於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响。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式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响；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並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遊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些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章，多是弔亡輓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

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後的影響，再往後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喫飽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麼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裏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齣戲裏，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裏的脚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託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纔能有錢去讀書，纔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於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

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就是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在中國的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於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於戰餘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喫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於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餘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切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有許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經講得很詳細了，我不必再說。我以爲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右翼』作家的。爲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裏，最容易高談澈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Salon』是客廳的意思，坐在客廳裏談談社會主義，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並想不到實行的。這種社會主義者，毫不足靠。並且在現在，不帶點廣義的社會主義的思想的作家或藝術家，就是說工農大衆應該做奴隸，應該被虐殺，被剝削的這樣的作家或藝術家，是差不多沒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並沒有寫過文藝作品。（當然，這樣的作家，也還不能說完全沒有，例如中國的新月派諸文學家，以及所說的墨索里尼所寵愛的鄧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着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

，一到革命進行，就容易失望。聽說俄國的詩人葉遂寧，當初也非常歡喜十月革命，當時他叫道：『萬歲，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說『我是一個布爾塞維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後，實際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一回事，終於失望，頹廢。葉遂寧後來是自殺了的，聽說這失望是他的自殺的原因之一。又如畢力涅克和愛倫堡，也都是好例子。在我們辛亥革命時也有同樣的例。那時有許多文人，例如屬於『南社』的人們，開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們抱着一種幻想，以為只要將滿洲人趕出去，便一切都恢復了『漢官威儀』，人們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帶，大步地在街上走，誰知趕走滿清皇帝以後，民國成立，情形卻全不同，所以他們便失望，以後有些人甚至成爲新的運動的反動者。但是，我們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和他們一樣的。

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後，便到上帝那里去，圍着上帝坐着，上帝請他喫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喫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爲勞動大衆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喫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爲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

，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事實上，勞動者大眾，只要不是梁實秋所說『有出息』者，也決不會特別看重智識階級者的，如我所譯的『潰滅』中的美諦克（知識階級出身），反而常被礦工等所嘲笑。不待說，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不應特別看輕，然而勞動階級決無特別例外地優待詩人或文學家的義務。

現在，我說一說我們今後應該注意的幾點。

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牠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牠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牠自己是決不妥協的。中國也有過許多新的運動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敵不過舊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沒有堅決的廣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滿足。譬如白話文運動，當初舊社會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許白話文底存在，給牠一點可憐地位，在報紙的角頭等地方可以看見用白話寫的文章了，這是因為從舊社會看來，新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並不可怕，所以就讓牠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滿足。以為白話文已得到存在權了。又如一二年來的無產文學運動，也差不多一樣，舊社會也容許無產文學，因為無產文學並不厲害，反而他們也來弄無產文學，拿去做裝飾，彷彿在客廳裏放着許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個工人用的

粗疏，也很別緻；而無產文學者呢。他已經在文壇上有個小地位。稿子已經賣得出去了，不必再鬥爭。批評家也唱着凱旋歌：『無產文學勝利！』了。但除了個人的勝利，即以無產文學而論，究竟勝利了多少？況且無產文學，是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一翼。牠跟着無產階級的社會的勢力的成長而成長。在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很低的時候，無產文學的文壇地位反而高，這只是證明無產文學者離開了無產階級，回到舊社會去罷了。

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裏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

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因為現在人手實在太少了。譬如我們有好幾種雜誌，單行本的書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總同是這幾個人，所以內容就不能不單薄，一個人做事不專，這樣弄一點，那樣弄一點，既要翻譯，又要做小說，還要做批評，並且也要做詩，這怎麼弄得好呢？這都因為人太少的緣故，如果人多了，則翻譯的可以專翻譯，創作的可以專創作，批評的專批評；對敵人應戰，也軍勢雄厚，容易克服。關於這點，我可帶便地說一件事。前年創造社和太陽社向我進攻的時候，那力量實在單薄，到後來連我都覺得有點無聊。沒有意思反攻了，因為我後來看出了敵軍在演『空城計』。那時候我的敵軍是專事于

吹播，不務於招兵練將的；攻擊我的文章當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罵來罵去都是同樣的幾句話。我那時就等待有一個能操馬克斯主義批評的鎗法的人來狙擊我的。然而他終於沒有出現。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戰士的養成的，曾經弄過好幾個文學團體，不過效果也很小。但我們今後却必須注意這一點。

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韜』。所謂韜，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進學』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轉合』，籍以進了『秀才舉人』，便可丟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牠了，所以叫做『敲門磚』，猶之用一塊磚敲門，門一敲進，磚就可拋棄了，不必再將牠帶在身邊。這種辦法，直到現在，也還有許多人在使用，我們常常看見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詩集或小說集以後，他們便永遠不見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爲出了一本或二本書，有了一點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別的什麼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寫詩寫小說了，所以永遠不見了。這樣，所以在中國無論文學或科學都沒有東西，然而在我們是要有東西的，因爲這於我們有用。（盧那卡爾斯基是甚至主張保存俄國的農民美術，因爲可以造出來賣給外國人，在經濟上有幫助。我以爲如果我們文學或科學上有東西拿得出去給別人，則甚至於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的政治運動上也有幫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韜不可。

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記得好像會聽到過這樣一句話：『反動派且已經有聯合戰線了，而我們還沒有團結起來！』其實他們也並未有有意的聯合戰線，只因爲他們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動就一致，在我們看來就好像聯合戰線。而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爲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爲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衆，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底地，更實際鬥爭底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鬥生活的培養，開起爛縵的花來罷。關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學運動的停止，或者說「此路不通」了。所以，決非停止了歷來的反對法西主義，反對一切反動者的血的鬥爭，而是將這鬥爭更深入，更擴大，更實際，更細微曲折，將鬥爭具體化到抗日反漢奸的鬥

爭，將一切鬥爭匯合到抗日反漢奸鬥爭這總流裏去。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牠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而是將牠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塗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頭昏，渾亂。

不過，提口號，發空論，都十分容易辦。但在批評上應用，在創作上實現，就有問題了。批評與創作都是實際工作。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我們的創作也常現出近於出題目做八股的弱點。所以我想現在應當特別注意這點：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決不是只局限於寫義勇軍打仗，學生請願示威……等等的作品。這些當然是最好的，但不應這樣狹窄。牠廣泛得多，廣泛到包括描寫現在中國各種生活和鬥爭的意識的一切文學。因為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

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滿洲和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懂得這一點，則作家觀察生活，處理材料，就如理絲有緒；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寫工人，農民，學生，強盜，娼妓，窮人，閹佬，什麼材料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成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也無需在作品的後面有意地插一條民族革命戰鬥的尾巴，翹起來當作旗子；因爲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爲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爲我們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

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預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爲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爲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爲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綫；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爲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漢奸』也非後者的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牠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

幾個重要問題

一 學生救亡運動

從學生自發的救亡運動，在全國各處掀起澎湃的浪潮這一個現實中，的確可以看出，隨着帝國主義者加緊的進攻，漢奸政權加速的出賣民族，出賣國土，民族危機的深重，中華民族中大多數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已經醒覺的奮起，揮舞着萬眾的鐵拳，來摧毀敵人所給予我們這半殖民地枷鎖了！學生特別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中感覺最敏銳的前哨戰士，因此他們所自發的救亡運動，不難影響到全國，甚至影響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點的全世界。再從這次各處學生運動所表顯的各種事實來看，他們已經能夠很清楚的認識橫梗在民族解放鬥爭前程一切明明暗暗的敵人，他們也知道深入下層，體驗他們所需要體驗的生活，組織農民，工人，加緊推動這些民族解放鬥爭的主力軍。在行動方面，譬如組織的嚴密，遵集團的紀律，優越戰術的運動，也能夠在冰天雪地中，自己動手鋪設起被漢奸拆掉的鐵軌，自動駕駛火車前進，這一切，都證明這次學生運動，比較以前進步得多，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缺憾和錯誤，自然還是有的。希望他們在今後血的鬥爭過程中，艱苦的克服下去。同時要保障過去的勝利，也祇有再進一步的鬥爭下去；在鬥爭的過程中，才可以充實自己的力量，學習一切有效的戰術。

二 關於聯合戰線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綫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綫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上或任何方面，有一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泉源啊！

三 目前所需要的文學

我主張以文學來幫助革命，不主張徒唱空調高論，拿「革命」這兩個輝煌的名詞，來抬高自己的文學作品。現在我們中國最需要反映民族危機，鼓勵爭鬥的文學作品，像『八月的鄉村』『生死場』等作品，我總嫌太少。在目前，全中國到處可聞到大眾不平的吼聲，社會上任何角落裏，可以看到大眾為爭取民族解放而匯流的鬪爭鮮血，這一切都是大好題材。可是前進的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作品的產量還是那麼貧乏。究其原因，固然很多，如中國青年對文學修養太缺少，也是一端；但最大的因素，還是在漢字太艱深，一般大眾雖親歷許多鬪爭的體驗，但結果還是寫不出來。

四 新文字運動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替代這種障礙大眾進步的漢字。譬如說，一個小孩子要寫一個生薑的『薑』字，或一個『鸞』字，到方格子裏面去，能夠不偏不歪，不寫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漢字麻煩不麻煩？目前，新文字運動的推行，在我國已很有成績。雖然我們的政治當局，已經也在嚴厲禁止新文字的推行，他們恐怕中國人民會聰明起來，會獲得這個有效的求知新武器。但這終然是不中用的！我想，新文字運動應當和當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配合起來同時進行，而進行新文字，也該是每一個前進文化人應當肩負起來的任務。

關於翻譯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程木天先生的『從「爲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

「淵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裏，我却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係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Academia』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駁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 Academia 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現在却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 Academia 新譯新印的阿刺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

過在爲託爾斯泰印選集，爲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培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牠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

我是主張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國主義者』的作品的，這就是古語的所謂『知己知彼』。青年爲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裏去固然是獸子，但因爲虎狼可怕，連用鐵柵圍起來了的動物園裏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說是一位可笑的恐人。有害的文學的鐵柵是什麼呢？批評家就是。

但我在那『爲翻譯辯護』中，所希望於批評家的，實在有三點：一，指出壞的；二，獎

勵好的；三，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實做的是第一句。以後呢，可能有別的批評家來做其次的文章，想起來真是一個大疑問。

所以我要再來補充幾句：倘連較好的也沒有，則指出壞的譯本之後，並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還可以於讀者有益處。

此後的譯作界，恐怕是還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論民窮財盡，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給日本拿去了，一大塊在水淹，一大塊在旱，一大塊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讀者是減少了許許多多了。因為銷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機，欺騙，而拿筆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機，欺騙。即有不願意欺騙的人，爲生計所壓迫，也總不免比較的粗製濫造，增出些先前所沒有的缺點來。走過租界的住宅區附近的馬路，三間門面的水果店，晶瑩的玻璃窗裏是鮮紅的蘋果，通黃的香蕉，還有不知名的熱帶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這地方，中國人是很少進去的，買不起。我們大抵只好到同胞擺的水果攤上去，化幾文錢買一個爛蘋果。

蘋果一爛，比別的水果更不好喫，但是也有人買的，不過我們另外還有一種相反的脾氣：首飾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點，有時就全部都不要了。愛人身上生幾個瘡，固然不至於就請律師離婚，但對於作者，作品，譯品，却總歸比較的嚴緊。蕭伯納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個作家，也不好；譯者是『大學教授，下職官員』，更不好。好

的又不出來，怎麼辦呢？我想，還是請批評家用喫爛蘋果的方法，來救一救急罷。

我們先前的批評法，是說，這蘋果有爛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拋掉。然而買者的金錢有限，豈不是大冤枉，而況此後還要窮下去。所以，此後似乎最好還是添幾句，倘不是穿心爛，就說：這蘋果有着爛疤了，然而這幾處沒有爛，還可以喫得。這麼一辦，譯品的好壞是明白了，而讀者的損失也可以小一點。

但這一類的批評，在中國還不大有，即以『自由談』所登的批評為例，對於『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就是專指爛疤的；記得先前有一篇批評鄒韜奮先生所編的『高爾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幾個缺點之外，也沒有別的話。前者我沒有看過，說不出另外可有什麼可取的地方，但後者却曾經翻過一遍，覺得除批評者所指摘的缺點之外，另有許多記載作者的勇敢的奮鬥，胥吏的卑劣的陰謀，是很有益於青年作家的，但也因為有了爛疤，就被拋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評家來做剝爛蘋果的工作，這正如『拾荒』一樣，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爲翻譯辯護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里；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却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里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

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烟消火滅。靠翻譯爲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託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却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類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糊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却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小品文的危機

彷彿記得一兩月之前，曾在一種日報上見到記載着一個人的死去的文章，說他是收集『小擺設』的名人，臨末還有依稀的感喟，以為此人一死，『小擺設』的收集者在中國怕要絕迹了。

但可惜我那時不很留心，竟忘記了那日報和那收集家的名字。

現在的新的青年恐怕也大抵不知道什麼是『小擺設』了。但如果他出身舊家，先前曾玩弄翰墨的人，則只要不很破落，未將覺得沒用的東西賣給舊貨擔，也就許還能在塵封的廢物之中，尋出一個小小的鏡屏，玲瓏剔透的石塊，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動物，鏤得發綠的銅鑄的三腳癩蝦蟆；這就是所謂『小擺設』。先前，牠們陳列在書房裏的時候，是各有其雅號的，譬如那三腳癩蝦蟆，應該稱為『蟾蜍硯滴』之類，最末的收集家一定都知道，現在呢，可要和牠的光榮一同消失了。

那些物品，自然決不是窮人的東西，但也不是達官富翁家的陳設，他們所要的，是珠玉繫成的盆景，五彩繪畫的磁瓶。那只是所謂士大夫的『清玩』。在外，至少必須有幾十畝膏

腴的田地，在家，必須有幾間幽雅的書齋；就是流寓上海，也一定得生活較為安閒，在客棧裏有一間長包的房子，書桌一頂，烟榻一張，癡足心閑，摩挲寶鑑。然而這境地，現在卻已經被世界的險惡的潮流沖得七顛八倒，像狂濤中的小船似的了。

然而就是在所謂『太平盛世』罷，這『小擺設』原也不是什麼重要的物品。在方寸的象牙版上刻一篇『蘭亭序』，至今還有『藝術品』之稱，但倘將這掛在萬里長城的牆頭，或供在雲岡的丈八佛像的足下，牠就渺小得看不見了，即使熱心者竭力指點，也不過令觀者生一種滑稽之感。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羣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閒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於風沙中的大建築，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着什麼雅。

美術上的『小擺設』的要求，這幻夢是已經破掉了，那日報上的文章的作者，就直覺的知道。然而對於文學上的『小擺設』——『小品文』的要求，卻正在越加旺盛起來，要求者以為可以靠着低訴或微吟，將粗獷的人心，磨得漸漸的平滑。這就是想別人一心看着『六朝文絮』，而忘記了自己是抱在黃河決口之後，淹得僅僅露出水面的樹梢頭。

但這時卻只用得着掙扎和戰鬥。

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她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

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爲隱士，別人也稱之爲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胡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鏘。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着了滿州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着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 (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爲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爲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却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牠成爲『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爲風雅了。

然而現在已經更沒有書桌；雅片雖然已經公賣，煙具是禁止的，吸起來還是十分不容易。想在戰地或災區裏的人們來鑒賞罷——誰都知道是更奇怪的幻夢。這種小品，上海雖正在

盛行，茶話酒談，徧滿小報的攤子上。但其實是正如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衙堂裏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裏蹙到馬路上來了。

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岐，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痺，牠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八月二十七日。)

作文秘訣

現在竟還有人寫信來問我作文的秘訣。

我們常常聽到：拳師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學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讓他稱雄。在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並非全沒有，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逢蒙遠了，而這種古氣是沒有消盡的，還加上了後來的『狀元癡』，科舉雖然久廢，至今總還要爭『唯一』，爭『最先』。遇到有『狀元癡』的人們，做教師就危險，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這位新拳師來

教徒弟時，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爲前車之鑒，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於三四手，於是拳術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還有，做醫生的有祕方，做廚子的有祕法，開點心鋪子的有祕傳，爲了保全自家的衣食，聽說這還只授兒婦，不教女兒，以免流傳到別人家裏去。『祕』是中國非常普遍的東西，連關於國家大事的會議，也總是『內容非常祕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並無祕訣，假使有，每個作家一定是傳給子孫的了，然而祖傳的作家很少見。自然，作家的孩子們，從小看慣書籍紙筆，眼格也許比較的可以大一點罷，不過不見得就會做。目下的刊物上，雖然常見什麼『父子作家』『夫婦作家』的夕稱，彷彿真能從遺囑或情書中，密授一些什麼祕訣一樣，其實乃是肉麻當有趣，妄將做官的關係，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麼，作文真就毫無祕訣麼？却也並不。我曾經講過幾句做古文的祕訣，是要通篇都有來歷，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個人其實並沒有說什麼；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無實據』。到這樣，便『庶幾乎免於大過也矣』了。簡而言之，實不過要做得『今天天氣，哈哈……』而已。

這是說內容。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祕訣：一要豪臃，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

翻譯一下，使牠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着『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爲『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爲『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上投稿。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着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蠶聲，餘分閨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楊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云：『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爲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裏，以嗅花香，他嫂嫂爲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楊班並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裏保住了威靈。

做得蒙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醜。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醜，也就彷彿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髮，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蒙

臚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爲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却以爲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爲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着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醜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牠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牠『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喫三碗飯，誰也不以爲奇，有人每餐要喫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裏，挖一個洞，化爲西洋鏡，人們就張着嘴熱心的要看了。况且同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裏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裏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擡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到達者的心裏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寫到這里，成了所講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祕訣，而且是做騙人的古文的祕訣了。但我想

，做白話文也沒有什麼大兩樣，因為牠也可以夾些僻字，加上蒙朧或難懂，來施展那變戲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調，就是『白描』。

『白描』却並沒有祕訣。如果要說有，也不過是和障眼法反一調：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

（十一月十日。）

論大衆語

答曹聚仁先生

聚仁先生：

關於大衆語的問題，提出得真是長久了，我是沒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沒有開過口。但是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却依然如故。

現在寫一點我的簡單的意見在這裏：

一，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衆語文，必須用羅馬字拼音（即拉丁化，現在有人分爲兩件事，我

不懂是怎麼一回事），而且要分爲多少區，每區又分爲小區（譬如紹興一個地方，至少也得分爲四小區），寫作之初，純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們是要前進的，那時原有方言一定不夠，就只好採用白話，歐字，甚而至於語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語混雜的地方，又有一種語文，是比較普通的東西，牠已經採用了新字彙，我想，這就是『大衆語』的雛形，牠的字彙和語法，即可以輸進窮鄉僻壤去。中國人是無論如何，在將來必有非通幾種中國語不可的運命的，這事情，由教育與交通，所以辦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衆自掌教育的時候。現在我們所辦得到的是：

（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試用廣東話之類，讀者較多的言語，做出東西來看，（丙）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謂『歐化』語文，仍應支持，因爲講話倘要精密，中國原有的語法是不夠的，而中國的大衆語文，也決不會永久含糊下去。譬如罷，反對歐化者所說的歐化，就不是中國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語法，是會有非用不可的時候的。

四，在鄉僻處啓蒙的大衆語，固然應該純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進。譬如「媽的」一句話罷，鄉下是有許多意義的，有時罵罵，有時佩服，有時讚歎，因爲他說不出別樣的話來。先驅者的任務，是在給他們許多話，可以發表更明確的意思，同時也可以明白更精確的意

義。如果也照樣的寫着「這媽的天氣真是媽的，媽的再這樣，什麼都要媽的了」。那麼於大衆有什麼益處呢？

五，至於已有大衆語雛形的地方，我以為大可以依此爲根據而加以改進，太僻的十語，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爲「吃生活」，可以用於上海人的對話，却不必特用於作者的敘事中，因爲說「打」，工人也一樣能夠懂。有些人以爲如「像煞有介事」之類，已經通行，也是不確的話，北方人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和江蘇人是不一樣的，那感覺並不比「儼乎其然」切實。

文章和口語不能完全相同；講話的時候，可以夾許多「這個這個」「那個那個」之類，其實並無意義，到寫作時，爲了時間，紙張的經濟，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別刪去的，所以文章一定應該比口語簡潔，然而明了，有些不同，並非文章的壞處。

所以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為是（一）製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還有一層，是文言的保護者，現在也有打了大衆語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論極高，使大衆語懸空，做不得；別一方面，藉此攻擊他當面的大敵——白話。這一點也須注意的

。要不然，我們就會自己繳了自己的械。專此布復，即頌
時綏！

迅上。

中國語文的新生

中國現在的所謂中國字和中國文，已經不是中國大家的東西了。

古時候，無論那一國，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數的人的，但到現在，教育普及起來，凡是稱爲文明國者，文字已爲大家所公有。但我們中國，識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當然還要少。這還能說文字和我們大家有關係麼？

也許有人要說，這十分之二的特別國民，是懷抱着中國文化，代表着中國大眾的。我覺得這話並不對。這樣的少數，並不足以代表中國人。正如中國人中，有喫燕窩魚翅的人，有賣紅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一切中國人，都在喫燕窩魚翅，賣紅丸，拿回扣一樣。要不然，一個鄭孝胥，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滿洲去。

我們倒應該以大多數爲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

這樣的一個連文字也沒有的國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了。我想，這可以無須我舉

例。

單在沒有文字這一點上，智識者是早就感到模糊的不安的。清末的辦白話報，五四時候的叫『文學革命』，就爲此。但還只知道了文章難。沒有悟出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復興文言文，也爲此。他明知道現在的機關槍是利器，却因歷來偷懶，未曾振作，臨危又想徼幸，就只好夢想大刀隊成事了。

大刀隊的失敗已經顯然，只有兩年，已沒有誰來打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軍隊。但文言隊的顯出不中用來，是很慢，很隱的，牠還有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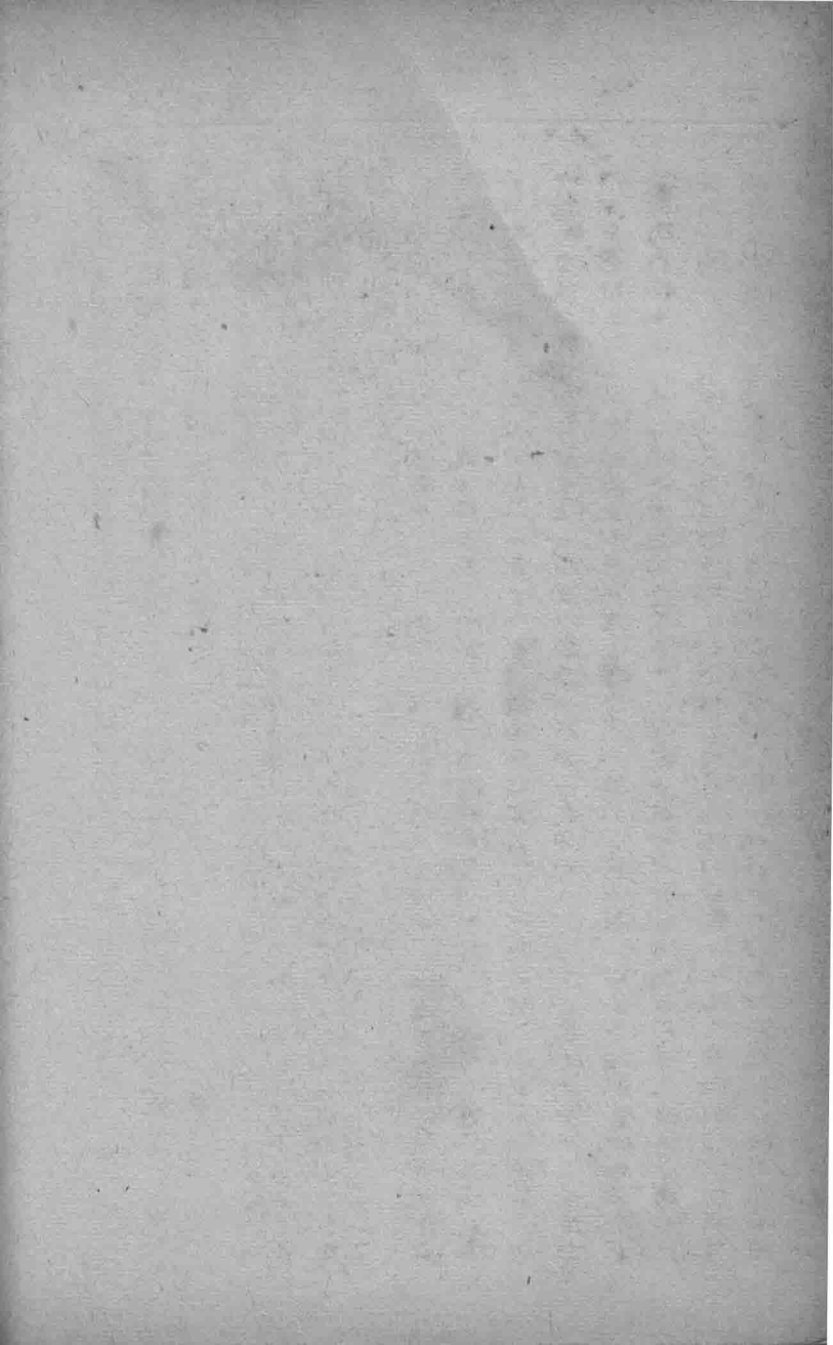
和提創文言文的開倒車相反，是目前的大衆語文的提倡，但也還沒有碰到根本的問題：中國等於並沒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

反對，當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規，動他不待。格理萊倡地動說，達爾文說進化論，搖動了宗教，道德的基礎，被攻擊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飛發見了血液在人身中環流，這和一切社會制度有什麼關係呢，却也被攻擊了一世。然而結果怎樣？結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環流！

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

除去阻礙傳佈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並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於中國大衆的存亡的。要得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麼久。

至於拉丁化的較詳的意見，我是大體和「自由談」連載的華園作「門外文談」相近的，這裏不多說。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潮的大衆語的前途的危難，但以爲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阿Q正傳

周作人

我同『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爲約略知道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夠加上一點說明，幫助讀者去了解他的真相，——無論好壞——也未可知。

『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諷刺小說是理智的文學裏的一支，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負的。然而這憎並不變成厭世，負的也不盡是破壞。美國福勒忒在『近代小說史論』中說，『關於政治宗教無論怎樣的說也罷，在文學上這是一條公理：某種的破壞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設。諷刺在許多時代，如十八世紀的詩裏，墮落到因襲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諷刺實在是理想主義的一種姿態，對於不可忍受的惡習之正義的憤怒的表示，對於在這混亂的世界裏因了邪曲腐敗而起的各樣侮辱損害之道德意識的自然的反應。……其方法或者是破壞的，但其精神却還在這些之上。』因此在諷刺裏的憎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摘發一種惡即是扶植相當的一種善；在心正燒的最熱，反對明顯的

邪曲的時候，那時他就最近於融化在那哀憐與恐懼裏了。——據亞里士多德說，這兩者正是悲劇的有淨化力的精緒。即使諷刺是冷的，如平常變爲反語的時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們爲了比私利更大的緣故而憎，而且在嫌惡卑劣的事物裏鼓勵我們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諷刺小說雖然與理想小說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過正負不同罷了；在技工上，因爲類型描寫的緣故，也有一種相似的誇張的傾向，這不能說是好處，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理想家與諷刺家都著眼於人生的善或惡的一方面，將同類的事物積累起來，放大起來，再把他複寫在紙上，所以他的結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惡的擴大圖。作成人生的「實物大」的繪圖，在善人裏表出惡的餘燼，在惡人裏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偉大的寫實家纔能夠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於感傷主義的小說，正如人家講中和的容易變爲調停派一樣。所以不是因襲的諷刺文學也自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現代中國一般的昏迷的社會爲尤甚。

『阿Q正傳』裏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爲少見，因爲他多是反語 (Irony)，便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中國近代小說只有『鏡花緣』與『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點相近，『官場現形記』和『怪現狀』等多是熱罵，性質很是不同，雖然這些也是屬於諷刺小說範圍之內的。『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據我所知道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

俄國的戈果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爲顯著，日本是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戈果理的『外套』和『瘋人日記』，顯克微支的『炭畫』和『酋長』等，森鷗外的『沈默之塔』，都已經譯成漢文，只就這幾篇參看起來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跡；夏目漱石的影響，則在他的充滿反語的傑作『我是貓』。但是國民性實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裏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一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詞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這個結果便造成『Satiric satire』（山靈的諷刺），在這一點上却與『英國狂生』斯威夫德有點相近了。這個傾向在『狂人日記』裏，——我在這裏不得不順便聲明，著者巴人與魯迅本來是一個人，——也很明顯，不過現在更爲濃密罷了。這樣的冷空氣或者於許多人的薔薇色的心上給予一種不愉快的接觸，但我的私見以爲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國現代社會裏。

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說月報』上說，『阿Q這人要在現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這話說得很對。戈

果理的小說『死靈魂』裏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尋到一個旅行着收買死農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種種投機的實業家中間可以見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魯泡金所說。不過其間有一點差別：契契珂夫是『一個不朽的萬國的類型』，阿Q却是一個民族的類型。他像神話裏的「衆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煉精粹，凝為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為痛切，因為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總之這篇的藝術無論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樣老實不客氣的表示他的憎惡，一方面對於中國社會也不失為一服苦藥，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無意義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罵一頓，做到臨了却覺得在未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託爾斯泰批評契契珂夫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却反將他扶起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的失敗的地方。至於或者以為諷刺過分，『有傷真實』，我並不覺得如此，因為世界往往『事實奇於小說』，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鄉裏，我也親見到這一類腳色的活模型，其中還有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桂，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何 擬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

——魯迅：墳

象牙塔裏的紳士總會假清高的笑罵：「政治家，政治家，你算得什麼藝術家呢！你的藝術是有傾向的！」對於這種嘲笑，革命文學家只有一個回答：

「你想用什麼來罵倒我呢？難道因為我要改造世界的那種熱誠的鉅大火燄，她在我的藝術裏也在燃燒着麼？」（盧納察爾斯基：高爾基作品選集序）。

革命的作家總是公開地表示他們和社會鬥爭的聯繫；他們不但在自己的作品裏表現一定的思想，而且時常用一個公民的資格出來對社會說話。爲着自己的理想而戰鬥，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紳士藝術家的虛偽。高爾基在小說戲劇之外，寫了很多的公開書信和『社會論文』（Public starticles），尤其在最近幾年——社會的政治的鬥爭十分緊張的時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藝術家了，因爲「他只會寫些社會論文」。但是，誰都知道這些譏笑高爾基的，是些什麼樣的蚊子和蒼蠅！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裏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將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衆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牠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現在選集魯迅的雜感，不但因為這裏有中國思想鬥爭史上的寶貴的成績，而且也爲着現時的戰鬥：要知道形勢雖然會大不相同，而那種吸血的蒼蠅蚊子，却總是那麼多！

魯迅是誰？我們先來說一通神話罷。

神話裏有這麼一段故事：亞爾霸·龍迦的公主萊亞·西爾維亞被戰神馬爾斯強姦了，生下一胎雙生兒子：一個是羅謨魯斯，一個是萊謨斯；他們倆兄弟一出娘胎就丟在荒山裏，如果不是一隻母狼喂他們奶喫，也許早就餓死了；後來羅謨魯斯居然創造了羅馬城，並且乘着大雷雨飛上了天，做了軍神；而萊謨斯却被他的兄弟殺了，因為他敢於蔑視那莊嚴的羅馬城，他只一脚就跨過那可笑的城牆。萊謨斯的命運比魯迅悲慘多了。這也許因為那時代還是虛偽統治的時代。而現在，喫過狼奶的羅謨魯斯未必再去建築那種可笑的像煞有介事的羅馬城，更不願意飛上天去高高的供在天神的寶座上，而完全忘記了自己的乳母是野獸。雖然現在的羅謨魯斯也曾經做過一些這類的傻事情，可是，他終於屈服在『時代精神』的面前，而回着萊謨斯雙雙的回到狼的懷抱裏來。萊謨斯是永久沒有忘記自己的乳母的，雖然他也很久的在『孤獨的戰鬥』之中找尋着那回到『故鄉』的道路。他憎惡着天神和公主的黑暗世界，他也不能夠不輕蔑那虛偽的自欺的紙糊羅馬城，這樣一直到他回到『故鄉』的荒野，在這裏找着了羣衆的野獸性，找着了掃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鉄掃帚，找着了真實的光明的建築，這不是什麼可笑的猥瑣的城牆，而是偉大的簇新的星球。

是的，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武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

俄國的貴族地主之間，『也發展了十二月十四的人物，這是英雄的隊伍，他們像羅漢斯和萊謨斯似的，是野獸的奶汁所喂養大的。這些勇將，從頭到腳都是純鋼打成的，他們是活潑的戰士，自覺地走上明顯的滅亡的道路，爲的要驚醒下一輩的青年去取得新的生活，爲的要洗清那些生長在劊子手主義和奴才主義環境裏的孩子們』。（赫爾岑）。

辛亥革命前的這些勇將們，現在還剩得幾個？說近一些，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的戰士，現在又剩得幾個呢？『有的高陞，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魯迅自選集序言）

魯迅說：『又經歷了一回』！他對於辛亥革命的那一回，現在已經不敢說，也真的不忍說了。那時候的『純鋼打成的』人物，現在不但變成了爛鐵，而且……：真金不怕火燒，到現在，才知道真正的純鋼是誰呵？辛亥革命前的士大夫的子弟，也有一些維新主義的老新黨，革命主義的英雄，富國強兵的幻想家。他們之中，客觀上領導了民權主義的羣衆革命運動的人，也並不是沒有，而且，似乎也做的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魯迅也是士大夫階級的子弟，也是早期的民權主義的革命黨人。不過別人都有點兒慚愧自己是失節的公主的親屬。本來帝國主義的戰神強姦了東方文明的公主，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變，誰還能夠否認？這種強姦的結果，中國的舊社會急遽的崩潰解體，這樣，出現了華僑式的商業資本，候補的國貨實業

家，出現了市文化的紳董，也產生了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從維新改良的保皇主義到革命光復的排滿主義，雖然有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而士大夫的氣質總是很濃厚的。文明商人和維新紳董之間的區別，只在紳董希望滿清的第二次中興，用康梁繼承曾左李的事業，而商人的意識代表（也是士大夫），却想到了另外一條出路：自己來做專權的諸葛亮，而叫四萬萬阿斗做名義上的主人。在這種根本傾向之下，當時的思想界，多多少少都早已埋伏着復古和反動的種子，要想恢復什麼『固有文化』。獨有現代式的小資產階級智識階層的萌芽，能夠用對於科學文明的堅決信仰，來反對這種復古和反動的預兆。魯迅和當時早期革命家，同樣背着士大夫階級和宗法社會的過去。但是，他不但很早就研究過自然科學和當時科學上的最高發展階段。而且他和農民羣衆有比較鞏固的聯繫。他的士大夫家庭的敗落，使他在兒童時代混進了野孩子的羣裏，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氣。這使得他真像喫了狼的奶似的，得到了那種『野獸性』。他能夠真正斬斷『過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惡天神和貴族的宮殿，他從來沒有擺過諸葛亮的臭架子。他從紳士階級出來，他深刻地感覺到一切種種士大夫的卑劣，醜惡和虛偽。他不慚愧自己是私生子，他詛咒自己的過去，他竭力的要肅清這個骯髒的舊茅廁。

現代最偉大的革命政治家說過：『喫人經濟的存在，剝削的存在永永要產生反對這種制

度的理想，在被剝削的羣衆自己之中是如此，在所謂智識階層的個別代表之中也是如此。這些理想對於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很寶貴的。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時候，除出富國強兵和立憲民治之外，還有什麼理想呢？不是偉大的天才，有敏銳的感覺和眞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夠跳過『時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納和接受外國的學說，也要有些容納和接受的能力。而魯迅在一九〇七年說：

『輕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謂鉤爪鋸牙，爲國家首事，又以文明之語，用以自文。……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現於外矣！計其次者，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前二者素見重中國青年間，縱不主張，治之者亦將不可縷數。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爲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若夫後二，可無論已……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壘斷之市僧……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與國何與焉。』（墳：『文化偏至論』）。

這在現在看來，幾乎全是預言！中國的資產階級，經過了短期間的革命，而現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時候的青年，熱心於提倡而實行『製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

面預備亡國，而且更進一步，積極的巧妙的賣國了。至於千萬無賴之尤的假民權，也正在粉刷着新的立憲招牌。自然，魯迅當時的思想基礎，是尼采的『重箇人非物質』的學說。這種學說在歐洲已經是資產階級反動的反映，他們要用超人的名義，最『先進』的英雄和賢哲的名義，去抵制新興階級的羣衆的集體的進取和改革，說一切羣衆其實都是守舊的，阻礙進步的『庸衆』。可是，魯迅在當時的傾向尼采主義，卻反映着別一種社會關係。固然，這種個性主義，是一般的智識份子的資產階級性的幻想。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城市的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爲鉅大的自覺的政治力量，而農村的農民羣衆只有自發的不自覺的反抗鬥爭。大部分的市儈和守舊法的庸衆，替統治階級保守着奴才主義，的確是改革進取的阻礙。爲着要光明，爲着要征服自然界和舊社會的盲目力量，這種發展箇性，思想自由，打破傳統的呼聲，客觀上在當時還有相當的革命意義。只要看魯迅當時的『摩羅詩力說』，他是要『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爲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摩羅是梵文，歐洲人說『撒但』，意思是天魔。魯迅的敍說這些天魔詩人（斐倫等等）！目的正在於號召反抗，推翻一切傳統的壓力的『東方文化』的國故僵尸。他是真正介紹歐洲文藝思想的第一個人。

在那時候——一九〇七年——他的這些呼聲差不多完全沉沒在浮光掠影的粗淺的排滿論調之中，沒有得到何任的回響。如果不是墳裏保存了這幾篇歷史文獻，也許同中國的許多『

革命檔案』一樣，就這麼失散了。這些文獻的意義，在於回答當時思想界的一個嚴重問題：羣衆這樣落後怎樣辦？對於這個問題，當時革命思想界裏有一個現成的答覆，就是說，羣衆落後是天生的，因此，不要他們起來革命，等編練了革命軍隊來替他們革命，而革命成功之後也還不能夠民衆自由，而要好好的教訓他們幾年。而魯迅所給的答案却有些不同，他是說，因爲民衆落後，所以更要解放箇性，更要思想的自由，要有『自覺的聲音』，使牠『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這雖然也不是正確的立場，然而比『革命的愚民政策』總有點兒不同罷。問題是在於當時中國『亦頗思歷舉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則姑曰左鄰已奴，右鄰且死，擇亡國而較量之，冀自顯其佳勝』，有了這種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飄飄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終是諸葛亮式的革命理論『勝利』，而對於科學藝術的努力進取的呼聲反而沉沒了。

魯迅在當時不能夠不感覺到非常之孤獨和寂寞，他問：『今索諸中國，爲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他說俄國文學家科羅連珂的末光裏，敘述一個老人在西伯利亞教書，書上有黃鶯，而那地方却冷得什麼也沒有，他的學生聽說這黃鶯會在櫻花裏唱出美妙的歌聲，就只能夠側着頭想像那黃鶯叫的聲音。這種思想多麼使人感動呵。『吾人其亦沈思而已夫，其亦沈思而已夫！』（墳：『摩羅詩力說』）

然而魯迅其實並不孤獨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於一些革命新貴的風起雲湧，而在於『農人野老的不明大義』，他們以爲『革命之後從此自由』（總理全集：民元杭州歡迎會上演說辭）。不明大義的貧民羣衆的騷動，固然是給革命新貴白白當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時候只表現了一些阿Q的『白鎧白甲』的夢想，然而他們是真的光明鬥爭的基礎。精神界的戰士只有同他們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偉大的分裂』；反映着羣衆的革命情緒和階級關係的轉變，中國的士大夫式的智識階層就顯然地劃分了兩個陣營：國故派和歐化派。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的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時期。當時德謨克拉西先生和賽因斯先生的聯盟，繼續開展了革命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現代式的智識階層生長發展的結果。魯迅的參加『思想革命』是在這時候就開始的。我們說他的『參加』開始，是因爲在這之前，還沒有什麼可以參加的，他還只能夠孤獨的『沈思』。而在新青年發動了『新文化鬥爭』之後，反國故派方才成爲整個的隊伍。

辛亥之後，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敗了。但是，並不是個個人都覺得到繼續統治的是誰。魯迅說，這是些『現在的屠殺者』；『殺！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而殺『現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屍。那時候，還是完全的僵屍統治呵。

這些僵屍，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式的賈辦，自然要竭力維持一切種種的國故：宗法社會的舊道德，忠孝節義和腐爛發臭的古文化。他們——好比『妻女極多的闊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亂離時候，照顧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無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請別人都做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後，慢慢回來，稱贊幾句』（墳：『我的節烈觀』）。這些將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節，一定要稱贊烈女。而且爲着保持自己的統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爲活人總要想前進，青年總想活動，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子，這樣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應當說是僵屍）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的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爲衛道有效……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五』）。

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一般精神，然而魯迅在這時代已經表現了他的特點。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導師；而誠實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的，却是魯迅，他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他沒有自己造一座寶塔，把自己高高供在裏面，他却砌了一座『墳』，埋葬他的過去

，熱烈的希望着這可詛咒的時代——這過渡的時代也快些過去。他這種爲着將來和大衆而犧牲的精神，貫穿着他的各個時期，一直到現在，在一切問題上都是如此。舉一個例說罷。白話運動初起的時候，錢玄同之流不久就開倒車，說三國演義那樣的文言白話夾雜的『言語』就是『合於實際的』模範，理想不可以過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說明文章的好壞不在於文言白話的分別，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話好還應該懂古支。這樣，每一個新文學家，都在運用『天才』創造新白話文的模範。魯迅說：『這實在使我打了一個寒噤……自己卻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而『許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爲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潢自己的作品』。（墳『寫在墳後面』。）『新文學興起以來，未忘積習而常用成語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亂用誰也不懂的生語如創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藝和大衆隔離』（三間集：『小小十年小引』）。他自己以爲只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銷亡』。（『寫在墳後面』）。然而正因爲如此，他這『橋梁』才是真正通達到彼岸的橋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也正因爲如此，他的確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

五四前後，新青年的領導作用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當時反對宗法禮教，反對國故，主張婦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張白話文學，——『理想』的浪潮又激動起來，革命的智識青年開

尋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應該記得，這時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直後的反動，——橫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問題，是理想沒有用處，革命的亂鬧就是由於一味理想。當時的反動派，的確『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熱風：隨感錄三九）。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卻是新文化運動內部分化的開始。不用說，那些治國平天下的老革命黨其實是被反動派難到了，他們趕緊悔過，說以前我們只會破壞，現在要考究建設了；至於理想過高，民衆理會不到，那末，革命黨本來就不要民衆理會，民衆總是不知不覺的，叫他們『一味去行』，讓我們替他們建設地理想好了！這是老革命黨的投降。而新革命黨呢？五四之後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適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動派說一味理想不行，胡適之也趕着大叫『少研究主義，多研究問題』。這種美國市儈式的實際主義，是要預防新興階級的偉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權。而魯迅對於這個問題——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分水嶺的問題，——是站在革命主義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經驗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們的所謂『經驗』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經驗。

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簡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他熱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

的襲擊着宗法社會的僵尸統治，要求簡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漸漸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會裏的層層壓榨。一九二四——五年，他的『春末閒談』，『燈下漫筆』，『雜憶』（墳），以及整部的華蓋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華蓋集續編，都包含着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火焰。自然，這不是社會科學的論文，這只是直感的生活經驗。但是他的神聖的憎惡和諷刺的鋒芒都集中在軍閥官僚和他們的叭兒狗。五四到五卅前後，中國思想界裏逐步的準備着第二次的『偉大的分裂』。這一次已經不是國故和新文化的分別，而是新文化內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農民衆的陣營，別方面是依附封建殘餘的資產階級。這新的反動思想，經了已經披了歐化，或所謂五四化的新衣服，這個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六的時候，卻已經準備着，只要看當時段祺瑞章士釗的走狗現代評論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後是怎樣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這中間的奧妙。而魯迅當時的語絲，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和批評，正是針對着這些未來的『官場學者』的。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裏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滢』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滢』，就是『章士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他們個人的履歷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們這種『媚態的貓』，『比牠主人更嚴厲的

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通議論的蚊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嘰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到現在還活着，活着！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綫。

的確，舊的衛道先生們漸漸的沒落了，於是需要在他們這些僵屍的血管裏，注射一些『歐化』的西洋國故和牛津劍橋哥倫比亞的學究主義，再加上一些洋場流氓的把戲，然後僵屍可以暫時『復活』，或者多留戀幾年『死屍的生命』。這些歐化紳士和洋場市僧，後來就和『革命軍人』結合了新的幫口，於是僵屍統治，變成了戲子統治。僵屍還要做戲，自然是再可怕也沒有了。

『中國的原始積壘式的商業資本，在鄉村之中和封建統治的地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中國的軍閥和一切殘酷無情搶劫民衆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特別形式的結合的上層建築。帝國主義和他們所有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國維持並且推動這些封建殘餘以及牠們的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使牠們歐化，又使牠們守舊。（約瑟夫）。這就是中國僵屍歐化的原因。袁世凱以來的北洋軍閥要想穩定這種新的統治，但是，他們只會運用一些『六君子』之類『開國元勳』，『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問題是在於要統治奴隸就要

有一定的奴隸規則（墳：『燈下漫筆』）。而新的奴隸規則，要新的『山羊』來幫忙才定得出來。這樣的山羊，『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能夠領了羣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牠們應該走到的所在……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華蓋集續編：『一點比喻』）。段祺瑞章士釗時代——五卅時代的陳西滢們，就做成這樣的『山羊』。雖然這企圖延長了若干年，而他們現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幫忙文人』，而且已經像生殖力最強的豬仔和臭蟲似的，生出了許許多多各種各式的徒子徒孫。當時——一九二五，六年——他們的努力，例如剿殺『學匪』，或者請出西哲學本霍爾來痛打女師大的『毛丫頭』之類，總算不是枉費的。

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蔽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夠完全只靠大砲機關鎗，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戰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做戲的虛無主義者』（看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鬥爭。

他們在五卅的時候，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徐志摩），說中國人的『打，打，宣戰，宣戰。』是『這樣的中國人，呸！』——這意思是中國人該被打而不做聲（陳西滢）。他們在三·一八之後，立刻就說『執政府前原是『死地』……羣衆領袖應

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墨寫的謊說』難道掩得住『血寫的事實嗎』？然而魯迅在這一次做了一個『錯誤』：『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猜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他在當時已經說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十四年後的黑暗會超越三一八屠殺的幾百十倍。魯迅如果有一『錯誤』，那末，我們不能夠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評：『我還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資產階級社會的醜惡，實在遠超出於文學家最深刻的『構陷別人的罪狀』而文飾這種醜惡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當五卅時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國內的階級戰爭的同時開展；這又是新的階級的更加嚴重的問題，而魯迅就提出這樣的質問：『然而中國有鎗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却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華蓋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這個問題的，是五卅之後的鉅大的羣衆革命浪潮。革命是在進到新的階級，『死者遺給後來的功德，是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結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華蓋集續編：『空談』）。這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就必須打倒這些陰毒『東西』——動物！就不再是請願，不只是『和平宣傳』，不是合法主義，而是……

『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蔷薇之二』）。

起後的『血債』是越拖越多了。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而已集題辭）

僵屍的統治轉變成戲子的統治。這個轉變完成之後不善於做戲的僵屍雖然退了位，而會變戲法的僵屍就更加猖獗起來。活人和死人的鬥爭，滅亡路上的階級的掙扎和新興階級領導的羣衆的反抗，經過一番暴風雨的劇變而進到了新的階段。魯迅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血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就是以後的三閒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六〇〇——三一），又何嘗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這期間魯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躪侮辱被欺騙的人們的彷徨和憤激，他才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箇性主義進到了戰鬥的改造

世界的集體主義。如果在以前，魯迅早就感覺到中國社會裏的科舉式的貴族階級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農奴階級之間的對抗，那麼，現在他就更清楚的見到那種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之外，正在發展着資本和勞動的對抗。他『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他的『思路因此轟毀』（三間集序言）。是的，以前『父與子』的輩份鬥爭只是前一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外套的外套；現在——封建宗法殘餘的統治攙雜了一些流氓資本的魔術，——不但更明顯的露出勞動和資本的階級戰鬥，而且反封建殘餘的鬥爭也不再是純粹的『父與子』鬥爭的形式。同時，新興階級的領導展開了真正推翻帝國主義和僵尸，推翻流氓資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結合的遠景。貧民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智識階層，終於發見了他們反對剝削制度的朦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興的社會主義的先進階級前進，才能夠實現，才能夠在偉大的鬥爭的集體之中達到真正的『個性解放』

這樣，當時革命『過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智識階層的最終的分化：一些所謂歐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喪家的』或者『不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替新的反動去裝點一下摩登化的東洋國故和西洋國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智識青年却更確定更明顯地走到勞動民衆方面來，圍繞着革命的營壘。最優秀的最真誠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

想的份子，始終是要堅決是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

最早期的真正革命文學運動——五四式的新文學分化之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不能夠不首先反對摩登化的遺老遺少，反對重新擺上的『喫人的筵宴』，以及這種筵宴旁邊的鼓樂隊。蹂躪革命『戰士的精神和血肉……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這些流氓式的戲子，扶着幾乎斷送『死尸的生命』的僵尸，『穩定了』他們的新的統治。於是乎他們的鼓樂隊裏，就攙和了些『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國的霍普德曼，（冤枉！）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的吳××』等等，而偏偏還要說這是革命文學！這其實是『在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低能兒（而已集：『革命文學』）。這其實是段政府之下的陳西濤們的徒子徒孫。據說是段祺瑞張學良等投降了『革命』，陳西濤們『轉變了』方向；然而就社會的意義上來說，究竟是誰降了誰，誰轉變了方向，是大成問題的。這時候的新鮮戲法，只在於：『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剩了一條『革命文學』的獨木小橋，所以外來的許多刊物，便通不過，撲通，撲通，都掉下去了。』（而已集：『扣絲雜感』）。

『獨木小橋』始終只是獨木小橋。那些『撲通，撲通』掉下去的卻學會了游水。真正的革命文藝思想正在這一時期開始深入的發展。在這新階段上，革命文藝思想經過內部的鬥爭

而逐漸的形成新的陣營。這種不可避免的鬥爭提出了新的問題，這已經不是父與子的問題，也不僅是暴露指揮刀後的屠伯們的問題。這是關於革命隊伍的戰略的爭論。

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衆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隊伍，克服過去的『因襲的重担』，同時，擴大同路人的陣線。這不但在日本，美國，德國，甚至於在蘇聯，也經過波格唐諾夫式的幼稚病。關於這種幼稚病，德國的昆哈曾經說過：『一些小集團居然自以爲獨得了『工人階級的文化代表的委任狀』——包辦代表事務。這大概是『歷史的誤會』。創造社的轉變，太陽社的出現，只在這方面講來，是有客觀上的革命意義的。』

然而革命軍進行的時候，『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頽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無產階級和周圍的各種小資產階級之間本就沒有一座萬里長城隔開着。何況小資產階級又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階層和集團呢。

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層之中，有些是和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受盡了欺騙壓榨束縛愚弄的農民羣衆聯繫着。這些農民從幾千百年的痛苦經驗之中學會了痛恨老爺和田主，但是沒有學會，也不能夠學會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怎樣去解除這種痛苦。『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

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和文學作品出現的。然而其意並非真的革命文學。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三閑集：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然而，寬泛些說，這種文藝當然也是革命的文學因為牠至少還能夠反映社會真相的一方面，暗示改革所應當注意的方向。而同時，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過程，時常不是立刻就能脫離個性主義——懷疑羣衆的傾向的，他們看得見羣衆——農民小私有者的羣衆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於馴服的女隸性；可是，往往看不見這種羣衆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見他們的笨拙的守舊的口號背後穩藏着革命的價值。魯迅的一些雜感裏面，往往有這一類的缺點，引起他對於革命失敗的一時的失望和悲觀。

另一方面，五四到五三之間中國城市裏迅速的積聚着各種『籌海民』（F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這種智識階層和早期的士大夫階級的『逆子貳臣』，同樣是中國封建宗法社會崩潰的結果，同樣是帝國主義以及軍閥官僚的犧牲品，同樣是被中國畸形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過程所『擠出軌道』的孤兒。但是，他們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們和農村的聯系更稀薄了，他們沒有前一輩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老實的農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傳染了歐洲的世紀末的氣質。這種新起的智識份

子，因為他們的『熱度』關係，往往首先捲進革命的怒潮，但是，也會首先『落荒』或者『頹廢』，甚至『叛變』，——如果不堅決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諦克主義。』這種典型最會輕蔑地腫着鼻子說：『我不是那種唱些有機的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主義的讚美歌的人。』這種典型的社會根源是小資產者，他受着戰爭的恐怖，突然的破產，空前的飢荒和破壞的打擊而發瘋了，他歇替斯利亂撞，尋找着出路和挽救，一方面信仰無產階級而贊助牠，別方面又絕望地狂跳，在這兩方面之間動搖着。（烏梁諾夫）。這種人在文藝上自然是『才子』，自然不肯做『培養天才的泥土』，而『很早就恨恨地磨墨，立刻寫出很高明的結論道，「唉，幼稚得很。中個要天才！」。（墳：『未有天才之前』）。革命的怒潮到了，他們一定是革命的；革命的暫時失敗了，他們之中也一定有些消極，有些叛變，有些狂跳，而表示一些『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二心集：『上海文藝一瞥』）。於是『包辦』工人階級文藝代表的『事務』。

三閒集以及其他雜感之中所保留着的魯迅批評創造社的文章，反映着二七年以後中國文藝界之中這兩種態度，兩種傾向的爭論。自然，魯迅雜感的特點，在那時特別顯露那種經過私人問題去照耀社會思想和社會現象的筆調。然而創造社等類的文學家，單說真有革命志願的（像葉靈鳳之流的投機份子，我們不屑去說到了），也大半扭纏着私人的態度，年紀，

氣量以至酒量的問題。至少，這裏都表現着文人的小集團主義。

這時期的爭論和糾葛轉變到原則和理論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藝學說的介紹，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學的新的生命的產生。而還有人說：那是魯迅『投降』了。現在看來這種小市民的虛榮心，這種『剝削別人的自尊心』的態度，實在天真得可笑。

這是已經過的問題了，也應當是過去的了。

魯迅現在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問題……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閒集序言）。『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份子的壞脾氣。』（二心集序言）。

魯迅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武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着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裏來的。他終於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牠的潰滅，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唯有新興的無產者纔有將來』。

。』(二心裏序言)。關於最近期間，九一八以後的雜感，我們不用多說。他是站在戰鬥的前線，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在以前，就痛切的指出來：『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填：『燈下漫筆』)。而現在，這句話裏的『青年』兩個字上面已經加上了新的形容詞，甚至於完全換了幾個字，——他在日本帝國主義動手瓜分，英美國聯進行着共管，而中國的紳商統治階級要着各種各樣的戲法另薑發賣中國的時候，——忍不住要指着那些『民族主義文學者』說：『他們(老年的和青年的——疑注)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着戀主的哀愁，須到……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纔能脫出這沈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動。』(二心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然而魯迅雜感的價值決不止此。他自己說，『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致命。』(填：『寫在墳後面』)。從滿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黨，陳西滢們……一直到最近期的洋場無賴式的文學青年，都是他所親身領過的。劊子手主義和僵尸主義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浪賴皮的冒充虛無主義，無恥，

卑劣，虛偽的戲子們的把戲，不能夠逃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歷年的戰鬥和劇烈的轉變給他許多經驗和感覺，經過精鍊和融化之後，流露在他的筆端，這些革命傳統（Revolutionary traditions）對於我們是非常之寶貴的，尤其是在集體主義的照耀之下。

第一，是最清醒現實主義。『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不自覺得。』（墳：『論睜了眼看』）。這種思想其實反映着中國的最黑暗的壓迫和剝削制度，反映着當時的經濟政治關係。科舉式的封建等級制度，給每一個『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租佃式的農奴制度給每一個農民以『獨立經濟』的幻影和『爬上社會的上層』的迷夢。這都是幾百年來的『空前偉大的』煙幕彈。而另一方面，在極端重壓的沒有出路的情形之下，散漫的剝奪了取得智識文化的可能的小百姓，只有一想情願的找些『巧妙』的方法去騙騙皇帝官僚甚至于鬼神。大家在欺人和自欺之中討生活。統治階級的這種『文化遺產』甚至於像沉重的死屍一樣，壓在革命隊伍的頭上，使他們不能夠迅速的擺脫。即使『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然而倘以欺騙的心，用欺騙的嘴，則無論說A和O，或Y和Z，一樣是虛假的。』（同上）。魯迅是竭力暴露黑暗的，他的諷刺和幽默，是最熱烈最嚴正的對於人生的態度。那些笑他『三個冷靜』的人，固然只是些嗡嗡嗡嗡的蒼

蠅。就是嫌他冷嘲熱諷的『不莊嚴』的，也還是不了解他，同時，也不了解自己。『空城計』一式的誇張並不是真正的戰鬥。可是，魯迅的現實主義決不是第三種人的超然的旁觀的所謂『科學』態度。善於讀他的雜感的人，都可感覺到他的燃燒着的猛烈的火燄在掃射着猥劣腐敗的黑暗世界。『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鬪將！』（同上）。

第二，是『韜』的戰鬥。『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還要韜。』（二心集：五六頁）。『野牛成爲家牛，野豬成爲豬，狼成爲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歡，于本身並無好處；……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人十家畜性——某一種人。』（而已集：『略論中國人的臉』）。而獸性就在於有『咬筋』，一口咬住就不放，拚命的剝苦的幹去，這才是韜的戰鬥。牧人們看見小豬忽然發一陣野性，等忽兒可馴服了，他們是不憂愁的。所以這種獸性和韜的戰鬥決不是歇死替利地可以幹得來的。一忽兒『絕望的狂跳』，一忽兒又『萎靡而頹傷』，一忽兒是囂張的狂熱，一忽兒又拖着胸臆懺悔，那有什麼用處。打仗就要像個打仗。這不是小孩子賭氣，要結實的立定自己的脚

跟，躲在壕溝裏，沉着的作戰，一步步的前進，——這是魯迅所謂『壕塹戰』的戰術。這是非合法主義的戰術。如果敵人用『激將』的辦法說：『你敢走出來』，而你居然走了出去，那末，這就像許褚的赤膊上前陣，中了箭是活該。而笨到會中敵人的這一類的奸計的人，總是不肯，也不會朝戰的。

第三，是反自由主義。魯迅的著名的『打落水狗』（墳：『論費厄瀆賴應該緩行』），真正是反自由主義，反妥協主義的宣言。舊勢力的虛偽的中庸，說些鬼話來麝雜在科學裏，調一下，鬼混一下，這正是牠的詭計。其實這鬪爭的世界，有些原則上的對抗事實上是決不會有調和的。所謂調和只是敵人的緩兵之計。狗可憐到落水，可是牠爬出來仍舊是狗，仍舊要咬你一口，只要有可能的話。所以『要打就得打到底』——對於一切種種黑暗的舊勢力都應當這樣。但是砒氣沉沉的市僧，——其實他們對於在自己手下討生活的人一點兒也不死氣沉沉，——表面上往往會對所謂弱者『表同情』，事實上他們有意的無意的總在維持着剝削制度。市僧，這是一種狹隘的淺薄的東西，牠們的頭腦（如果可以說這是頭腦的話），被千百年來的現成習慣和思想圈住了，而在這個圈子裏自動機似的『思想』着。家庭，私塾，學校，中西『人道主義』的文學的影響，一切所謂『法律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影響，把市政的腦筋造成了一種簡單機器，碰見什麼『新奇』的，『過激』的事情，立刻就會像留聲機似

的「啊呀呀」的叫起來。這種「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魯迅這種暴露市僧的銳利的筆鋒，充分的表現着他的反中庸的，反自由主義的精神。

第四，是反虛偽的精神。這是魯迅——文學家的魯迅，思想家的魯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現實主義，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張，都是用這種真實，這種反虛偽做基礎。他的神聖的憎惡就是針對着這個地主資產階級的虛偽社會，這個帝國主義的虛偽世界的。他的雜感簡直可以說全是反虛偽的戰書，譬如別人不大注意的華蓋集續篇就有許多猛烈而銳利的攻擊虛偽的文字，久不再版的墳裏的好些長篇也是這樣。而中國的統治階特別善於虛偽，他們有意的要把虛偽籠罩羣衆的意識；他們的虛偽是超越了全世界的紀錄了。『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同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他們什麼都不信，但是他們『雖然這樣想，卻是那麼說，在後台這麼做，到前謂可那麼做』……這叫做『做戲的虛無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虛偽到這地步，其實是頂老實了。西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或者民權主義者，或改良妥協的所謂社會主義者，至少在最初黎明期的時候，自己也還蒙

在鼓裏，一本正經的信仰着什麼，或者理論，或者宗教，或者道德——這種客觀上的欺騙作用比較的強些。——而中國的是明明知道什麼都是假的，不個偏要這麼說說，做做，騙騙人，或者簡直武斷地亂吹一通，拿來做殺人的理論。自然，自從西洋發明了法西斯主義，他們那裏也開始中國化了。嗚呼，『先進的』中國呵。

自然，魯迅的雜感的意義，不是這些簡單的敘述所能夠完全包括得了的。我們不過爲着文藝戰線的新的任務，特別指出雜感的價值和魯迅思想在鬥爭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們應當向他學習，我們應當同着他前進。

魯迅論

茅盾

一

幾年來，常在各種雜誌報章上，看到魯迅的文章。我和他沒甚關係，從不曾見過面，然而很喜歡看他的文章，並且讚美他。只因我一向居無定處，又所居之地，在最近二三年，是交通不便，難得看見外界書報的地方，所以並未完全看過魯迅的著作。近來看見一本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這是去年出版的，可是我到今年纔看得到。——方知世間對於魯迅這人及其著作，有如此這般不同的論調。又從此書，知道魯迅的著作，大都已有單行本，要窺全豹，亦非雜事，這就刺戟我去買了他的已出版的全部著作來看。兩月前，在一個山裏養病，竟把他的著作全體看了一遍，頗有些感想，拉雜寫下來，遂成此篇。如果題名曰「我所見於魯迅者」，或是「關於魯迅的我見」，那自然更漂亮，不幸我不喜這等扭扭捏捏的長題目，便率直的套了從前做史論的老調子名曰「魯迅論」了。

二

魯迅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看見過他的人們描寫他們的印象道：

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他手裏老拿著烟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的初次見魯迅先生，馬珏。）這是一個小學生的印象。

又一位女士描寫她的印象道：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曙天女士訪魯迅先生。）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

（致志摩，陳源。）

這又是一位大學教授的描寫。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前面就有一張魯迅最近畫像八字鬍子，瘦瘦的臉兒，果然不漂亮；如果在冬天，這個人兒該也會戴皮帽子，穿厚厚的大氅罷。可惜瘦了一點，不然，豈但是「很

可以表出，「簡直是『生就成的官僚』罷。

上舉三篇，是值得未見魯迅的人們讀一遍的。在小學生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不漂亮，不活潑，又老又呆板；在一位女士看來，魯迅是意外地並不「沉悶而勇猛」，「愛說笑話，然而自己不笑；在一位大學教授看來，魯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官僚，不是久已成爲可厭的代名詞麼？

好了，既然人各有所見，而所見又一定不同；我們從魯迅自己的著作上找找我的印象罷。

三

張定璜在他的魯迅先生（亦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裏告訴我們說：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里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的們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的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慌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

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烟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著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於手術富於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蒙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細微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些他都管不著，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於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至於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嫂，七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沈默的旁觀者麼？……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里，我們都感覺到它。我們無法拒

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泣歌可的。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地方非常之深。

這是好文章，竟整大段的抄了來了。「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沈默的旁觀，」「魯迅之爲魯迅，盡於此二語罷。然而我們也不要忘記，魯迅站在路旁邊，老實不客氣的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同時他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他不是一個站在雲端的「超人，」嘴角上掛著莊嚴的冷笑，來指斥世人的愚笨卑劣的；他不是這種樣的「聖哲！」他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住了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向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衰弱，世事是多麼矛盾！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吶喊六三頁）和端午節（吶喊一八九頁，）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一件小事裏的意義是極明顯的這里，沒有頌揚勞工神聖的老調子，也沒有呼喊無產階級最革命的口號，但是我們卻看見鳩首囚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卻有一顆質朴的心，熱而且跳的心。在這面前，魯迅魯迅感覺得自己的「小」來。他沉痛地自白道：

這事到了現在 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 在我早如幼小時候所讀的「子曰詩云」一般 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 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 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

氣和希望。

所以我對於這篇「並且即稱爲隨筆都很拙劣的一件小事，」——如一位批評者所說卻感到深厚的趣味和強烈的感動。對於端午節 我的看法亦自不同。這位批評者說：

我讀了這篇端午節 纔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而最使我覺得可以注意的，便是端午節的表現的方法恰與我的幾個朋友的作品相同。我們的高明的作者當然不必是受了我們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無可多疑的，那便是我們的作者原來與我的幾個朋友是一樣的境遇之下，受着大約相同的影响，根本上本有相同之可能的。無論如何 我們的作者由他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 與我們接近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在這一點，端午節這篇小說對於我們的作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 欣賞這篇作品的人，也不可忘記了這一點。（關於魯迅及其著作頁八〇，成仿吾吶喊的評論。）

這一段話，雖然反覆詠歎，似乎並未說明所謂「自我表現」是指端午節所蘊含的何方面（在我看來 端午節還是一篇剝露人的弱點的作品 正和故鄉相彷彿，所以其中蘊含的意思方面很多，）但是尋繹之後 我以爲——當然口是我以爲——或者是指「情卅城俗，懷才不遇」等情調是作成了端午節的「自我表現」的「努力。」如果我這尋繹的結論不錯，

我卻不能不說我從原文所得的印象。竟與這個大不相同了。我以為端午節的表面雖頗似作者借此發洩牢騷。但是內在的主要意義卻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片段。在這里。作者很巧妙地刻畫出「易地則皆然」的人類的自利心來；並且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自己也不是怎樣例外的聖人。端午節內寫方玄綽向金永生借錢而被拒後，有着這樣的一段話：

方玄綽低下頭去了。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他接著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那有時一個同鄉來時十塊錢。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因為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便裝了一副爲難的神色，說道衙門裏既然領不到俸錢，學校裏又不發薪水。實在「愛莫能助。」將他空手送走了。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但此時却覺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動。又搖一搖頭。

並且端午節的末了，還有一段話：

這時候。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惘惘然的走過稻香村，看見店門口豎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頭彩幾萬元，』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但似乎因為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

這又是深刻的坦白的自己批評了。

我覺得這兩段話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義聲，更使我感動；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人類原是十分不完全的東西，全璧的聖人是沒有的。但是赤裸地把自己剝露了給世人看，在現在這世間可惜竟不多了。魯迅板著臉，專剝露別人的虛偽的外套，然而我們並不以為可厭，就因為他也嚴格地自己批評自己分析呵！紳士們討厭他多嘴；把他看作老鴉，一開口就是「不祥。」並且把他看作「火老鴉，」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火着。然而魯迅不餒怯，不妥協。在這樣的戰士（野草七七頁）裏，他高聲叫道：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鎗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砲。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拏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鎗。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砲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

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

一切都頹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無物。無物之物已經脫走，得了勝利，因為他這時成了戕害慈善家等類的罪人。

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在無物之陣中大踏步走，再見一式的點頭，各種的旂幟，各樣的外套……。但他舉起了投槍。

他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在這樣的境地裏，誰也不聞戰叫：太平。

太平……。

但他舉起了投槍！

看了這一篇短文，我就想到魯迅是怎樣辛辣倔強的老頭兒呀！然而還不可不看看墳的後記中的幾句話；

至於對別人……還有願使憎惡我的文字的東西得到一點嘔吐——我自己知道，我並

不大度，那些東西因我的文字而嘔吐，我也很高興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我有時也就想就此驅除旁人，到那時還不唾棄我的，即使是梟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這纔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但現在我並不。因為，我還沒有這樣勇敢。那原因就是我還想生活，在這社會裏。還有一種小緣故，先前也曾屢次聲明，就是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甲在身上，站著，給他們的世界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為止。

（寫在墳後面，墳三〇〇頁）

看這個老子的口吻何等武媚！

四

如果你把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仔細讀過了一遍，你大概不會反對我稱他爲「老孩子」。張定璜說魯迅：

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

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這話自是確論；我們翻開吶喊，彷彿華蓋集，隨時隨處可以取證。但是我們也不可忘記，這個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的舟子，雖然一則曰：

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人了，（吶喊自序）再則曰：

但我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寫在墳後面。）

然而他的胸中燃著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他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然而他的著作裏，也沒有「人生無常」的歎息，也沒有暮年的暫得甯靜的歆羨與自慰（像許多作家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裏卻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剝露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拏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儘自刺。我們翻開魯迅的雜感集三種來看，則雜感集第一的熱風大部分是剝剔中華民族的「國瘡」，在感集第二華蓋集中，我們看見魯迅除奮勇剝剔毒瘡而外，又時有一歲月已非，毒瘡依舊」的新憤慨。忽然想到的一，三，四，七，等篇（見華蓋集），這個與那個（華蓋集一四二頁至一五三頁，）無花的薔薇之三華蓋集續編一一八頁，春末閒譚（填

二一三頁，）再論雷峯塔的倒掉（填二〇一頁，）看鏡有感（填二〇七頁）等，都充滿着這種色彩。魯魯迅憤然說：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華蓋集十一頁。）

他又說：

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我以為除此沒有別的法。（華蓋集一五頁。）

熱風中所收，是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所作的雜感，這六年中，我們看見『思想革命』連動的爆發，看見牠的橫厲不可一世的剎那，看見牠終於漸漸軟下去，被利用，被誤解下去，到一九二四年，蓋幾已銷聲匿跡。是不是老中國的毒瘡已經剝去？不是！魯迅在一篇雜感長城裏說：

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爲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纔不給長城添新磚呢。

舊有的和新補添的聯爲一氣又造成了束縛人心的堅固的長城，正是一九二四年以後的情狀。在另一處，魯迅有極妙的諷刺道：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
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却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
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華蓋集續編一一九頁。）

然而攻擊老中國的國瘡的聲音，幾乎只剩下魯迅一個人的了。他在一九二五年內所做的
雜感，現收在華蓋集內的，分量竟比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四年這六年中爲多。一九二六年做
的，似乎更多些。「寂寞」中間這老頭兒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闌珊」成了很觸目的對照。

魯迅不肯自認爲「戰士」或青年的「導師」。他在寫在墳的後面說：

倘說爲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爲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
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
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
路。那當然不止一條，我可正不知那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
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

（華蓋集五五頁。）

偏偏都鑿鑿，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裏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稱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裏，那錢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但是我們不可上魯迅的當，以為他真個沒有指引路，他確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什麼運動，他從不擺出「我是青年導師」的面孔，然而他確指引青年們一個大方針：怎樣生活着，怎樣動作着的大方針。魯迅決不肯提出來呼號於青年之前，或板起了臉教訓他們，而他的著作裏有許多是指引青年應當如何生活如何行動的。在他的創作小說裏有反面的解釋，在他的雜感和雜文裏就有正面的說明。單讀了魯迅的創作小說，未必能夠完全明白他的用

意，必須也讀了他的雜感集。

魯迅曾對現代的青年說過些什麼話呢？我們來找找看：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蓋集四〇頁）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九散，祕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四三頁。）

在別一地方，我們看見魯迅又加以說明道：

……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我爲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者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中國人雖然想了各種苟活理想鄉，可惜終於沒有實現。但我却替他們發見了，你們大概知道的罷，就是北京的第一監獄。這監獄在宣武門外的空地裏，不怕鄰家的火災；每日兩餐，不虛凍餒；起居有定，不會傷生；構造堅固，不會倒塌；禁卒管著，不會再犯罪；強盜是決不會來搶的。

住在裏面何等安全，眞真是『千金之子座不垂堂』了。但闕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奈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的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華蓋集四九頁至五〇頁。）

這些話，似乎都是平淡無奇的，然而正是這些平淡無奇的話是青年們所最需，而也是他們所最忽略的；魯迅又說過：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華蓋集五四頁。）

大概有人對於這些話又要高喊道：「這也平淡無奇！」不錯！確是平淡無奇，然而連平淡無奇的事竟也不能實現，其原因還在於「不做」。魯迅更分析地說道：

第一需要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爲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但也因爲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墳一六七頁。）

其次需要「韌性。」魯迅有一個很有趣的比喻道：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塗擠入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佯爲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担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爲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利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華蓋集一五〇頁）

魯迅鼓勵青年們去活動去除舊革新，說：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况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着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闖人的路綫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為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華蓋集一五二頁』

他對於現在文藝界的意見，也是鼓勵青年努力大膽去創作，不要怕幼稚。（見墳一七一頁）

對於所謂正人君子學者之流的欺騙青年，他在一點比喻內說：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人羣中也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

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於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華蓋集續編三二至三三頁。）

然而魯迅也不贊成無謂的犧牲，如「請願」之類。北京「三一八」慘案發生了後，魯迅有好幾篇雜感寫到這件事，在「死地」內，他說：

但我却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很大的折本。』

在空談內，魯迅更詳細地說道：

（華蓋集續編九一頁）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却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凶殘。……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羣衆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彷彿就承認了對徒手羣衆應該開鎗，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白沒羅網一般。……』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各當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華蓋集續編一〇九至一一一頁）

在無花的薔薇之二第八節內，魯迅又有這樣幾句話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八八頁。）

五

離開魯迅的雜感，看魯迅的創作小說罷。前面說過，喜歡讀魯迅的創作小說的人們，不應該不看魯迅的雜感；雜感能幫助你更加明白小說的意義，至少，在我自己，確有這種經驗。

吶喊所收十五篇，彷徨所收十一篇，除幾篇例外的，如不周山，兔和貓，幸福的家庭，傷逝等，大都是描寫「老中國的兒女」的思想和生活。我說是「老中國」並不含有「已經過去」的意思，照理這是應該被剩留在後面而成爲「過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國很難講，所以吶喊和彷徨中的「老中國的兒女」，我們在今日依然隨時隨處可以遇見，並且以後一定還會常常遇見。我們讀了這許多小說，接觸了那些思想生活和我們完全不同的人物，而有極親切的同情；我們跟着單四嫂子悲哀，我們愛那個懶散苟活的孔乙己。我們忘記不了那負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閩士，我們的心爲祥林嫂而沉重，我們以緊張的心情追隨着愛姑的冒險，

我們鄙夷然而又憐憫又愛那阿Q……總之，這一切人物的思想生活所起於我們的情緒上的反映，是憎是愛是憐，都混爲一片，分不明白。我們只覺得這是中國的，這正是中國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們的生活，這正是圍繞在我們的「小世界」外的大中國的人生！而我們之所以深切地感到一種寂寞的悲哀，其原因亦即在此。這些「老中國的兒女」的靈魂上，負着幾千年的傳統的重担子，他們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們的生活是可以咒詛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並且不能不懷懷地反省自己的靈魂究竟已否完全脫卸了幾千年傳統的重担。我以爲吶喊和彷徨所以值得並且逼迫我們一遍一遍地翻讀而不厭倦根本原因便在這一點。人們的見解是難得一律的，並且常有十分相反的見解；所以以上述云云，只是「我以爲」而已。但是以下的一段文字卻不可不抄來看看：

……共計十五篇的作品之中，我以爲前面的九篇與後面的六篇，不論內容與作風，都不是一樣。編者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恰依我的分法把目錄分爲兩面了。如果我們用簡單的文字來把這不同的兩部標明，那麼，前九篇是『再現的』，後六篇是『表現的。』

嚴格地說起來，前九篇中之故鄉一篇應該歸入後期作品之內，然而下面的阿Q正傳又是前期的作品，而且是前期中很重要的一篇，所以便宜上不妨與前期諸作並置。

前期的作品有一種共通的顏色，那便是再現的記述。不僅狂人日記，孔乙己，頭髮

的故事，阿Q正傳是如此，即別的幾種也不外是一些記述（description），這些記述的目的，差不多全部在築成（building）各樣典型的性格（typical character）；作者的努力似乎不在他所記述的世界，而在這世界的住民的典型。所以這一個個的典型築成了，而他們所住居的世界反是很模糊的。世人盛稱作者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典型築成了，然而不知作者的失敗，也便是在此處。作者太急了，太急於再現他的典型了。我以為作者若能不這樣急於追求『典型的』他總可以尋到一點『普遍的』（allgemein）出來。

我們看這些典型在他們的世界不住地盲動，猶如我們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沒有與我們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們猜出他們的心理的狀態。而作者偏偏好像非如不足以及再現他的典型的樣子。關於這一點，作者所急於築成的這些典型本身固然應該負責，然而作者所取的再現的方法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吶喊」的評論：成仿吾；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七四至七六頁。）

我和這位批評者的眼光有些不同，在我看來，吶喊中間的人物並不是什麼外國人，也不覺得「跑到了一個未曾到過的國家，看見了各樣奇形怪狀的人在無意識地行動。」所以那「裏面最可愛的小東西乙乙」以及那引起多人驚異的阿Q正傳，我也不以為「淺薄的紀實的

傳記。「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這位批評者又說：

文藝的作用總離不了是一種暗示，能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方可謂發揮了文藝的效果，若以全部來示全部，這便是勞而無功了。只顧描寫的人，他所表現的不出他所描寫的以外，便是勞而無功的人。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這樣的作品便再湊千百篇攏來，也暗示全部不出。藝術家的努力要在捕住全部——一個時代或一種生活的——而表現出來，像庸俗之徒那樣死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引同上。）

這意思若曰：孔乙己，藥，明天等作，所以成其為勞而無功的庸俗作品，即因牠並不能以部分暗示全部。又若曰：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小栓，僅吶喊的小說中有此類人，其於全中國，則成爲碩果，初無其匹，故只是部分的。不錯，我也承認，孔乙己，單四嫂子，老栓等，只是吶喊集中間的一個人物，但是他們的形相閃出在我的心前時，我總不能叫他們爲孔乙己，單四嫂子等，我覺得他們雖然頂了孔乙己……等名姓，他們該是一些別的什麼，他們不但在吶喊的紙上出現，他們是「老中國的兒女」，到處有的是！在上海的靜安寺路，霞飛路，或者不會看見這類人，但如果你離開了一洋場，「走到去年上海市民所要求的「永

不駐兵」區域以外，你所遇見的，滿是這一類的人。然則他們研竟是部分的呢？抑是暗示全部的？我們可以再抄別一個人的意見在這裏：

……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里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他（魯迅）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薰著中國的土氣。……

（張定璜、魯迅先生。）

現代煩悶的青年，如果想在吶喊裏找一點刺戟，（他們所需要的刺戟，）得一點慰安，求一條引他脫離「煩悶」的大路：那是十之九要失望的。因為吶喊所能給你的，不過是你平日所唾棄——像一個外人對於中國人的唾棄一般的——老中國的兒女們的灰色人生。說不定，你還在這裏面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在彷徨內亦復如此——雖然有幾篇是例外。或者你肯定不肯承認那裏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讀一讀阿Q正傳。這篇內的冷靜婉妙的諷刺，或者會使人忘記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義，而認為只有「滑稽」，但如你讀到兩遍以上，你總也要承認那中間有你的影子。你沒有你的「精神勝利的法寶」麼？你沒曾善於忘記受過的痛苦像阿Q麼？你潦倒半世的深夜裏有沒有發過「我的兒子會闖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負？算了，不用多問了。總之，阿Q是「乏」的中國人的結晶；阿Q雖然不會吃大菜，不會

說洋話，也不知道歐羅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會吃大菜，說洋話；的「乏」的「老中國的新兒女，」他們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個或半個阿Q罷了。不但現在如此，將來——我希望這將來不會太久——也還是如此。所以阿Q正傳的談諧，即使最初使你笑，但立刻我們失卻了笑的勇氣，轉而爲惴惴的自不安了。況且那中間的唯一大事，阿Q去革命，「文章」的「咸與維新，」再多說一點：把總也做了革命黨，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舉人老爺也幫辦民政，然而不在把總眼裏……這些自然是十六年前的陳事了，然而現在鑽到我們眼裏，還是怎樣的新鮮，似乎歷史又在重演了。

他拿著往事，來說明今事，來預言未來的事，

（尙鉞魯迅先生，見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一頁。）

魯迅只是一個凡人，安能預言；但是他能夠抓住一時代的全部，所以他的著作在將來便成了預言。

彷徨中的一十篇，幸福的家庭和傷逝是魯迅所不常做的現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寫。戀愛，是這兩篇的主題。但當書中人出場在小說的時候，他們都已過了戀愛的狂熱期，只剩下幻滅的悲哀了。傷逝的悲劇結果，是已經明寫了出來的，幸福的家庭雖未明寫，然而全篇的空氣已經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劇的結果大概是終於難免的罷。主人公的幻想的終於破滅，幸運

的惡化，主要原因都是經濟壓迫，但是我們聽到的，不是被壓迫者的引吭的絕叫，而是疲恭宛轉的呻吟，這呻吟直刺入你的骨髓。像冬夜窗縫裏的冷風，不由你不毛骨悚然。雖則這兩篇的主人公似乎有遭遇上的類似，但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只是麻木地負荷那「戀愛的重担」；他有他的感慨，比如作者給我們的一段精采的描寫：

「……莫哭了呵，好孩子。爹爹做「貓洗臉」給你看。」他同時伸長頸子，伸出舌頭，遠遠的對著手掌舔了兩舔，就用這手掌向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

「呵呵呵，花兒。」她就笑起來了。

「是的是的，花兒。」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這纔歇了手，只見她還是笑迷迷地掛著眼淚對他看。他忽而覺得，她那可愛的大真的臉，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通紅的嘴唇尤其像，不過縮小了輪廓。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爲她犧牲的時候，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他惘然的坐著，彷彿有些醉了。

「阿阿，可愛的嘴唇……」他想。

門幕忽然掛起，劈柴運進來了。

他也忽然驚醒，一定睛，只見孩子還是掛著眼淚，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

「嘴唇……」他向旁邊一瞥，劈柴正在進來「……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九九八

十一：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他想着，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著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揉了幾揉，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淚和鼻涕。「好孩子，自己玩去罷。」他一面推開她說：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

(彷徨六五頁。)

這一段是全篇中最明耀的一點，好像是陰霾中突然的陽光的一閃，然而隨即過去，陰暗繼續統治着。從現在的通紅的嘴唇，笑迷迷的眼睛，又映出五年前，可愛的母親來；又從現在兩隻眼睛陰淒淒的母親，預言這孩子的將來；魯迅只用了極簡單的幾筆，便很張烈的刻畫出一個永久的悲哀。我以爲在這里，作者奏了「藝術上的凱旋。」

我們再看傷逝，就知道傷逝的主人公不像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公似的，只是麻木地負擔那「戀愛的重担。」傷逝的主人公涓生是一個神經質的狹介冷僻的青年，而他的對手子君也似乎是一個愛悒性子。比起涓生來，我覺得子君尤其可愛。她的溫婉，她的女性的忍耐，勇敢，和堅決，使你覺得她更可愛。她的沉默多愁善感的性格，使她沒有女友，當涓生到局辦事去後，她該是如何的寂寞呵，所以她愛動物，油雞叭兒狗便成了她白天寂寞時的良伴。然而這種委宛的悲哀的女性的心理，似乎涓生並不能了解。所以當經濟的壓迫終於到來時，這一對人兒的心理狀態起了變化，定到了分離的結局了。我們引一段在下面：

子君有怨色，在早晨，極冷的早晨，這是從未見過的，但也許是從我看來的怨色。我那時冷冷地氣憤和暗笑了；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於這空虛却並未自覺。她早已什麼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的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便只知道搥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

我覺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幸而是早晨，時間正多，我可以說我的真實。我們的新的道路的開闢，便在這一遭。（彷徨二〇〇頁。）

涓生覺得「分離」是二人惟一的辦法，所以他在通俗圖書館取暖時的冥想中，

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彷徨二〇三頁）覺得要來的事，終於來了。

子君並沒通通涓生，回到家庭，並且死了——怎樣死的，不明白。——涓生要
要向著新的生活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

到用遺忘和他說做我的前導……。（彷徨二一三頁）

涓生怎樣跨進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們不知道——作者並沒告訴我們。可是我以為這個神經質的青年大概不會有什麼新的生活的。因為他是

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無論是真實者，虛偽者。

（彷徨二〇八頁。）

幸福的家庭所指給我們看的，是：現實怎樣地嘲弄理想。傷逝的意義，我不大看得明白；或者是在說明一個脆弱的靈魂（子君）於苦悶和絕望的掙扎之後死於無愛的人們的面前。

彷徨中還有兩篇值得對看的小說，就是酒權上和孤獨者。這兩篇的主人公都是先曾抱着腔的「大志」想有一番作爲的，然而環境——數千年傳統的灰色人生——壓迫他們，使他們成了失敗者。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呂緯甫於失敗之後變成了一個「敷衍衍，隨隨便便」的悲觀者，不願挾起舊日的夢，以重自己的悲哀，甯願在寂寞中寂寞地走到他的終點——墳。他並且也不肯去挾破別人的美滿的夢。所以他在奉了母親之命改葬小兄弟的遺骸時，雖然墳穴內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本已可以不必再遷，但他

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小兄弟先前身體所任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裏，運到我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這樣總算完了一件事，足

夠去騙騙我的母親，使她安心些。（彷徨四二頁。）

孤獨者的主人公魏連艾卻另是一個結局。他是寂寞撫養大的，他有一顆赤熱的心。但是外形很孤僻冷靜。他在嘲笑咒罵排擠的活着，甚至幾於求乞地活着，因為他雖然已經灰卻了「壯志，」但還有一個人願意他活幾天。後來，連這也沒有了，於是他改變了；他說：

……然而我還有所爲，我願意爲此求乞，爲此凍餒，爲此寂寞，爲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你看。有一個願意我活幾天的，那力量就這麼大。然而現在是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同時，我自己也覺得不配活下去；別人呢？也不配的。同時。我自己又覺得偏要爲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好在願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經沒有了，再沒有誰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使這樣的人痛心，我是不願意。然而現在沒有了，連這一個也沒有了。快活極了。舒服極了；我已經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的崇拜，所主張的一切了。我已經真的失敗；——然而我勝利了。（彷徨一六四頁。）

願意他活幾天的，是什麼人，愛人呢，還是什麼親人我們可以不管，總之這不是中心問題。總之，他因此改變了，他以毀滅自己來「復仇」了。他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他這環境的突然改變，性格的突然改變，剝露了許多人的醜相。他勝利了！然而他也照他預定地毀滅了

自己。這里有一段寫出他的「報復」來：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從交運之後，人就和先前兩樣了，臉也抬高起來，氣昂昂的。對人也不再先前那麼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個啞子、見我是叫老太太的麼！後來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疍，他自己是不喫的，就擲在院子裏——就是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喫去罷！」……』

『可是魏大人的脾氣也太古怪！』她忽然低聲說：『他就不肯積蓄一點！水似的化錢。……他就冤裏冤枉胡裏胡塗地化掉了。譬如買東西！今天買進，明天又賣出！弄破，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彷徨一七二，四頁。）

作者在篇末很明白地告訴我們。

隱約是長嘯，像一匹受傷的狼！常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彷徨一七六頁）

六

上述幸福的家庭等四篇，以我看來，是彷徨中間風格獨異的四篇。說他們獨異，因為不是「老中國的兒女」的灰色人生的寫照。

魯迅的小說對於我的印像，拉雜地寫下來，就是如此。我當然不是文藝批評家，所以「批評」我是不在行的！我只顧寫我的印象感想，慚愧的是太會抄書，未免見笑於大雅，並且我自以為感想者，當然也是「紙皮論骨」而已。

然而不敢謬托知己，或借為廣告，卻是我敢自信的，完了。

（年小說月報）

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

蘇雪林

誰都知道魯迅是新文學界的老資格，過去十年內曾執過文壇牛耳，用不着我再來介紹。關於他作品的批評，雖不說汗牛充棟，着實也出過幾本冊子，更用不着我再來曉舌。不過好書不厭百回讀，好文字也不厭百回評，只要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意見，就說淺薄，也不妨傾吐一下。

閒話少說，我現在就來着手我的評論。魯迅的創作小說並不多，『吶喊』和『徬徨』是他五四時代到於今的收穫。兩本，僅僅的兩本，但已經使他在將來中國文學史佔到永久的地位了。他的『吶喊』出版一九二二年，共收文字十四篇，其中『一件小事』、『頭髮的故事』體裁屬於雜感；『兔和貓』，『鴨的喜劇』體裁屬於小品；惟『風波』，『阿Q正傳』才得稱為真正的短篇小說。

在這十四篇文字中『阿Q正傳』可算是魯迅的代表作。聽說已經翻譯為好幾國文字，與世界名著分庭抗禮，博得不少國際的光榮。最早批評這篇文章的人有周作人，胡適，陳西瑩

，沈雁冰等。又有人將它編成戲劇。現在『阿Q』二字還說在人們口頭，寫在人們筆下，評論文字若着意收集起來，不下數百則。自新文學發生以來像『阿Q正傳』魔力之大的，還找不出第二例子呢。

『阿Q正傳』這樣打動人心，這樣傾倒一世，究竟是什麼緣故？說是爲了它描寫一個鄉下無賴漢寫得太像了麼，這樣文字現在也有，何以偏讓它出名？說是文筆輕鬆滑稽，令人發笑麼，爲什麼人們不去讀『笑林廣記』偏愛讀『阿Q正傳』？告訴你理由吧，『阿Q正傳』不單單以刻畫鄉下無賴漢爲能事，其中實影射中國民族普遍的劣根性。『阿Q正傳』也不單單叫人笑，其中實包蘊着一種嚴肅的意義。

『阿Q正傳』所影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論者已多，但從沒有具體的介紹。因爲這篇文章涵義深廣，譬喻靈活，指實一端而遺其餘固不可，刻舟膠柱將活的變成死的尤其不可。所以無人願意嘗試。但這篇文章如此膾炙人口，到今沒有具體的解釋，究竟有些悶人。這就是我現在不揣冒昧寫這一篇『阿Q正傳講義』的動機。

我以爲『阿Q正傳』所影射中國民族的劣根性，種類雖多，犖犖大端，則有下列數種：

(1) 卑怯 阿Q最喜與人吵嘴打架，但必估量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與王鬍打架輸了時，便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假洋鬼子哭喪棒才舉起來，他已伸出頭顱以待了。

。對抵抗方稍爲薄弱的小D，則揎拳擄臂擺出挑戰的態度，對毫無抵抗力的小尼姑則動手動脚，大肆其輕薄。都是他卑怯天性的表現。徐旭生與魯迅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結果說中國人的大毛病是聽天任命與中庸，這毛病大約是由惰性而來的。魯迅回答他道：這不是由於惰性，是由於卑怯性。『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以自慰，倘他有了權力別人奈何他不得時，則凶殘橫恣，宛然如一暴君，做事並不中庸。』記得周作人也曾說過張獻忠在四川殺人數百萬，滿洲人一箭，便使他躲入道旁荆棘中。又見最近『獨立評論』發表譚嗣同『北遊訪學記』引錢尺岑的話云：『魏軍赴甘遇強回輒敗，適西寧有降已半年之老弱婦女，西寧鎮鄧增至一旦盡殺之，悉括其衣服器皿。凡萬餘人雖數月小孩無一得免者。……此等事無論何國皆無之，卽土番野蠻亦尙不至此。』又說『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彼叛軍也，故如盼官軍之至。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卽殺，見屋卽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譚氏於結局又發議論道：『由此觀之，幸而中國兵之不強也。使如英法國外，尙有遺種乎？故西人之壓制中國者，實上天仁愛之心使然也，準回部之已事可鑒也。』他這話似太過分，但我們若了解作者下筆時感覺如何沈痛，就可以原諒他了。

(2) 精神勝利法 阿Q與人家打架喫虧時：心裏就想道：『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

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於是他也心滿意足儼如得勝地回去了。中國人的精神勝利法發明固然很早，後來與異族周旋失敗，這方法便更被充分的利用。這裏我可以舉出許多歷史例子來：一代民族代表人受異族迫害之酷毒莫過於宋，而精神勝利法亦以宋以後爲盛。宋太宗是親征遼人中了遼人的箭而崩的。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後，轉徙沙漠中極人世不堪之苦。元朝楊璉真珈發掘南宋會稽諸陵，竊取珍寶。以諸帝后的骨殖，雜牛馬骨築白塔而埋之，並截取理宗頂骨爲飲器。這對於中國民族侮辱真太大了，所以那時宋遺民莫不引爲最切齒的深仇最痛心的紀念，與元人幾有不共戴天之概。但他們實在不能用實力來報復，只好先造一個『冬青樹』的傳說，後造一個元順帝爲宋末帝瀛國公血胤的傳說來安慰自己。到了清初則葉諸帝幾乎無一不出於漢種。故老相傳順治是關東獵人王某的兒子，係清太宗妃子與王某私通而生的。雍正正是衛大胖子的兒子，清聖祖微行悅衛妾之貌迎入宮，而不知她已有身孕。乾隆是海寧陳閣老的兒子。乾隆南巡，駐蹕陳家安瀾園，得知其事，想恢復漢代衣冠，幸太后力阻不果。所以前人清宮詞有『衣冠漢制終難復，空向安瀾駐翠辵』之句。想不到戰國呂不韋以呂易贏的故事，這時竟成這樣廣遍的複寫，無論宮闈深祕，外人不易知聞，卽以血統換易之巧而論，也太遠於情理。但我們老祖宗爲什麼要造這種謠言呢。我想無非爲了這種謠言一面既可以快意於異族統治者帷薄之羞，一面又可以自欺欺人地緩和自已失敗的

創痛而已。其情固有可原，其事則未免太可笑了吧！又如同治間清庭與英國爭持一件什麼國體問題，御史吳可讀上疏勸朝廷不必堅執，大意說外國人爲夷狄之民與禽獸無別，我們人類和禽獸相爭，勝固不足爲榮，敗亦不足爲辱云云。又如樊增祥『彩雲曲』叙及英后維多利亞有句道：『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這雖然故意拿國人所輕視的武則天來比她，但還可恕。到賽金花與英后合攝影片時，（照賽金花自述同座攝影者爲英國維后之女，卽德國皇后。見金東雷賽金花訪問記。樊詩蓋誤用其事。）又道：『誰知坤媪河山貌，却與楊枝一例看。』以中國傳統觀念看來，則輕薄得實不成話。如果當時把這首詩翻譯到英國去，無疑地要引起嚴重外交問題的。這些舊式文士在文字間討人一點便宜，沾沾自得，以爲足以洗滌喪師失地的恥辱而有餘，而不知實際上已把中國民族的尊嚴丟盡。因爲這與上文所引那些例子都屬於最卑劣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

（3）善於投機

阿Q本來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盪到未莊，趙太爺父子都

盤起辮子贊成革命，阿Q看得眼熟，也想做起革命黨來了。但阿Q革命的目的，不過爲了他自己的利益，於革命意義，實係毫沒有了解。所以一爲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門裏去告他謀反的罪名，好讓他滿門抄斬。『華蓋集』忽然想到那一條道：『中國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決不會吃苦的；因爲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這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

約也將永遠存在。在中國唯有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的時候，中國也永遠免不了反覆着先前的運命。』善於投機似乎成爲中國民族劣根性之一，不惟明清之末如此，現在又何常不如此。每次革命起來，最先附和的總是從前反革命最出力的人，而後來革命事業便逐漸腐化於這些病菌滋生之中。不過我們診斷這種民族劣根性，要看它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是先天的便無可救藥；是後天的則還有拔除的希望。照我個人意見，這種劣根性似乎同精神勝利法一樣，與異族長久的統治大有關係。中國自西晉以後，或半部或全部輪流屈服於異族鐵蹄之下，由五胡十六國，到遼金元清，我們做人家奴隸大約也有了一千多年吧。當異族侵略進來時我們種族中間那些忠憤激烈，有節概，有血氣的人，不是慷慨死敵，就舉室自焚了；而那些貪生無恥，迎合取巧之徒，反多得生存傳種的機會。天演公例是優勝劣敗，而我們恰得其反。經過千餘年的淘汰作用，我們民族就不知不覺變成現在的模樣。不但戰爭時期而已，異族統治時期，對待漢人手段都異常嚴厲，這一千多年中血腥的記錄，怨毒的紀念，影響中華民族品性之降低，尤其異常之穴。美國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著了一部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裏面有幾章專門討論中華民族的品性，經吾國潘光旦譯爲中文，改名『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亨丁頓的意思：中華民族智力之退化，自私自利心腸之特別發達，與『染指』習慣之牢不可破，都與那連續不斷的水災旱災所引起的飢饉有關係。同

樣我說，這種原則也可以應用在長久的異族統治上面的，比較久遠了的例子，暫不用提。以前清而論：入關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實行剃髮令時殺戮之慘；以及後來滿漢種族歧視之深，政治上種種待遇之不公平。都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盡。最可恨的，是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九次文字大獄，其刻毒慘酷，暗無天日，雖九幽十八層地獄不是過。我們今日讀這些記錄，還不覺爲之髮指背裂，我們祖宗當時宛轉吟呻於刀山劍獄鉄床油鼎之中，其痛苦又將何若？又如他們強迫遺老出仕，開博學鴻詞科，收羅不肯入網的名流。施行精神上的強姦之後，又列其姓名於『貳臣傳』，不齒之於衣冠之倫。凡此種種毒辣手段，無非想把漢人的民族意識，澈底消滅，漢人獨立的人格，完全摧毀，使漢人知道自己不過是命定的『奴才的奴才』，除了向主人搖搖尾巴，乞取一點他們吃得不用的殘羹冷炙以活命，什麼地位，學問，品格，氣節，都不配談。漢人漸漸也就明白異族統治者的用意，果然都以『奴才』自居，終日歌功頌德，獻媚乞憐，只求保留最低限度的生存權利。起初不過裝裝外表，後來習慣成自然，心理也變成奴才的了。奴才與主人的關係不過建立在衣食上，中間並無何等真實的情誼，一個主人倒了，不妨再去投靠另外一個。所以八國聯軍打進北京城，大英大法大德大日本的順民旗立刻滿街招展；辛亥革命起時，僅有陸鍾琦黃忠誥幾個書獃子死難，封疆大吏平日自稱深受國恩，誓必肝腦塗地以報的，逃得比誰還快，甚至於位至督撫之人可以一轉而爲民軍都督

。滿州政府三百年的摧殘士氣，今日自食其報，固然大快人心，但我們這份民族品格墮落的賬，又向誰去計算？

有人見清室全盛時武功之奔赫，疆土之擴張，學術之昌明，文藝之發達，每嘖嘖嘆羨，引爲美談，以爲跨唐軼漢，足稱中國歷史的光榮。而不知這一點光榮的代價，是：三百年的統治權，成河的奴隸血淚和成山的奴隸骸骨，還有無論什麼都換不來的整個中國民族的高貴的品格！

(4) 誇大狂與自尊癖 阿Q雖是極卑微的人物，而未莊人全不在他眼裏，甚至趙太爺的兒子進了學，阿Q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爲我的兒子將比他闊得多。加之進了幾回城更覺自負。『但爲了城裏油煎大頭魚的加葱法和條櫓的稱呼異於未莊，他又瞧不起城裏人了』。中國人以前動不動自稱其國爲數千年聲明文物之邦，自己是軒轅華胄，神明貴種，視西洋人爲野蠻民族，毫無文化可言。及屢遭挫敗，則又說西洋人所恃的不過船堅礮利而已，所有不過聲光化電而已，談到禮教倫常則何能及我們萬分之一？甚至於飽受西洋教育的辜鴻銘還說中國人隨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種精神文明。這何異於阿Q將自己頭上的癩頭瘡疤當做高尚光榮的符號，當別人嘲笑他時就說『你還不配……』呢？現在大部分的青年鄙視西洋文化，以爲那是陳舊的腐化的而且不久即將崩潰的資本主義文化而不屑加以一顧的一種態度

，也由誇大與自尊癖性而來，不過變換一種方式而已。

具有誇大與自尊癖性的人，也最容易變成過分的謙遜，與自輕自賤。阿Q被未莊閒人揪住辮子在牆上碰頭而且要他自認爲『人打畜生』時，他就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中國人固自以爲文化高於一切，鄙視別國爲夷狄之邦。但當那些夷狄之邦打進來時，平日傲慢的態度，便會立刻完全改變。宋代『三朝北盟彙編』以及『靖康紀聞』那一類史料，所紀當日宋君臣向強敵乞哀時誠惶誠恐的神情，宛轉悲鳴的口氣真有些使讀者讀不下去。他們只求金人允許他們小朝廷殘喘之苟延，允許他們身家性命富貴利祿之保全，稱姪可以，稱臣可以，歲獻貢幣可以，下殿受書可以，甚至表演什麼意想不到的卑躬屈節的醜態都可以。這毛病自古已然，於今爲烈，我也不願意再說了。

有些學者看見歷史上僵尸屢次出現，覺得中國民族太不長進而灰心。有些學者看見八股律詩，小脚，太監，板子夾棍的法庭，地獄式的監獄，而說中國全盤文化的本質，原不高明，在世界文化中原來沒有地位。他們說這話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然而竟有許多人覺得中國民族是地球最下等的最無希望的民族，中國人只配替人當奴隸，當牛馬。中國不亡，實無天理！又有許多人覺得中國民族若不倚靠別的民族合作，永遠不要想翻身。諸如此類的念頭，日日縈迴腦際。從前太過於自信，現在又太不自信，這現象雖奇特，其實也可以拿上面所

說的話來解釋。

此外則『色情狂』，『薩滿教式的衛道精神』，『多忌諱』，『狡滑』，『愚蠢』，『貪小利』，『富倖得心』，『喜歡湊熱鬧』，『糊塗昏憤』，『麻木不仁』，都切中中國民族的病根，作者以嘻笑之筆出之，其沈痛逾於怒罵。當『阿Q正傳』用『巴人』筆名在北京晨報副鐫發表時有人在『小說月報』上表示對這篇文字的不滿，他說阿Q不像真有其人，爲的作者形容太過火了。沈雁冰便替他辨護道：阿Q有否其人我不知道，但阿Q確乎處處可以遇見，我好像同他面熟得很。呀！我明白了。原來中國人個個都帶有阿Q氣質。阿Q其實是中國人的典型。沈氏又道我們不斷地在社會各方面遇見『阿Q相』的人物，我們有時自省，常常疑惑自己身體中也不免帶有一些『阿Q相』的分子。

阿Q既代表着中國人氣質，爲整個中國民族的典型，所以最初發表時讀者每疑阿Q就是指着他自己。『現代評論』涵虛（卽高一涵）曾記他一個朋友初讀『阿Q正傳』時惴惴然疑這篇文字出於某人手筆，阿Q的事跡樣樣都在對他諷刺。後來打聽出來作者與他並不相識，這才釋然。這類笑話記得西洋文學界也曾有過。像英國梅台斯（G. Meredith）寫『自私者』（The Egoist）他有一個朋友對他提出責問，說書中主人公威羅比先生（Sir Willoughby Patterne）正指着他。又如俄國龔察洛夫（J. Gantcherov）寫『阿蒲洛摩夫』（Obломov）時讀者

都覺自己血管裏有着『阿蒲洛摩夫』氣質的存在。『阿Q正傳』可以與這兩個故事一併流傳爲美談了。

但善做小說的人既賦作品中人物以『典型性』(Typical Trait)，同時也必賦之以『個性』(Individual Trait)，否則那人物便會流爲一種公式主義，像中國舊劇裏的臉譜一樣。陳西滢說『阿Q不但是個Type，同時又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大約可以同李逵劉老老同垂不朽了。』(新文學以來十部著作)這就是說阿Q雖然是個典型人物，同時也是個個性人物。『阿Q正傳』之所以在文壇獲得絕大成功，其原因無非在此。

此外則『狂人日記』，『風波』，『故鄉』，『社戲』，『孔乙己』均爲精彩之作。『狂人日記』是一篇抨擊舊禮教的半象徵文章。發表後『喫人禮教』四字成爲五四知識階級的口頭禪，其影響不能說不大。

魯迅第二集小說爲『徬徨』。其包含作品十篇。如『祝福』寫村婦祥林嫂悲慘的命運，舊禮教及迷信思想之害。『肥皂』用嘲笑的态度，喜劇的寫法，刻劃道學先生的變態性慾。『兄弟』寫張沛君的假友愛。『長明燈』與『狂人日記』似係一個姊妹篇，寫革命失敗者悲據。『在酒樓上』則爲感傷主義作品。『示衆』寫中國人喜欢看殺頭的變態心理。還有『幸福的家庭』『傷逝』等等不必細述。

魯迅創作小說的藝術，我們現在可以略為討論。我以為他的小說藝術的特色雖富，最顯明的僅有三點：第一是用筆的深刻冷雋，第二是句法的簡潔峭拔，第三是體裁的新穎獨創。

有人說魯迅是曾經學過醫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將這技術應用到文學上來。不過他解剖的對象不是人類的肉體，而是人類的心靈。他不管我們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閃，只冷靜地以一個熟練的手勢舉起他那把鋒利無比的解剖刀，對準我們魂靈深處的創痕，掩藏最力的弱點，直刺進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癥結，擺在顯微鏡下讓大眾觀察。他最恨的是那些以道學先生自命的人，所以他描寫腦筋簡單的鄉下人用筆每比較寬恕，一至寫到『阿Q正傳』裏的趙太爺，『祝福』裏的魯四爺，『高老夫子』裏的高爾礎，便針針見血，絲毫不肯留情了。他寫『阿Q正傳』本來爲了痛惡阿Q這類人想淋漓盡致地將他的醜態形容一下。然而寫到阿Q被槍斃時，我們覺得真正可惡的還是那些趙太爺，錢舉人，把總老爺這一流土豪劣紳，阿Q不過做了地們的犧牲品罷了。周作人說作者原意是想打倒阿Q的，誰知後來反倒把他扶起了。他認爲這是魯迅的失敗。我覺得很有道理。魯迅之所以失敗，就因他恨那些『上流人』太深的緣故。他對於那些『上流人』不但把他們清醒時的心靈狀態，赤裸裸地給宣布出來，便是在他們睡眠中意識已失去裁判時，還要將他們夢中的醜態——或者這才是他們的真相——披露給大家看。像『兄弟』那篇主人公張沛君一聽說他弟弟患了猩紅熱，便驚憂交集，

寢食皆廢，可見他平日對兄弟如何友愛。然而他在夢中則虐待他兄弟的遺孤，把平日隱藏着不敢表示的自私自利心思，一齊發洩出來了。這雖然應用奧大利心理學家佛洛依德(J. Freud)「夢的解釋」的原理來解剖張沛君的潛意識，但不是魯迅，也寫不得這樣入木三分。又如「肥皂」裏主人公四銘先生看見街上一個侍奉祖母討飯的十七八歲的女乞兒，便對她發生同情，稱贊她是孝女，想做詩文表彰她，以爲世道人心之勸。不過他這舉動，初則被含着醋意的太太罵破，繼則被一邱之貉的衛道朋友笑穿，我們才知道道學假面具下，原來藏着一團邪念。「阿Q正傳」裏的趙太爺因阿Q調戲他的女僕不許他再進門，但聽見阿Q有賊贓出售，就不禁食指大動，自毀前約。「祝福」裏的魯四太爺憎惡林祥嫂是寡婦，尤其憎惡她的再嫁，說這種人是傷風收俗的，但到底收留她因爲她會做活。因爲筆法這樣深刻，所以魯迅文字天然帶着濃烈的辛辣味。讀着好像吃胡椒辣子，雖涕淚噴嚏齊來，却能得到一種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覺，一種神經久久鬱悶麻木之後由強烈刺激梳爬起來的輕鬆感覺。

但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時寫得很含蓄，以「肥皂」爲例。他描寫道學先生的變態性慾，傍敲側擊，筆筆生姿，所謂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鈍根人學渠不得。又像「風波」裏七斤嫂罵丈夫不該剪去辮子，八一嫂來勸，揭了她的短處。她正沒好氣，恰值女兒來打岔，就罵她是「偷漢的小寡婦！」於是對方生氣了，說「七斤嫂，你恨捧打人！」作者始終沒

有將七斤嫂這句話的用意說明，但他在事前開開着八一嫂『抱着伊兩週歲的遺腹子』的一筆；事後又閒閒着『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的一筆，我們自然會感長到那句罵話的重量了。還有許多例子不及具引。總說一句，魯迅從不肯將自己所要說的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只教你自己去想，想不透就怪你們自己太淺薄，他不負責。他文字的異常冷雋，他文字的富於幽默，好像諫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尋常作家所能及。

魯迅作品用字造句都經過千錘百鍊，故具有簡潔短峭的優點。他答『北斗雜誌』問如何寫創作小說，曾有這樣的話：『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吝惜。寧可將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不可將Sketch的材料拉長成小說。』記得古人作文有『惜墨如金』之說，魯迅的『Sketch論』足與媲美。他文字的簡潔真個做到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的地步。句法的短峭則如『社戲』『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灘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纏綿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白光』『他剛到自己的房門口，七個學童便一齊放開喉嚨，吱的唸起書來。他大吃一驚，耳朵邊似乎敲了一聲磬，只七個頭拖了小辮子在眼前幌，幌得滿房，黑圈子也夾着跳舞。

他坐下了，他們送上晚課來，臉上都顯出小覷他的神色。『這二段文字，一段寫兒童戀着看戲的情景，一段寫落第秀才神智昏亂的情景，裏面心理的描寫都很細膩深刻。我常說句法單純不要緊，要緊的裏面含蘊『陰影』豐富，即此之謂。

魯迅作小說更有一種習慣，當事項進行到極緊張時，他就完全採用舊小說簡單的筆調。這裏不妨再舉『風波』裏最熱鬧的一段文字爲例：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拿了空碗伸手去嚷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下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又如阿Q在趙太爺調戲女僕一段：

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洗完了碗碟，也就在長檯上坐下了。而且和阿

談開天：

「太太兩天沒有吃飯哩，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睡覺，我和你睡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一剎那時中很寂

然。

「呵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櫈，慢慢的站立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志志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我們應當知道小說事項進行到緊張時，讀者的精神也就跟着振奮起來了，好奇心也被撥得按捺不住了，只希望快快讀下去好知道那事項的結果。若讀到灣灣曲曲的描寫，心理上必定大感不快。——其欲擒故縱特作騰挪者不在此例——措詞過於新奇爲我們所不慣，或描寫方法過於深曲，非費幾分腦力不能理解者。用以描寫拉拉雜雜如火如荼的局勢也足以損害我們的興趣。法國服爾泰 (Voltaire) 傑作『意弟德』 (Candide) 脫稿於數日之中。書中事項連續而下，毫無停頓，其筆致之輕快流利，不啻彈丸脫手，駿馬下坡。而且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諷刺文學的絕品，佛郎士批評這部書道『筆在服爾泰指中一面飛奔，一面大笑。』我們想假如服爾泰的筆拖着許多繁重的辭藻，許多贅累的描寫，還能奔而且笑麼？

古人作文有『去陳言』之說。韓愈說『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又說『唯陳言之務去，莫莫乎其難哉！』劉大櫚論文道『經史百家之文，雖讀之甚熟，却不許用他一句，要另作一番言語。』又說『大約文章是日新之物，若陳陳相因，安得不目爲臭腐？原本』

古人意義，到行文時却須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謂去陳言」。魯迅文字新穎獨創的優點，正立在這「於詞必己出」，「重加鑄造一樣言語」上。沈雁冰批評他的「狂人日記」，說它的「題目，體裁，風格，乃至裏面的思想都是極新奇可怪的。」又說「它的體裁分明給青年們一個暗示使他們拋棄了『舊酒瓶』，努力用新形式來表現自己的思想。」這篇文字全體分爲十三節，每節長者六七百字，短者僅十餘字。分行全用西法，三四字也可爲一行。二三十年前中國文學感受西洋影響，短篇小說也有學西洋文學之分段分行的，但如狂人日記體裁之嶄然一新却是初見。又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一八年，這時候五四運動的狂流還沒有起來，所以尤其值得注意。

但我們要知道魯迅文章的「新」，與徐志摩不同，與茅盾也不同。徐志摩於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靈於活潑靈動的國語；茅盾取歐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鑄鑄，別成一種文體。他們文字都很漂亮流麗，但也都不能說是「本色的」。魯迅好用中國舊小說筆法，上文已介紹過了。他不惟在事項進行緊張時，完全利用舊小說筆法，尋常敘事時，舊小說筆法也佔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組織方面，運用一點神通，便能給讀者以「新」的感覺了。化腐臭爲神奇，用舊瓶裝新酒，果然是這老頭子的獨到之點。譬如他寫「單四嫂子」死掉兒子時的景況：

下半年棺材合上蓋，因為單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總不肯死心場地的蓋上，幸虧王九媽等得不耐煩，氣憤憤的跑上前，一把推開他，才七手八脚的蓋上了。

若其全篇文字都是這樣，還有什麼新文藝之可言。但下文寫棺材出去後單四嫂子的感覺：

單四嫂子很覺得頭眩，歇息了一會，倒居然有點平穩了。但他接連着便覺得很異樣：遇到了平生沒有遇過的事：不像會有的事，然而的確出現了。他越想越奇了，又感到一件異樣的事：這屋子忽然太靜了。

這種心理描寫，便不是舊小說筆法所能勝任了。又像「藥」：

「這給誰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聽得有人問他，但他並不答應，他的精神，現在只在一個包上，彷彿抱着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將這包裏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裏，收穫許多幸福。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後面也照見了字街頭破匾上「古口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又像祝福寫林祥嫂被人輕蔑她是失節婦人，並說她死後閻羅大王要將她身體鑿開分給兩個丈夫，她的神經受了極強烈的刺激，就想實行「贖罪」的方法，但實行「贖罪」之後大

家仍然把她不潔淨的人看待，於是她就完全陷於失望深淵中了。作者敘述她痛苦情形。

她大約從他們的笑容和聲調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總是瞪着眼睛的不說一句話，後來連頭也不回了。她整日緊閉了嘴唇，頭上帶着大家以為恥辱的記號的那傷痕，默默的跑街，掃地，洗菜，淘米。快夠一年，她才從四孀手裏支取了歷來積存的工錢，換算了十二元應洋，請假到鎮的西頭去。但不到一頓飯的時候，她便回來，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高興似的對四孀說，自己已經在土地廟捐了門檻了。

冬至的祭祖時節，她做得更出力，看四孀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便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

「你放着罷，祥林嫂！」四孀慌忙大聲說。

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地穴游行的小鼠；否則跌坐着，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至至於常常忘

却去淘米。

這種筆法也不是舊小說所能有的。現在新文藝頗知注意歐化，遣辭造句漸趨複雜，敘述層次漸深，一變舊小說單調和平面鋪張之習，這原是很可喜的現象。不過弊端也不少，那些呆板的歐化文字恨不得將『我說』改爲『說我』、『三朵紅玫瑰花』寫作『三朵紅的玫瑰花們』固無論矣，而不問其人，不問其地一例打着洋腔，也未免好笑。文學屬於文化之一體，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是應該的，失去了民族性則問題便可研究。日本文學在明治維新時代極力模仿西洋，亦步亦趨，尺寸惟恐或失，現在却已能卓然自立，表現『純日本的』精神了。中國文學比日本落後三四十年，現在正走在『模仿』的階段上。我們原也不必過於求全責備。但許多作家錯把手段當做目的，老在歐化裏打圈子，不肯出來，那便很可惋惜。魯迅文字與這些人相比，後者好像一個故意染黃頭髮塗白皮膚的矯揉造作的『假洋鬼子』，前者却是一個受過西洋教育而又不失其華夏靈魂的現代中國人。中國將來的新文學似乎僅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文學國語化，實行胡適『國語的文學』教訓。第二條路創造一種適合全國人民誦讀的『標準白話』，能走第一條路固好，否則便走第二條。這種『標準白話』要不蹈襲前人窠臼，不抄襲歐化皮毛，充分表現民族性。像魯迅這類文字以舊式小說質樸有力的文體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變化，我覺得很合理的標準。

最後，我們應當知道魯迅是中國最早的鄉土文藝家。而且是最成功的鄉土文藝家。他的弟弟周作人一生以提倡鄉土文藝爲職志，隨筆中屢有發揮。魯迅的『吶喊』和『徬徨』十分之六七爲他本鄉紹興的故事。其他則無非魯鎮未莊、咸順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則無非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單四嫂子，王九媽，七斤，七斤嫂魯八一嫂，閩士，豆腐西施，阿Q，趙太爺，祥林嫂；其事則無非單四嫂子死了兒子而悲傷，華老栓買人血饅頭替兒子治病，孔乙己偷書而被打斷腿，七斤家族聞宣統復辟而惹起一場辮子風波，閩士以生活壓迫而變成麻木呆鈍，豆腐西施趁火打劫……而已。他使這些頭腦簡單的鄉下人或世故沈深的土劣，像活動影片似的在我們面前行動着；他把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愚蠢或奸詐的談吐；可笑或可恨的舉動，惟妙惟肖地刻劃着。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謂『傳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顛』了。自從他創造了這一派文學以後，表現『地方色彩』(Local color)變成新文學界口頭禪，鄉土文學家也彬彬輩出，至今尙成爲文壇一派勢力。

魯迅記述鄉民談話，並不用紹興土白，這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胡適常惜『阿Q正傳』沒有用紹興土白寫，以爲若如此則當更出色。許多人都以這話爲然，我則不得不略持異議。要知道文學應具『普遍性』應使多數讀者感到興趣和滿足，不能以一鄉一土爲限。鄉土文學範圍本爲隘狹，用土白則範圍更小。這類文藝本土人讀之固可以感到三倍的興趣和滿足，

外鄉人便將瞠目而不知所謂，豈不失了文學的大部分功用？法國文學家都德生於法國南部，所作，「磨房書牘」多外省 (La Provence) 風土色彩。這在法國幾於家絃戶誦，而譯到中國來趣味竟大減。又如都德的 *Tartarin de Tarascon* 寫南部某鄉紳故事，突梯滑稽，法人讀之莫不笑不可仰，而我們讀到中譯時也覺得味如嚼蠟。雖說譯書人傳神達意的手段有點問題，其實也因爲鄉土文學本不易翻譯，不能怪他們。幸而都德這兩本書還沒有用法國南部鄉土白，我們雖不能感覺多少興趣，意思還勉強可懂，如其他用的是所謂『*Patois*』那就不但無味，連翻譯也不可能了。這可見「阿Q正傳」不用紹興土白，正是魯迅的特識。

關於這位作家的思想，我願意保留到『論魯迅雜感文』裏再說。現在只能就此收束，免得野馬跑出題目範圍以外去。

魯迅·一個頌讚

英 H. E. Shapick 作

在革命和試驗的時期中，談到任何一個文人的功績，你不會遇到兩個人有一致的意見的。這是我過去數年間在中國得來的經驗。魯迅却是例外。我從沒有遇到一個中國讀者不給他。在文壇上一個重要的地位，縱然有時不是第一把交椅。拋開純文學的領域不說，我又覺得他是普遍地被譽爲人羣中的偉大領袖。魯迅之死我確信中國學生以及其他的人們會體驗到和我們學生時代所體驗過一樣情緒，當我們失掉了那爲我們表達出至高的社會和政治理想的偉大比萊期伯爵的時候。而他本人便是一個教師和領袖的理想人物呀。

魯迅是那一種人物呢？他的作品所表現的又是那幾種特質呢？由於學識的不足，我的回答當然是輪廓的，不適切的，甚至或者不正確的。但是以一個外國人說出他對於初讀魯迅文章的印象，則許是讀者們所樂聞的。我先說一說那最真具體的東西吧——即是說到從他最近出版的雜文集中所見到的他的肖像。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完美的誠懇的人才具備的。前額之下，

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鬱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鬚鬚却好像把他的仁慈掩蓋過去。

這些特質同樣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里。第一我想到他的誠懇的毅力。從他覺得喚醒中國的魂較醫治病人來得急切，因而決定捨棄醫學而從事文學生涯的時候起，直至他善終了時止，他終生一刻亦不躊躇的爲解脫中國人民物質的和精神的鎖鍊而作戰着。在他第一篇故事「狂人日記」中，他的文體和方針似已完全奠定了。自那然是一篇對於狂人心理的深刻的描寫，讀後即使人生恐怖之感；但牠更是一種喝血的社會的反映。在行文間我看到一幅人吃人的世界的 *Swiffan* 圖畫，其中有一狂人洞悉底細，因而向他的同胞呼號，要他們洗心革面。這篇作品在世界大戰的前夕寫就，在一個外國讀者看來，特別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魯迅的寫作才力充分表現於他的傑作「阿Q正傳」中。文雖短，而其深刻，完整，藝術手腕的成熟，感人之深却不亞於長篇小說或戲劇。爲什麼他要寫這篇呢？那是和先知者的吶喊把舉目無親的窮鄉下佬的苦痛赤裸裸地呈露出來。並不是說阿Q是一個被虐害的聖者——魯迅不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嫡派；阿Q十足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除非你對白癡的人有所偏愛。他無知，自私，懦弱，蠻橫，容貌望而生厭。他常遭人奚落。卽如他從城裏歸回未莊那一

場凱旋亦是一樁橫禍，他是呆得有趣然而又是一個苦命人。最後他被屠殺了，倒下去像一隻羔羊一樣。在文學中，我所知道的，再沒有像這種給人拉進沒有車蓬的大車上遊街示衆，直至看到刑場，才發覺他命運之所在的變故更令人心碎的了。而且那祇是槍決了事——不是砍頭呢！阿Q的解脫在于他的夢想——從那能恢復他被未莊的閒人們所侮辱的驕傲的白晝夢，以至那能使他自命爲革命者的醉漢夢，魯迅給我們把活生生的農村生活的現實顯示出來，而且顯示出像阿Q一樣的東西亦有星星的希望和天生的不滿。他不亟亟于激動我們的情緒，却保留着一種通篇不變的幽默。但當我們讀完了這故事以後，我們會感覺到中間每一句子都是用血和淚寫成的。

說完了魯迅的悲憤的誠懇，和因而產生了的透澈的人生批評，其次而且相反地，我要提及他的仁慈和他對他的同胞的同情。阿Q雖可厭，他仍然愛他。在『故鄉』一文中，他回到老家了，那里他遇見一個窮鄉下佬閨士，他童年的伴侶。這人畏縮不前，對他帶來的賤價的禮物黃豆深致歉意，在富人的門庭中他不敢坐下，除了稱呼他的老伴侶做「老爺……」外，也不敢多置一語。隨後自然是作者對於階級觀念的恐怖情緒，這觀念把人們劃分出來：『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當閨士離開了，他的母親給他縷述了好些把他的老友迫得走頭無路的接二連三的苦厄：『多子

，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

在最近一篇短文里，魯迅敘述他如何在一個寒夜，當他要到一家電影院去時，爲賑濟水災捐款的事給一位女孩子攔住去路。他說他沒有零錢，那女孩有點失望了。因此，雖則他懷疑捐款到底會否經官老爺的手分配給災民，但他仍帶着這女孩到戲院找換零錢去，給了她一塊錢。

在同篇里，他提出一個問題，卽：假使他那年高八十的老母問他究竟天堂是否真的存在，那時他將怎樣應付。他毫不躊躇地會給以正面的答覆。這種明晰的現代眼光與傳統的信仰的衝突似乎大大地把魯迅的心困惱着，而這也是他的徬徨之所由來。在他那取名「祝福」的文集中，第一篇故事裏，我們就有着一個悲慘的例子。一個被人擯棄的窮苦的親戚林祥嫂問一個年青的城市人說，人死後是否靈魂不滅，有否地獄這回事，這人毫無邊際的回答道：『也許有罷……說不清』，於是她回家死了，大既是自盡吧！我的感覺是：雖然他有堅強的意志，要勇敢而暴力地掃除一切空虛和虛偽，一切阻礙民族復興的惡勢力，而在那推動這意志的後面的他的對於人類的深愛，却又使他極力避免在這過程中帶來的痛苦。

讀魯迅的文章，另有一個印象，卽是他對故鄉的眷戀。描寫農村社會，自然要寫他歸回老家，但我感到每當他一臨近故鄉的時候，文章里就帶有一種新鮮而親切的韻調，一種詩人

的憂鬱，使他的文章更易於閱讀。這種情境，使我想起李白的詩：『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他有三篇文章都是以農村生活做背景的：『祝福』，『故鄉』，『在酒樓上』。在第一篇里，一方面寫一幅逼真的新年家園紋樂圖，另一方面也寫出林祥嫂的慘遇下面的那種不能掩飾的殘酷。『故鄉』文里，作者拍買家私，帶慈母北遷，這已是他最後訪臨故地的一次了。一種深的哀愁籠罩全文，使人感到作者是把他的心滯留在家屋的雜草叢生的瓦頂上，滯留在那兒時友伴而今是受磨折的農夫中間。『在酒樓上』文里，天空同樣地灰暗，他的老友呂緯甫所敘述的不得意的生平也同樣的悲慘。由茶樹的艷麗，『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和兩位老友所共傾飲的四斤紹酒的雅興把灰暗的氛圍驅散了。

這就算我對於魯迅的印象：戰鬥員，人類的愛護者，詩人，中國的革命英雄。

魯迅死了，人們很容易感到沮喪，和杞憂到別的偉大領袖的損失。我們從他的遺囑中得到回答『忘記我，管自己生活』。這些話不僅可以當作他對家屬的囑語，且也可當作對於全國的遺言。我們雖不能太拘泥于他的囑咐，但我們應該撇下我們的悲傷和哀觀，在繼續他未竟之事業中，從工作裏尋找安慰和解救，像他一樣的。

（龍暉南譯）

初次見魯迅先生

馬 珏

我從前不愛看小說，有時跟同學在一塊，他們老看 我呆着，也太沒意思，所以就就拿一本看看；看看，倒也看慣了，就時常的看。

在所看的這些小說裏，最愛看的，就是魯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裏面，有許多都是跟小孩說話一樣，很痛快，一點也不客氣；不是像別人，說一句話，還要想半天，說的好不好，對得起人或者對不起人，魯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筆墨來痛罵你一場，所以看了很舒服，雖然他的作品裏面有許多的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

但是魯迅這人，我是沒有看見過的，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在我想來，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愛同小孩在一起的。不過我又聽說他是老頭兒，很大年紀的。愛漂亮嗎？大概許愛漂亮，穿西服罷。一定拿着stick，走起來，捧頭一戳一戳的。分頭罷？却不一定；但是要穿西服，當然是分頭了。我想他一定是這麼一個人，不會錯的，雖然他也到我們家來過好幾次，可是我都沒有看見他。

有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聽見父親書房裏有人說話似的，我問趙增道：「書房有什麼客？」周先生來了一會了。」我很疑惑的問道：「周先生，那個周先生？」「我也說不清楚！」我從玻璃窗外一看，只見一個瘦瘦的人，臉也不漂亮，不是分頭，也不是平頭。我也不管是什麼客人，見見也不妨，於是我就進去了。

見了，就行了一個禮，父親在旁邊說：「這就是你平常說的魯迅先生。」這時魯迅先生也點了點頭，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又老又呆板，並不同小孩一樣，我覺得很奇怪。魯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這麼一個不愛收拾的人！他手裏老拿着烟捲，好像腦筋裏時時刻刻在那兒想什麼似的。

我呆了一會，就出來了；父親叫我拿點兒點心來，我就拿碟子裝了兩盤拿了去，又在那兒呆着。我心裏不住的想，總不以他是魯迅，因為腦筋已經存了魯迅是一個小孩似的老頭兒，現在看了他竟是一個老頭似的老頭兒，所以不很相信。這時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只看着他喫東西，看來牙也是不受什麼使換的，嚼起來是很費力的。

後來看得不耐煩了，就想出去，因為一個人立着太沒意思；但是剛要走，魯迅先生忽然問道：「你要看什麼書嗎？桃色的雲你看過沒有？這本書還不錯！」我搖了搖頭，很輕的說了一句「沒有。」他說「現在在外面不多了，恐怕沒處買，我那兒還有一本，你要，可以拿

來。」我也沒響。這麼一來，又等了半天站，因為不好就走開。但是我呆着沒話說，總是沒有意思，就悄悄走出來了。看見衣架上掛了一頂氈帽，灰色的，那帶子上有一絲一絲的，因為掛得高，看了不知是什麼，勾一勾起腳來一看，原來是破的一絲一絲的。

自鳴鐘打了五點了，魯迅先生還沒有走的信息。我就只等着送，因為父親曾對我說過，我見過的客，送時總要跟在父親後頭送的，所以老等着，不敢走開。

噹！噹！……打了六下了，還是不走，不走到沒什麼關係，叫我這麼呆等着，可真有點麻煩。玩去，管他呢，不送也不要緊的！不行呀，等客走了，又該說我了，等着罷！

「老爺，車雇好了，」趙增進來說。我父親應了一聲，這時聽見椅子響，皮鞋響，知道是要走了，於是我就到院子裏來候着。一會兒，果然出來了，父親對我說：「送送魯迅先生呀！」魯迅又問我父親說：「他在孔德幾年級？」我父親答了，他拿着烟捲點了點頭。我在後頭跟着送，看見魯迅先生的破皮鞋格格的響着，一會回過頭來說，「那本書，有空叫人給你拿來呀！」我應了一聲，好像不好意思似的。一會送到大門口了，雙方點了一點頭，就走了。我轉回頭來暗暗的想：「魯迅先生就是這麼一個樣兒的人呵！」

（一九二六年三月，孔德學校旬刊所載。）

訪魯迅先生

曙天

——斷片的回憶——

孫老頭兒是一個很有趣味的人，我和S哥都喜歡同他玩。

人們都說孫老頭兒是日本人，因為他是一個矮子，而且，臉上養了東洋式的鬍鬚。當他在戲園裏看戲的時候，茶房們對他囉囉，他置之不答，於是茶房們便說，「呵，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

真的，孫老頭兒活像個日本人！

S哥是很好喫的，我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喫精」。他最喜歡上館子。

然而孫老頭兒的好喫，大約不亞於S哥罷，因為S哥要上館，孫老頭兒總是贊成的。那天，是深秋的一個正午，他們倆兒又要上館去了，我也只好同去。

大家都喫飽了以後，便照例要想玩了。

「到那裏玩去？」S哥問。

「訪魯迅先生去！」孫老頭兒說。

「好的！」我贊成地說。

我的腦中開始想像我理想中的魯迅先生了。我讀過他的吶喊，而且讀過不止一次。我想像中的魯迅先生大約是很沉悶而勇猛的罷。我覺得吶喊的味是辣而苦的，然而我不知道爲了什麼總愛讀他。

在一個很僻靜的胡同裏我們到了魯迅先生之居了。我們敲門，便有人來開，孫老頭兒先進去報告了，我和S哥站在院裏；院裏有一棵棗樹，是落了葉子的。

房門開了，出來一個比孫老頭兒更老的老年人，然而大約也不過五十歲左右罷，黃瘦臉龐，短鬍子，然而舉止很有神，我知道這就是魯迅先生。

我們都走進魯迅先生的臥房了。

這是一間並不寬大的臥房，房門的右邊，擺了一個書架，然而書架上的書籍並不多。接着是一個桌子，這就是吶喊的作者的著書桌罷。桌的旁邊接着擺了一隻箱子。箱子上也雜亂地堆了些書籍，臥牀是靠着房的後牆的，這是很簡單的臥牀罷，因爲是用兩隻板凳和木板搭成的。

我和S哥坐在房的左邊的椅子上，孫老頭兒坐在牀上。

我開始知道魯迅先生是愛說笑話了，我訪過魯迅先生的令弟啓明先生，啓明先生也是愛說笑話的。然而魯迅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並不笑，啓明先生說笑話時他自己也笑，這是他們哥兒倆說笑話的分別。

魯迅先生端出一匣餅干來了。

「剛纔喫過飯。」我說。

「喫過飯便不能喫餅干麼？」魯迅先生說。然而孫老頭兒與S哥已經開始大嚼了。

因為知道我是喜歡繪畫的緣故，魯迅先生找出一冊冊的德國名畫來。

我不懂德文，所以只能看畫。

然而畫上有蛇，我怕蛇，連畫上的蛇也怕看。

「繪畫的人是不能怕蛇的！」魯迅先生說。

我羞慚而微笑了。

魯迅先生對於歐洲名畫大約看得很多的。他說繪畫的Design很要緊。然而中國的繪畫者大都對於Design不下工夫！

大家亂七八糟的談了半天。我只深刻地記得魯迅先生的話很多令人發笑的。然而魯迅先生並不笑。可惜我不能將魯迅先生的笑話寫了出來。愛聽笑話的人，最好親自到魯迅先生那

裏去聽。

(一九二五年一月，京報副刊所載。)

一 面

阿 累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着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里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里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幌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憊得像一團棉花了。

店里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檯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彷彿帶着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裏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里咬着一枝煙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番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

一會，覺得沒有什麼合適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烟似地被秋風扭着捲着，不分方向地亂飛。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樣，冷氣從袴管里向上鑽。忽然，在架上我看見橫排着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不知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着「魯迅譯」三個字，我便像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麼古怪地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結實而矮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板走了過來。

「Sensei，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板，我總是帶着敬愛和感激，叫sensei（老師）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里「*ua, da,*」著，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着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黃卡機布的工人制服，嵌着「*Conductor* × × ×」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着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塊多錢，那

是我合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着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里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里，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繳班回來，帶着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着看這麼幾十頁，該多好！我摩索着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板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着回頭對里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里帶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抖地直豎着。鬚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着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着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把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

他是誰？對這樣一個流氓樣的工人（我知道我那時的那副樣子很像流氓）下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把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驚異地望着他：黃里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着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式的鬚鬚。左手里捏着一枝黃色烟嘴，安烟的一頭已經燻黑了——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里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牠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着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着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里（公司爲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沒縫」）掏出那塊帶着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攆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到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着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放肆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放肆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損失也是難于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己，寫下了上面的話。

致志摩

陳 源

志摩：

前面幾封信裏說起了幾次周豈明先生的令兄：魯迅 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先生的名字。這裏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實，我把他們一口氣說了，真有些冤曲了我們的豈明先生。他與他的令兄比較起來，真是小巫遇見了大巫。有人說，他們兄弟倆都有他們貴鄉紹興的刑名師爺的脾氣。這話，豈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認。不過，我們得分別，一位是沒有做過官的刑名師爺，一位是做了十幾年官的刑名師爺。

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說了這兩句話，能不拿些證據來。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却沒有。只好隨便舉一個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證據，要是你要看的話。

遠一些的一個例。他說我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實

在呢，我同楊女士非但不是親戚，簡直就完全不認識。直到前年在女師大代課的時候，才在開會的時候見過她五六面。從去年二月起我就沒有去代課。我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也就沒有在任何地方碰到過楊女士。

近一些的一個例。我在現代評論增刊裏汎論圖書的重要。我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裏，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增刊六三頁）魯迅先生在前一兩星期的話裏就輕輕的代我改爲「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

再舉一個與我無關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們相識人中一個最純粹的學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國立京師圖書館聘他爲副館長。他因爲也許可以在北京弄出一個比較完美的科學圖書館來，也就答應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雖然許多教授兼二三個以至五六個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長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內不支薪。他現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課。他的副館長的月薪不過二百五十元。你想想，有幾個肯這樣幹。然而魯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說他是「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舉例了。不過你要知道，就是這位魯迅先生，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領」。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賭。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爲「文士」嗎？魯迅先生爲了那名字幾乎笑掉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捏造事實」，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罷休。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鏗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

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後記裏，說起不願譯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說「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却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時常有，幾多醜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你看這才不愧爲「青年叛徒的領袖」！他那種一見官僚便回頭欲嘔的神情，活現在紙上。可是啊，可是他現任教育部的僉事。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至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怎麼有人在那裏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爲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惡心吧了。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志摩，你看，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這才是

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中國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才是中國的「土匪」……我不得不也來慶祝中國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為我又生氣了。我不過覺得魯迅先生是我們中間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吧了。可惜我只見過他一次，不能代他畫一幅文字的像——這也是一種無聊的妄想吧了，不要以為我自信能畫得出這樣心理繁複的人物來。

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裏林玉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着嘴立在泥潭中，後面立着一羣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語麼？可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今天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寫了，不寫了。無聊的話也說夠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經夠支持人家半年的攻擊了。我現在也要說幾句正經話了。

常常有人來問我，人家天天攻擊我，他們不懂為什麼。人家為什麼攻擊，我也十分明瞭為什麼。可是我為什麼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國人私人相罵，誰的聲音高就是誰的理由足。所以我寧可受些委曲，不願意也不能與人相罵。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誰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寧可吃些虧，不願意也不能與人家打官司。第一，我們不會捏造無中生有的事。第二，我們不想起那樣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閒功夫，好在衙門裏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們不做事便沒有飯吃。第四，人家能造種種的假名，看來好像人多勢衆，就是你所謂朋友也可用了假名來放兩枝冷箭，我們却做不出這樣的勾當。第五，他們的嘍囉也實在多，我們雖然不是不認識人，可是他們既然對我們有幾分信任，我們總不肯亦不忍鼓勵他們去做這種無聊事情。第六，他們有的是歡迎謾罵的報紙，我們覺得自己辦的一個報紙如只能謾罵，還不如沒有。

可是，志摩，還有一個頂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說的「漆黑一團」很容易把你圍進去。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裏面的目的地。泥潭裏有的是已經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淺處，有的已經沒到了口鼻。他們在號着，叫着，笑着，罵着。你要是忍不住他們的誣辱，一停足，一回頭，也許就會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們一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時你再不設法拔你的腳出來，你也許會陷，陷，陷。直到沒頭沒頂才完畢。這就是我向不愛與人較量的理由。我覺得我們的才具雖小，我們的學問雖淺薄，究竟也有它們的適當

的用處。燧火雖然沒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爲有了太陽便妄自菲薄。何況還沒有太陽。所以我一向總想兢兢業業的向前走。總想不讓暴戾之氣占據我的心。可是，志摩，這次也危險得很了！這一次我想，我已經踏了兩脚泥！我覺悟了。我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

昨晚因爲寫另一篇文章，睡遲了，今天似乎有些發熱。今天寫了這封信，已經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懇切的指導我。

源十五，一，二八。

（一九二六年一月、晨報副刊所載。）

魯迅先生

上

張定璜

朋友們時常談到寂寞，在像這樣的冬夜裏我也是深感寂寞的一人。我們常覺得缺少什麼似的，常感到一種未曾填滿的空虛。我們也許是在心胸裏描寫着華麗的舞臺，美妙的音樂或新鮮的戲劇罷，眼前向我們躺着的呢，只是一條冰凍的道路；雖然路旁未必沒有幾株裸樹，幾個叫化子，幾堆垃圾或混着黃灰的殘雪，然而殼荒涼的了。還好，我們生來並不聰明也

並不祇傻，我們有寶貴的常識，知道晝夜的循環，四時的交替。我們相信夜總有去的時候，春天終久必定來到。能穀相信便不壞，而況相信常識。不過常識間或也會惱人，譬如說，常識告訴我們這個夜是有盡的，這個冬不是永久的，這固然使得我們樂觀，但常識也告訴我們，夜究竟不及晝的和暖，冬究竟不如春的明媚。枯坐在這個冬夜裏的我們，對於未來假令有一番虔信，對於現在到底逃不掉失望。於是我們所可聊以自慰的便是作夢。我們夢到明日的花園，夢到理想的仙鄉，夢到許多好看好聽好喫好穿的東西；有的夢到不老的少年，有的夢到長春的美女，有的夢到純真的友誼；有的夢到不知道嫉妬的戀愛，有的夢到嶄新的藝術的宮。作夢也是人們在這地上享受得到的有限的幸福之一；也有許多人是不能作夢的，多可憐！不過就令你能作夢，夢也有醒的時候，那時你擦擦眼睛，看看周圍。那時寂寞又從新爬到你心上來。

不過仔細想時，寂寞于我們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壞處也未可知。至少他總比喧噪強一點。華麗的舞臺和美妙的音樂和新鮮的戲劇固然是你心願的。但與其鑑賞那些三不像的紅紅綠綠中西雜騰的樓房，聽那些拉外國調兒的胡琴，或看那些男扮女裝忸怩作態的名角，一方面手巾把子在你頭上亂飛，瓜子花生的殼吐着滿地，叫好聲呵欠聲啞聲啞聲接二連三的不絕，烟氣汗腥氣脂粉氣土氣湊和成一股臭氣，與其如此，你寧肯一個人關在家裏守着你的寂

寞。在那裏你不着什麼，在這裏你至少是你自己。我知道兩種人。一種是甘居寂寞的人，在他們裏面，寂寞已經失掉了我們普通所謂寂寞的意味。在我們以爲是一塊沙漠的，在他們完全是一個世界，而且是多麼豐富的一個世界！那裏面有天國，有樂園，有全能的神，有姣好的仙女，有永久的真和善和美。比起那個來，我們現在住的只是一堆糞土，一個肉屍，早晚得化散的東西。住在那裏面的人已經不知道了什麼是寂寞，因爲他們已經知道了什麼是不寂寞。幸福的靈魂，世上幸而有你們這點兒點綴，不然，恐怕更沒趣的多了。還有一種人，他們不甘寂寞然而捨不了寂寞。他們呪罵人生而又眷戀人生，也許正是因爲他們眷戀的太深了，所以不能免于呪罵罷。他們不能屏棄濁酒不喝，然而喝時他們總嚙着：「爲什麼不給我上好的花雕？」他們覺得他們的母親年老，頭髮掉了，門牙落了，鼻涕口沫露出來了，衣服穿的不整齊乾淨了，所以每逢到親朋來往時的前後，他們總得發一頓牢騷，吐幾口氣，然而其實他們的真心愛他們的母親也許在一般所謂孝子之上。他們天天早晨起來不是抱怨風起的不好，就是嫌雨下的太少了，但到夜裏，他們依舊睡到各人自以爲世界上頂不舒服的一張床上去。他們是真正的母地的兒女。你們可別以爲他們絕對不知道快樂。他們也有和前一種人一樣的快樂，他們也能作夢。剛纔我說過人們不是盡能作夢的，也許說的誇張了一點，因爲我聽人說，大抵的A一生世裏夜間睡在床上時總能作幾個夢。不過白晝作夢或雖非白晝

而張着眼睛作夢，這可真少了。我們不鄙視夜間的夢，因為他往往是很美麗很有趣的，我們不過想說白晝的夢或非白晝而張着眼睛作的夢往往更美麗更有趣罷了。這樣的夢只有兩種人能作，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或不甘于寂寞而偏捨不掉寂寞的能作。這樣的夢是寂寞的寧馨兒。

魯迅先生告訴我們，他「青年時候也曾經作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並不以為可惜……但又偏苦于不能全忘却，這不能全忘的一部份便成了他的吶喊的來由」。魯迅先生知道夢的可愛，而自己又作了許多可愛的夢，所以說話時免不掉帶一點謙虛，就譬如慈母在客人面前拍拍兒子的頭，罵兩聲「沒出息的東西」；因為捨不得教客人聽見她說「我的寶貝」；魯迅先生不但年青時候作過夢，現在還能作夢，而且我們希望他將來還會多多作夢。他是我們裏面少有一個白晝作夢張眼作夢的人。他小時便是寂寞的伴侶；錯了，他是寂寞撫養大的，我們不須親身跟隨他去「出入于質鋪和藥店裏」，去學海軍，去到日本學醫，我們只須讀一遍他那篇簡潔的自傳體的序文就可以想像出他青年時代處的是怎樣一個境遇。總之魯迅先生飽嘗過寂寞的滋味，雖然他並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他說：「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

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他是不甘寂寞的，因爲這不太像甘于寂寞的人說話。然而逃不掉寂寞。他于是作了許多夢，白晝的夢，張開眼作的夢。這些夢不打緊工夫就織成了狂人日記以下總共十五篇的短篇小說集吶喊。

但諸君有讀過雙柀記絳紗記和焚劍記的麼？無端提起這話來，或有人不以爲然。但我以爲他們值得沒讀過來的人的一讀。小時候讀小說是家庭裏嚴厲禁止的，我雖然偷偷縮縮的讀過一點，然而也就有限的很了。前回我聽見西澄先生說吳趸人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好小說家，我很相信他的話，因爲少讀書的我，近人的東西紅樓夢而外，只忘不了恨海。恨海的記憶至今還是新的，我爲他哭了幾遍。待到黑幕派流行時我也離開中國了。一天我偶然間發見了雙柀記，其次絳紗記，又其次焚劍記，我才想到了，元來中國還有人在那裏作小說。如今看起來，我們所誇耀的「白話的文學和文學的白話」時代以前的東西在形式上也許不惹人愛。不過我歡喜他們的真切，沒閑工夫再去責備他們的不時新。我最感到趣味的是他們的作家寫東西時都牢記着他們的自己，都是爲他們自己而寫東西，所以你讀一篇作品，你同時認出一個人。我知道世上也有Shakespeare，Balzac，曹雪芹——也許沒有這麼一個姓曹的罷，但那是考證家的事——等等能殼造出整個兒的宇宙的人們，我也佩服他們的偉大，但我依舊以爲普通個人所住的一間屋子是不會大到無限的，而那個人關於那牆壁以內一切事物的知識是比

較關於那牆壁以外的更親切而有味的。因此，我覺得「凡是一個人，他至少能寫一個故事」這句話如果有語病，那語病大概不在「能」字而在「少」字。假使個人能寫出許多許多故事來，那應該多麼好，應該要增加多少人間的寶庫！可惜的是事實上我們的大多數終生連一個故事也不寫，那些寫的又大多數是至「多」只能寫一個故事——他們自己的故事——的人。他們未嘗不寫一個以上的故事，但我們要知道那時候，譬如魯迅先生寫不周山的時候，我們的作家已經不在那間坐臥飲食的屋子裏了，已經出外玩游去了。玩游回來，他自然告訴我們一些異地的風光，他鄉的景色，然而我們覺得那總不及他說他自己那個小——你真當作他小麼？——世界裏的事情時，說的親切而有味。美好的故事都是親切而有味的故事，都是作家他自己的故事。雙杵記和另外兩篇是如此，狂人日記到社戲的十四篇也是如此。

這樣說並不是說他們是一個東西。我若把雙杵記和狂人日記擺在一塊兒了，那是因為第一，我覺得前者是親切而有味的一點小東西；第二，這樣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吶喊的地位。雙杵記等載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去多麼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杵記、紗記和焚劍記裏面我們保存着我們最後的舊體的作風，最後的文言小說，最後的才子佳人的勾影，最後的浪漫的情波，最後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我們再讀狂人日記時

，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裏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

下

魯迅先生站在路旁邊，看見我們男男女女在大街上來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羣在那裏蠢動。從我們的眼睛，面貌，舉動上，從我們的全身上，他看出我們的冥頑，卑劣，醜惡和飢餓。飢餓！在他面前經過的有一個不是餓得荒的人麼？任憑你拉着他的手，給他說你正在救國，或正在向民衆去，或正在鼓吹男女平權，或正在提倡人道主義，或正在作這樣作那樣，你就說了半天也白費。他不信你。他至少是不理你，至多，從他那枝小煙捲兒的後面他冷靜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懶得告訴你他是學過醫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樣，胃病。魯迅先生的醫究竟學到了怎樣一個境地，曾經進過解剖室沒有，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他有三個特色，那也是老于手術富于經驗的醫生的特色，第一個，冷靜，第二個，還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你別想去恐嚇他，矇蔽他。不等到你開嘴說話，他的尖銳的眼光已經教你明白了他知道你也許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更清楚。他知道怎麼樣去抹殺那表面的微細的，怎麼樣去檢查那根本的扼要的，你穿的是什麼衣服，擺的是那一種架子，說的是什麼口腔，這些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這個赤裸裸的人

，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雖然你會打扮的漂亮時新的，包扎的緊緊貼貼的，雖然你主張紳士的體面或女性的尊嚴，這樣，用這種大膽的強硬的甚而至于殘忍的態度，他在我們裏面看見趙家的狗，趙貴翁的眼色，看見說「咬你幾口」的女人，看見青面獠牙的笑，看見孔乙己的竊偷，看見老栓買紅饅頭給小栓治病，看見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看見九斤老太，七斤，七斤嫂，六斤等的一家，看見阿Q的鎗斃——一句話，看見一羣在飢餓裏逃生的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老實不客氣的剝脫麼？曾經存在過這樣沉默的旁觀者麼？水滸若教你笑，紅樓夢若教你哭，儒林外史之流若教你打呵欠，我說吶喊便教你哭笑不得，身子不能動彈。平常愛讀美滿的團圓，或驚奇的冒險，或英雄的偉蹟的誰也不會願意讀吶喊。那裏面有的只是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裏在街上遇見的人，你的親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吶喊裏面沒有像電影裏面似的使你焦躁，使你亢奮的光景，因為你的日常生活裏面就沒有那樣光景。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那裏去都遇得見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在這個習見的世界裏，在這些熟識的人們裏，要找出振天動地的事情來是很難的，找來找去不過是孔乙己偷東西給人家打斷了腿，單四嫂子死了兒子，七斤後悔自己的辮子沒有了一類的話罷了，至多也不過是阿Q的鎗斃罷了。然而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裏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魯迅先生並沒有

把這個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告訴我們。他不是那種人。但這個悲哀畢竟在那裏，我們都感覺到。我們無法拒絕他。他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

魯迅先生的吶喊將來在中國文學史上會給他怎樣一個位置，我們無從知道，也毋須知道。時光自然會把這個告訴比我們後來的人。目下我們喜歡知道而且能設知道的大概有兩件事。

第一，魯迅先生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有良心的；那就是說，忠于他的表現的，忠于他自己的藝術家。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決不忘記他對於他自己的誠實。他看見什麼，他描寫什麼。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開給我們，不粉飾，也不遮蓋。那是他最熟識的世界，也是我們最生疎的世界，我們天天過活，自以為耳目聰明。其實多半是聾子兼瞎子，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且不說別的，我們先就不認識我們自己，待到逢見少數的人們，能設認識自己，能設辨認自己所住的世界，並且能設把那世界再現出來的人們，我們才對於從來漠不關心的事物從新感到小孩子的驚奇，我們才明白許多不值一計較的小東西都包含着可怕的複雜的意味，我們才想到人生，命運，死，以及一切的悲哀。魯迅先生便是這些少數人們裏面的一個，他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蘊着中國

的士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他畢竟是中國的兒子，畢竟忘不掉中國，我們若怪他的嫌惡咒罵不好，我們得首先怪我們自己不好，因為他想誇耀想讚美而不得，他才想到了這個打掃廁所的辦法。讓我們別厭煩他的囉嗦，但感謝他的勤勉罷。至于他的諷刺呢，我以為諷刺家和理想家元來是一個東西的表裏兩面。我們不必管諷刺的難受不難受，或對不對，只問諷刺的好不好，就是說美不美。我不敢說魯迅先生的諷刺全是美的，我敢說他的大都是美的。他知道怎樣去用適當的文字傳遞適當的情思，不冗長，不散漫，不過火，有許多人費盡苦心去講求塗刷顏色的，結果不是給我們一塊畫家的調色板，便是一張戲場門前的廣告單。我們覺得他雖奇光怪，再沒什麼。讀吶喊，讀那篇那裏面最可愛的小東西孔乙己，我們看不見調色板上的糊塗和廣告單上的醜陋，我們只感到一個乾淨。吶喊的作風所以產生了許多摹仿大概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單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先生也是新文學的第一個開拓者。事實是在一切意義上他是文學革命後我們所得到的的第一個作家。是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用實力給我們劃了一個新時代，雖然他並沒有高唱文學革命。

關於第二件，用得着說的話不很多。魯迅先生給了我們好些東西，自然也要有好些東西是魯迅先生沒給，因為不能給我們的。在我個人呢，他給了我的已經是發我喜歡了。我們的慾望太大，我們的努力太小。我們往往容易忘記自己的微弱，而責備別人爲什麼不是李杜再

世，什麼沒有「莎翁」和「但老」的偉大。偉大不是會從天空掉下來或地上長出來的東西。也許五十年或百年以後我們的文學史上會另有一個花期，像唐代的或蓋過唐代的花期罷，不過想說這句話先得作一個預言家，而我又不是一个預言家。我只以為偉大的時代或偉大的作品是只有誠實可以產生出來的，但我們現在的時代，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現在的文壇——假使我們真有一個文壇——什麼都齊備了，偏偏缺少誠實。我們的華屋建築在沙上，我們在那上面想創造我們的偉大！魯迅先生不是和我們所理想的偉大一般偉大的作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狹窄。然而他有的正是我們所沒有的，我們所缺少的誠實。我們還說他給少了麼？假使我覺得吶喊的作家沒有十分的情熱，沒有瑰奇的想像，沒有多方面的經驗，我們應該想到，雖然如此，他究竟是自然，是真切，他究竟沒打算給我們備辦些紙扎的美人或溫室裏烘出來的盆景。別的人怎麼看，怎麼感想，他不過問；他只把他所看的所感想的忠實地寫出來，這便是他使我們忘不掉的地方。吶喊裏面有兩篇近于自傳的東西，寫出作家兒時生活的片斷給我們看的，格外引起我們一種親密的感情。一篇是故鄉，另外一篇是社戲，社戲並且是一篇極好的，魯迅先生所不大寫的紀行文。我不愛不問由，因為我不懂他。其餘雖短短的好像不成片段的鴨的喜劇，我也讀得有趣。因為從那裏面我可以知道魯迅先生，可以知道他所看的，所感受的東西。

有人說吶喊的作家的看法帶點病態，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帶點病態，其實實在的人生並不如此。我以為爲這個問題犯不着我們去計較，我記得 Anatole France 說過大致這樣的一個故事，現在聯想他，就把他寫在這裏罷。

一天有一面平鏡在公園裏遇見了一面凸鏡。他說：「我看你真沒出息，把自然表顯成你那種樣子。你准是瘋了罷，不然你就不會給個個人物一個大肚子，一個小頭和一對小腳，把直綫變成曲綫。」

「你才把自然弄得歪東倒西呢，」凸鏡冷酷的回答；「你的平面把樹木們弄直了，就以爲他們真是直的，把你外面的件件東西看作平的和你裏面的一樣。樹幹子們是曲的。這是真話。你不過是一面騙人的鏡子罷了。」

「我誰也不騙，」那個說，「你，老凸，倒把人們東西門弄得怪形怪狀的。」
兩下打架漸漸打得熱鬧起來了，剛好旁邊過來了一位數學家，據說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 d' Alembert。

「我的朋友們，你們倆都對了也都錯了」他對那鏡子們說。「你們倆都依着光學的法則去照東西。你們所容受的人物，兩下都有幾何學的正確。他們兩下都完好的。如果再來一面凹鏡，他必定會現出第三個照像來。和你們的很不同，但一樣是完好的。說到自然她本身呢

，她的真的形相誰也不知道，並且她除開照在鏡子們裏之外或者竟沒什麼形相也未可知。所以我勸先生們別因為彼此對於外物所得的照像不一樣就彼此叫作瘋子罷。」

魯迅先生

曹聚仁

今天上午，接到友人的電話，說魯迅先生去世了，心中頗有點痛楚；二星期前，我在內山書店碰到他，人是那麼瘦削；他說「已經過了危險期，大概不要緊了。」誰知一日間冒點外感，竟以不治，他的身體不好，為日已久；我曾寫信勸他到山水之處休養一些時，他的回信說：

「倘能暫時居鄉，本為夙願；但他鄉不熟悉，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連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輩必以為將買肥田，建大廈，輦盧榮歸矣。萬一被綁票，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矣，豈不冤哉。」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低氣壓之下，這個文壇鬥士受到怎樣一種壓迫和誤解；屢次傳說他要到杭州，青島，日本那些地方去調養身體，終於不成事實；患着很危險的肺病，得在上海展覽

中了結他的殘生，大概和「低氣壓」不無一點關係吧。不過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在最近這一週，還努力於寫作和翻譯；他真以畢生的精力獻給中國文壇，不曾偷懶過一日呢。他有一回來信談到他自己的爲人：「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他之於文壇，實實在在隨時隨手在做有益於人之事。他說他自己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就來吶喊幾聲。他見過辛亥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已經有點懷疑起來，而且失望頹唐得很；但爲了對於熱情者們的同感，他又有提筆的力量，夾雜着設法治療舊社會病根的願望。他的作品，自小說以至雜感小品，無不瀰滿着戰鬥的氣分，和新的戰友同其步伐。我今天翻開抽屜，整理他寫給我的信件（長長短短約有四十多封，）其中有一封論及林語堂先生的，我不妨引來證明他的愛社會的熱情，他說：

「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謁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

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他對朋友忠告着道。「以社會國家的福利爲歸，他之所以能成爲思想界的前驅，並非偶然也。

當我在編濤聲的時候，魯迅先生用羅撫的筆名寄一稿給我。題目是論赴難和逃難，我當時並未留心「羅撫」便是他的筆名。刊出以後，忽有一個讀者來問：「羅撫是不是魯迅的筆名？筆調太相像了。」我們於是仔細研究一下，也推測是魯迅先生的稿子。（後來見面時，他自己對我證實了）。我當時會提出一個小問題，所謂「魯迅的筆調」究竟是怎樣一種筆調？依周作人先生的說法，這種筆調，多用「反語」，（Irony）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造成了 Satire Satire（諷刺者的諷刺）換句話說，即所謂「冷嘲的筆調」。在我們的談論中，我曾取魯迅先生在暨南大學講稿中的一段爲例，那段話是：

「社會太寂寞了，有這樣的人，才覺得有趣些。人類是歡喜看看戲的，文學家自己來做戲給人家看，或是綁出去砍頭，或是在最近牆脚下鎗斃，都可以熱鬧一下子。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圍着去看，他們自己雖然不願意挨打，但看見人挨打，倒覺得頗有趣的。文學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

這便是「反語」的一個例子。（「反語」謂表示某種意見，用其正反對之語，從修辭上說來，是Paradoxi之一種。）說社會要有被殺被囚的文學家才覺得有趣，說文學家自己做戲給人家看是一種熱鬧，說看人家挨打是頗覺有趣，都是用「正反對」之語；這種話，粗看很不合理，細想恰正合乎至理，這是用反語的效果。「諷刺文學」和「政治黑暗」成正比，在言論自由的圈子中，「反語」最用得着；魯迅先生的筆調也可說是時代的產兒。

魯迅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自有很多人說過了。我所要添的蛇足，還是從他的來信中先節取一段來看看：

「我……自己年紀大了，但也曾年青過，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顧前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能不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

也許有人說魯迅先生最落寞，最少合得來的朋友，最愛發脾氣吵嘴；但在另一方面，他正是個能「略小節而取其大」的，富於友情的人呢：我曾經讀他的朝華夕拾，其中有一篇敘述他自己和范愛農的交誼。范愛農晚年落拓，時常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折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聞其語，可以想見這位酩酊的小酒人和魯迅先生是怎樣肝胆相照的。我

想在魯迅先生的幾十年的老朋友的眼中，魯迅先生不會看作最愛發脾氣的人吧。

如今，魯迅先生死去了，懋庸兄說他所擬編的中國文學史沒有編成，是中國學術上的損失，的確，這是大損失。魯迅先生所做的工作已經很多，但他所要做而未做成的工作還很多。很多我依舊引他的一段來信來結我的憶念，他說：

「中國學問，待從新整理者甚少，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朝氣，明則無賴兒郎，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烏煙瘴氣，莫名其妙。其他如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者未有人着手。然而又怎能着手？居今之世。縱使在決堤灌水。飛機擲彈範圍之外，也難得數年糧食，一屋圖書。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作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鈔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

唉，以魯迅先生之努力於文藝工作，而他竟不能有寫作的餘裕，從容來完成中國文學史中國字體變遷史，這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我們對着魯迅先生的遺容，該想起這個問題來吧？

十月十九日

魯迅先生

黃源

十月十九日的清晨，我們還在睡夢中，突然被幾下輕輕的敲門聲驚醒過來，我睜門惺忪的眼睛，一看房間裏的光色，知道時候還很早，再看看牀前的小鐘，也還不得七點。昨夜我們兩點後才睡，今天這樣早就有人來敲過，莫非發生了什麼特別的事故？我有些驚異，於是立刻跳了床，向門邊奔去，一邊問道：

「誰？」

「是我，」門外應了一聲，是聽貫了的女傭的聲音。接着又輕輕地扭了幾下門上的把手。

我旋開了門鎖，半開着門，問：

「什麼事？」

「樓下有人要見先生，說是有要緊事。」

這時雨也驚醒了。下了床，走到門邊來問道：

「是個！怎麼樣的人？」

「沒有見過的。」

我有些猶豫，猜不着來的是誰，有什麼事。

雨隨手把晨衣交給了我，說：

「你下去看看吧。」

我披了衣服，匆匆地跑下樓去。跑到二樓的轉彎處，就見樓梯下站着一個穿藏青色學生裝的青年。他這時聽見了樓梯上的急促的脚步聲，轉過身來迎着我。但因樓梯下光線暗淡，我看不清他的面目。

我一跑到樓下，就把他引進客堂，他的臉孔，好像在什麼地方常見的。但一時想不起那個地方來。那時我也無暇思索，便靠近他身旁，直捷地問道：

「有什麼事？」

他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魯迅先生死了！」

一聽到這句意外的霹靂似的答語，我好像觸到了電，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時失去了一切的感覺，木然站着。

「什麼」。過了一下，我才定了一定神，吐出了這兩個字。他的話我是聽清楚了，而且好像是一把銳利的尖刀，深深地直刺到我的心中。但是我不相信。

「魯迅先生死了！」他依然低着頭，梗咽着悲切地說。

「什麼時候死的？」

「今朝五點多鐘。」

我見他手裏拿一張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我忽然轉到另外一個念頭，問道：

「你是從哪裏來的？」

「內山書店，」接着他催促我說：「汽車在外面等，請你趕快，我們一道走吧。」

「不，你先走，我換了衣服馬上就來。」另一個念頭抓住了我，我猶豫地這樣說。

「好的，我先走，你馬上到他家裏。」

他說着走了，我直奔上樓。雨在房門口等着我，盼我神色異樣，急忙問道：

「什麼事？」

「周先生死了！」

雨聽到這消息驚跳起來，連聲說着「那怎麼行呢？那怎麼行呢？」頰上是簌簌的熱淚，

好像一個突然給母親偷偷地撒下了的孩子似地，急得纏住我問，跟我進了房間。我竭力抑住了從胸底溢湧上來的淚水和哭聲，告訴她：

「我們趕快換衣服走吧，車子打軍那裏轉一轉，我去叫他。」

不到幾分鐘車到了軍的門口，雨留在車裏，我獨自下去，問了一聲傭人，知道他還在睡覺，我便飛奔上樓去，他的房門沒有下鎖，我一推便衝了進去，見他睜着眼睛睡在一個大床上，我便半俯着身說：

「趕快起來，周先生死了！」

又是一個霹靂打擊了另一個青年。

「什麼？」他圓睜的眼睛注視着我，那亂蓬蓬的頭，立時離開了枕頭撐起身來。

「剛才有人來通知我，說周先生死了。」

「你謊我。」

「我怎麼能用這話來慌你，趕快穿衣服，車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二三分鐘以後，我們三個人都已坐車上。車在早晨清寂的馬路上急駛着。軍幾次要嘔吐。我祇能安慰他，說：「我不相信，他不會死的。」心裏也那麼想着，他病了幾月雖然會遭過幾次險境，可是最近顯然在往痊愈的途上走決不會病死的。我們十五號去看他，他的精神不是已經顯得好得多了嗎？昨天我們去北四川路，因為同着別的朋友，沒有到他家裏。在內山書店一轉，老板內山先生和我招呼了一下，並沒有提到魯迅先生的病勢激變。怎麼今天突然會死呢？但也許有什麼意外罷。焦急與憤恨的情感在我胸中翻騰着，車好像走得非常的

慢。

車在弄口停了下來，我們朝他的門口走去。這弄堂在這二年來，我不知走了多少次，每次進這弄堂，想到立刻可以看見他，那怕是心境最惡劣的時候，也會突然變好，而安靜起來，但這時候却有一個可怕的運命在等着我們。軍開着大步在前面走，我載着一顆過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後面。走進了後門，看見廣平女士站在樓梯下，她不等我們開口，就簡單地說了一句：

「在樓上。」

我們往二樓奔去，跑進房門，一眼看見有許多人面對着牀站着，回頭朝牀一看，我們便撲在床前，痛哭起來。

我們的魯迅先生已閉上眼，安謐地躺在床上了！

但這還不能叫我相信。

我們抓住他的手，還是暖生生而柔軟的，他的眼睛閉着，和熟睡着一般。他該還聽到我們的哭聲，怎麼不醒來呢！他自從五月十五日起病直到十月十五日我們最後一次見面，其間他的病雖時重時輕，但他始終不相信自己會死，我們也不相信他會死。尤其是最近，雖則還有熱度，但他的精神顯見得很旺盛。他甚至已去看過幾次電影。雙十節他去上海大戲院看了

改名爲「復仇艷遇」的普式庚原作的杜布洛夫斯基。當晚寫信給我：「今日往上海大戲院觀普式庚之Дубровский（華名「復仇艷遇」，關係檢查官所改）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那幾天我忙着譯文付印，接着軍又從青島回來了沒有去看。軍和他別了兩月，回來後急于要去看他，我便約他十五號同去。

那天我帶着一個小小的高爾基木彫像，是一個新從日本回來的朋友托我轉交的。他拿起彫像，看了一下，回頭對我們愉快的地說：

「雕得不壞，很像。……」

他的愛兒海嬰這時拿了一個剖開了的，軍剛送去上石榴走進房來，廣平女士跟着照顧，他走到書桌的另一端，看到那彫像，就從椅子上爬到書桌上，問道：

「這是爸爸……」

「我哪裏配……」說着他便把小像放在靠近身邊的桌子上。

「你猜是誰？你知道，高……」廣平女士站在桌子旁邊，撫着海嬰說。

「高爾基……高爾基」海嬰伶俐地帶着微笑接着說。

他直坐在藤椅上，仰着頭直望着海嬰，聽見他說對了，便回頭對我們笑着說：

「高爾基已被他認識了。」

那天軍新從北方回來，談了一些北方的情形以及沿途的見聞，軍的聲音較高，他的聲音也跟着提高起來，我怕他吃力，默坐着很少講話。但他又向我提起了普式庚。

「杜布洛夫斯基去看了麼？很好。」他問我。

「又在作宣傳了，」廣平女士笑着說。

「還沒有，預備今晚同軍一道去看，」我說。

「我沒有看過原作，不知他是否完全依據原作。譬如，其中有一場小杜布洛夫斯基叫村子裏的人放火燒死關在他家裏的四個官員，普式庚那時有這種想頭，自然要被殺死了。」

「我有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可惜也沒有看過。」我說。

在歸途上，軍很愉快地對我說：「他好得多了。」我也承認。

那天晚上，電影看得很滿意，回家已快十二點鐘。軍坐了一會走後，我便檢出那本杜布洛夫斯基的英譯本來，躺在床上看。一看便不肯放手，這影片也許是爲紀念普式庚百年忌而攝的，所以與美國編攝的電影不同，完全保持着原作的本來面目，劇情和原書簡直毫無出入，而看了原書更覺得這影片好了，因此一直看到三點鐘才睡覺。第二天一醒來再看，看完了才知道祇有結尾稍稍不同。我預備下次見面時把這點告訴他，但是現在却遲了……

魯迅先生平沒有什麼嗜好，唯一的娛樂因恐怕就要算難得出去看一二次影片和坐在內山

書店裏「漫談」吧。但是這半年來，因了病，不能出門，連這點權利都給剝奪了。而他的熱情依然橫溢着，他不甘寂寞，他不能無所事事地終日終夜躺着。記得大概是六月初三。他的病還很重，我怕驚擾他，不也上樓去看他，僅在客堂裏向廣平女士問病情。那天恰巧是星期六，過一下建人先生一來了，他先上了樓，於是廣平女士邀我也上樓去。我走在前面，廣平女士陪着。我不進房門，他從籐椅直坐起來，看見是我，立刻沉下臉對廣平女士說：

「是你阻止着立讓他上樓吧。我早就聽見樓下的聲音。」

這時廣平女士很窘，我也很不安，於是我立刻解釋道：

「不，許先生幾次邀我上來，我想還是等一下和三先生一同上來。好了一點吧？」

「這幾天已好了一點，前幾天沒有食慾，什麼東西都無味，不想吃，祇爲了想維持精神，勉強吃喝一點。那時真的對什麼都不感覺興趣，一沒有精力，什麼都完了，這幾天好一點，躺着胡思亂想，又想寫文章可惜……」他自己覺着病輕了一點，愉快地說。

「不過現在也祇能好好兒養病，把病養好了再說。」我想到他終天躺在藤椅上，不斷地用腦思索，有些發愁。

到晚飯時，廣平女士來叫吃飯，

「你們到底下去吃吧，我在樓上吃。」

每到星期六建人先生從商務印書館出來，便直接到他家裏。建人太太往往帶了孩子先去，每次帶一個，三個孩子漂流着。晚上有一幅豐富的晚餐準備着。我在先生病前，也常常去，有時要是在飯後不久到他家裏，他一定要責問是否「躲避」吃飯。但先生平日自奉甚儉，祇備幾樣菜蔬，一有客來，必須另外叫菜。去年夏天雨去日本後，知道我每天在館子裏零吃，飲食不佳，他就要我每星期六去因此我有時即使有事，能挨到星期六去。這樣習以為常，我差不多每星期六分享着先生家裏一星期間唯一的豐富的晚餐。我甚至在先生處學會了喝酒。但最可懷念和感謝的不僅是這豐盛的食餚，尤其是先生在座時的任意談笑。那晚沒有先生存座，沒有加上那精神上的至上的糧食，雖則依然是同樣豐盛的酒餚，却失去了酒餚中的至味。我們草草吃了，便上樓去看他晚餐。

藤椅前放着一張茶几，凡上的盤中，盛着幾碟小菜，一碗鷄湯，先生直坐在藤椅上，手裏拿着飯碗，但是吃得很少。他怕和大家一起吃時禁不住要談話，以致疲勞；但獨自在樓上吃，又覺得索然無味，飯也吃不下去的樣子。

「吃得很少，」我悽然說道。

「我本來吃得不多，」他好像寬慰着我似地說，但我知道他平時飯雖吃的不多，菜可吃不少的。如今却小小的繼碟小菜還留着大半。

飯後，他依然躺在書桌邊藤椅上，我坐在書桌前，建人先生坐在另一端的書桌邊。他有時吸一支紙烟，喝一點茶，廣平女士拿了水菓來。他也吃一點水菓。他覺得疲勞時就閉着眼睛，靠着藤椅養神。我和建人先生都不敢提出話題，但是他的話却源源而來。廣平女士担心着坐在一旁。我們也担心着既不敢久坐，但又不敢告辭。他在健康時，不過夜半，是不放我們走的。並且我們看見有幾個熟人在他面前，他躺着養神時，不再思索，臉上露出安寧的神色，也感到幾分快慰。

過了九點鐘。我望望建人先生，站起來，低聲說，「我先走吧。」

「我也要走了，」他說時也站起來，望望書桌對面的先生。

他看見我們站起來，說要走了，便又直坐起來，看看藤椅邊桌上的夜明鬧鐘，說：「我不留你們。坐到十點同車去吧。」他的聲音滿貯着深情，我們又坐了下來。

建人先生原先也住在北四川路附近，但這一帶「特殊區域」時常不很安靜，自從去年冬天又有事情發生後，就搬到法租界去了。搬家後等一個星期六到先生家裏我也在，我們談到半夜。臨走時，先生說：「你們都在法租界，可以同車，我不送了。」說着又對廣平女士說，「你送一送罷。」廣平女士陪我們走出大門，外面祇穿一件絨繩背心。這時夜深人靜，外面刮着大風，我們阻止不住她，她獨自在趕前面，趕到附近的汽車公司，付了車錢小賬，笑

着說：「你們同車去吧。」直到我們的車子開出以後，她才被冷風吹着回去。第二個星期六又是一個深夜，臨走時廣平女士拿出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叫我們坐汽車走，說：「對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請你們付一付。」

建人先生推却了一下，先生便低下頭，看着地板，默聲不響了。建人先生於是不得不收下來。自後每次臨走，廣平女士一定拿一塊二角錢塞在建人先生的手裏：

我每在旁邊看着這情景，心中不禁起着陣陣的酸痛。

到六月十五號後，先生的病勢稍輕。那時照過X光，知道是肺病。

有一天我下午去，他把X光的照片拿給我看，並給我們種種的解釋。最後說：「照醫生說，看這照片我在五年前就該死了。而現在却還活着，他便不知如何治法。」

醫生大概每天下午四點多來，到四點鐘他自己先量一次溫度，廣平女士把溫度針交給他時，他每次總對我說：

「靜默三分鐘頭。」也有時說：「你們隨便談談吧。」

我在他房裏，幾次遇見了那位須藤老醫生。有一次他聽聽先生的肺部，又用手指敲敲，說：「現在肺部很好，還可以活十年。那時少爺也大了，你太太也不必過分担心了。」

先生聽了也很高興，立刻翻譯給廣平女士聽。

但是隨着病逐漸好起來，先生愈益不肯「安分」了。醫生常警告他不要多動，提防疲勞，靜靜地躺着。他的答覆是：「我一生沒有養成那樣的習慣，不做事，不看書，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最後他甚至向醫生說，「我請你醫病，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醫生問。

「第一，是要把病醫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動不動一個月可醫好，我寧願動動化兩個月醫好。第三，假如醫不好就想辦法把生命拖延着。」

醫生當然無話可說了。

那時天氣漸潮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鎌倉，那裏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糾纏。後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着兩本「長崎旅行案内」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裏的人）當翻譯了。」他說。

「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裏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麼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着，想到他的住所太簡陋，空氣既不好，一有太陽，就直逼到他的房中。他又不喜歡多移動，他的藤椅放在靠窗口，太陽逼進來，人依然躺在那裏。

「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拒絕了。

他一生幫助青年，指導青年，把全部的精神力獻給青年。他每天分出一二小時的精神力給青年覆信，看稿，有的青年還要他代辦書藉。他平素來往的也都是青年。他爲青年活着，他也活在青年中間。但他從不以青年領袖自居，從不使喚青年。即使是最接近的友人，他也不願把「私事」托付。有人以爲用「捧」用「諂」可以博得先生的歡心，這是對先生的侮辱！

同時也因爲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准他遠行，整個夏天他就在那蒸籠似的房子裏熬着。他患着不治的肺病，他住在不治精神與肉體都不適于他的病體的地方，但是他還工作。愛他的人，看她工作心痛，但誰能阻止他呢？

有一個酷熱的下午，我二三點鐘到他家裏。一進門就看見他坐在客堂的書櫥邊的蓆子口。鋪在地上的蓆子上。他穿了一身短衫褲，顯着骨瘦凌凌的四肢，正彎着腰在摺疊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廣平女士坐在旁邊搶着摺。不久這「版畫選集」就出版了。

他在病中常常講起海上述林，我也常常看見有海上述林的校樣在他的書桌上。他曾對廣平女士說，「這書紀念一個朋友，同時也紀念我自己。」十月八號我去，他把一本皮面精裝的海上述林送我，我們翻着一同看到他看到底頁上有一個總摺，要廣平女士另挑一本。他交給我時，微笑着說：「總算出版了。下卷也已校好。年內可出版。這書不能多送，有熟人托你

買，可打個八折。譯文上能揩油登個廣告麼？」十七日他知道譯文上的廣告已登出來，那天海上述林在內山書店賣去二十冊，他非常高興。

最近在譯文新二卷二期發表的死魂靈第二部第三章，是他在病前就譯好了的，祇是沒有覆看過，因病而攔了下來。魯迅先生幹事最負責，我知道這章譯文一發表，他在病中一定要掛念着以後的譯稿，所以便決心把這已譯成的稿子壓下來。最近他却再三地說：「那章我已看過了。你拿去先發表了吧。」

「慢點發表吧。一發表你又要接下去翻譯，你現在不能工作，而且翻譯要看幾種本子，東看西看，更加吃力。」

「不，翻譯比寫文章不吃力一些。我想一天譯一張稿紙，老是不工作也不好的。」
那末把這章登一半吧，「我盡力抑制着感情，裝得很冷靜地說。

「不，接不下去時再停止吧。」他堅決地說。

後來聽廣平女士說，他在十七日夜裏三點鐘病勢突變，到十八日早晨已無力說話，但他到八九點鐘還問報有沒有來？有沒有廣告？廣平女士告訴他譯文的廣告已登出，有他的死魂靈，登在第一篇，比外還有些什麼文章等等，他聽了還不滿足，說：

「你把報紙同眼鏡拿來！」

他這樣地關心譯文，他最後看的文字，也是譯文的廣告。

但他却在十九日的清晨五時二十五分，悄悄地與我們不別而逝了！

但這怎麼能叫我相信呢？我送他的遺體到殯儀館，我在殯儀館陪他三晝夜，我緊跟着他的靈棺到墓地，我扶他的靈棺進墓穴，我眼看着他靈棺慢慢地沉入墓穴中，但我不相信他是死了。他活在我的心中……

最後的一天

景宋

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爲了這個消息着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着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着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

夢後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惡的徵候都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用筆端衝倒一切——還可以看看電影，生活生活。我們戰勝「死神」。在謳歌，在歡愉。生的欣喜佈在每一個友朋的心坎中，每一個惠臨的愛護他的顏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樣。他與我們同在一起奮鬥，向一切惡勢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還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發表。）一文的中段。（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後的工作，他原稿壓在桌

子上，預備稍緩再執筆。）午後他願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樓下，見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時外面正有些風，但他已決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後，是很難勸止的。不過我姑且留難他，我說：「衣裳穿夠了嗎？」他探手摩摩裏面穿了絨線背心。說：「夠了。」我又說：「車錢帶了沒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來天已不早了，隨便談談，傍晚時建人先生也來了。精神甚好，談至十一時，建人先生纔走。

到十二時，我急急整理臥具，催促他，警告他，時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來，看看鐘，已經一時了。二時他曾起來小解，人還好好的。再睡下，三時半，見他坐起來，我也坐起來。細察他呼吸有些異常，似氣喘初發的樣子。後來繼以咳嗽，咳嗽困難，兼之氣喘更加厲害。他告訴我：「兩點起來過就覺睡眠不好，做惡夢。」那時正在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而且這回氣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覺得比前二次厲害。爲了減輕痛苦起見，我把自己購置在家裏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看：說明書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臟性氣喘也可以服。並且說明急病每隔一二時可連服三次，所以三點四十分，我給他服藥一包。至五點四十分，服第三次藥，但病態並不見減輕。

從三時半病勢急變起，他就不能安寢，連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終夜屈曲着身子，雙手抱腿而坐。那種苦狀，我看了難過極了。在精神上雖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體上，是他獨自担受一切的磨難。他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咚咚的聲響，我在旁也聽得十分清澈。那時天正在放亮，我見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脈門，脈跳得太快了，他是曉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點鐘去託內山先生打電話請醫生。我等到六點鐘就匆匆的盥洗起來，六點半左右就預備去。他坐到寫字桌前，要了紙筆，帶起眼鏡預備寫便條。我見他氣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寫了。由我親口託請內山先生好了，他不答應。無論什麼事他都不肯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關頭，他也支撐起來，仍舊執筆。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寫了，其餘的由我口說好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歎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纔湊成了那條子。那最後執筆的可珍貴的遺墨。現時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紀念了。

清晨書店還沒有開門，走到內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來了，匆匆的託了他打電話，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內山先生也親自到來，親手給他藥喫，並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訴內山先生說苦得很，我們聽了都非常難受。

須藤醫生來了，給他注射。那時雙足冰冷，醫生命給他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兩手指甲發紫色大約是血壓變態的緣故。我見醫生很注意他的手指，心想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嚴重了。但仍然坐在寫字桌前椅子上。

後來換到輪椅上坐。八點多鐘日報（十八日）到了。他問我：「報上有什麼事體？」我說：「沒有什麼，祇有譯文的廣告。」我知道他要曉得更多些，我又說：「你的翻譯死魂靈登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我爲什麼提起作家和中流呢？這也是他的脾氣。在往常，晚間撕日曆時，如果有什麼和他有關係的書出版時——但敵人罵他的文章，他倒不急於要看，——他就愛提起：「明天什麼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書出版時一樣的歡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報紙到手，就急急地披覽。如果報紙到得遲些，或者報紙上沒有照預定的登出廣告，那麼，他就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直至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纔放心。

當我告訴他譯文廣告出來了，死魂靈也登出了，別的也連帶知道，我以爲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說：「報紙把我，眼鏡拿來。」我把那有廣告的一張報給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纔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雖然在這樣的苦惱狀況底下，他還記望着別人。這，我沒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這是他最後一次和文字接

觸，也是他最後一次和大眾接觸。那一夥可愛可敬的心呀！讓他埋葬在大家夥的心之深處罷。

在躺椅上仍舊不能靠下來，我拿一張小桌子墊起枕頭給他伏着，還是在那裏喘息。醫生又給他注射，但病狀並不輕減，後來躺到牀上了。

中午喫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裏喘息不止，見了醫生似乎也在訴苦。

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養氣。

六點半鐘我送牛奶給他，他說：「但不要喫。」過了些時，他又問：「是不是牛奶來了？」我說：「來了。」他說：「給我喫一些。」飲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實是喫不下去，不過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纔勉強喫的。到此刻為止，我推測他還是希望好起來。他並不希望輕易放下他的奮鬥力的。

晚飯後，內山先生通知我：（內山先生爲他的病從早上忙至夜裏，一天沒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來。我說：「日裏我問過他，要不要見建人先生，他說不要。所以沒有來。」內山先生說：「還是請他來好。」後來建人先生來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惱，連說話也不方便。看護和我在旁照料，給他揩汗。腿以上不時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兩個熱水袋溫他。每隔兩小時注強心針，另外吸入養氣。

十二點那一次注射後，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他睏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爲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的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擡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陪笑的告訴他病似乎輕鬆了。但他不說什麼又躺下了。也許這時他有什麼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後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做不知道。輕輕的放鬆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後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的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裏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後悔呀，！

從十二至四時，中間飲過三次茶，起來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煩燥有好多次推開棉被，我們怕他受冷，連忙蓋好。他一刻又推開，看護沒法子，大約告訴他心臟十分貧弱，不可亂動，他往後就不大推開了。

五時，喘息看來似乎輕減，然而看護婦不等到六時就又給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時她叫我託人請醫生，那時內山先生的店員終夜在客室守候，（內山先生和他的店員，這回是全體動員，營救魯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囑託他，建人先生也到樓上，看見他已頭

稍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了幾針也不見好轉。

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麽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捲走了。黑暗是那麽大的力量，連戰鬥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他就來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晝呀。而黑夜，那可咀咒的黑夜，我現在天天睜着眼睛瞪它 我將咀咒它直至我的末日來臨。

（十一月五·記於先生死後的二星期又四天。）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

十月十八日午前六點鐘左右，許夫人來了。帶來一封如今已經可悲地成了絕筆的先生的信。

「老闆：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

拜託你，打個電話請須籐先生來。希望快點給我辦！草草頓首

「L 拜十月十八日」

「原來十點鐘的時候，是有一個約會的。」一面看信，一面聽着許夫人的話，我的胸裏感到一種難言的悸動。

時常總是寫得齊齊整整的信，今天，筆却凌亂起來了。我馬上打電話給須藤醫生，請他就來。隨後我就跑到先生家裏去了。那時候，先生坐在台子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煙，但，臉色非常壞，呼吸好像也很困難，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會來。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時常坐在上面的一張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來好像異常困難，我靜靜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許夫人也同樣地在按摩，但一點也不能夠平靜下來。在我的家裏藏有治哮喘的藥，雞蛋油；有一次我曾問過先生吃不₁吃，但先生却說是不必，所以也就沒有吃。可是，今天，我覺得或許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說「不行，先生決不會吃的，」我還是把裝在膠袋（Kapsel）裏面的藥拿了六管來。作爲須藤醫生來到之前的治療，我就問先生吃不₂吃，先生說：「唔，吃吧。」於是，我馬上揭開膝袋的蓋子，拿到先生的嘴邊去，先生就一口氣吃了三個。我很高興，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夠奏效。

我要先生稍爲睡一下：先生却說，一躺下來就很不自在；因此，還是坐在椅子上，有時把身體搖搖，並將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覺得他的確很不自在。我們要他停止吸煙，他終

於呼吸刺的丟了。當我跟許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時候，須藤醫生就來到了。須藤醫生一踏入房門就用那好像些把先生看個透徹的姿勢跑了進來。當我在那完全用家鄉話說着「怎麼攪起的？」的醫生臉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憂色時，我就不得不一個人在心中私自祝禱着。

先生從很困難的呼吸當中，用斷斷續續的話語，說：「從今天四點鐘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請快替我注射。」那時候，醫生已經把注射的手續準備好了，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針。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還是很困難。過了一兩分鐘，先生說：

「怎麼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

醫生雖然說是再過一兩分鐘再說，但也還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準備。并且說，如果一針不見效，就再打一針。已經過了五分鐘了；但先生的呼吸並沒有變化，依然還是很困難；因此，醫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過了一二分鐘左右，先生就說好像稍為好點了。呼吸，也好像顯得比較舒服些了。我和許夫人都不覺地鬆了一口氣，幾乎同時地開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們停止。我們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悶稍為和緩了一點，跟須藤醫生開始講起話來了。這時候，恰好是八時前五分。我因為八點鐘在店裏有個約會

，就拜託了須藤醫生，回到店裏來了。什麼通知也沒有，我以為已經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來客談話。可是，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臟性哮喘。因為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因為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生就親目去接他。這時候，石井醫生偶然地跑來了，把先生今天發病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就走了，說是馬上要去問候一下。

過了一會，須藤和石井兩醫生回來了，說是病很重，今天須得十分注意。不，他們還說好像很危險；但我不能夠對許夫人說這些話，我把看護婦叫了來，吩咐她按照醫生的治療方法，每隔兩個鐘頭注射一次，呼吸困難的時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馬上準備好酸素發生器送去；一面叫藥店準備酸素管；然後就先行用酸素發生器施行吸入。那時候，先生已經睡在床上；酸素的吸入，看起來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於是，先生就說起話來了：

「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我就對他說：最好是靜靜地休養；醫生也說是要讓先生靜靜地休養；所以，請你還是不要想各種事情，好好地休養一下。這當兒，酸素管已經拿來了，就再行準備酸素管的吸入看起來，酸素管的吸入倒很不錯，先生好像能夠安睡了。在這以前，我為顧慮萬一起見，曾

對許夫人說，病勢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電話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來。他馬上就來了。須藤醫生說了一聲大概不妨事，明天再來，就回家去了。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個店員住在先生的家裏。

於是，我也就回到家裏來，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醫學士請來診察。結果，說是病勢很重，還是叫先生的令弟來好；因此，我又叫人打電話請建人先生來。一會兒，建人先生來了，我就把醫生的話告訴他，請他注意。當他跟我在樓下的客堂間談話的時候，許夫人惦念着我，勸我回去休息。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却又沒有把這話說出來的勇氣；祇得繞着灣兒，說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談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說：「先生也很安靜的，還是請你回去吧（請建人先生也在樓上休息。）」我覺得使夫人操心也於心難安，遂於晚間十二時半動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無從預知那竟會變成跟先生的永訣！

回來後，我就把先生的情況告訴那還沒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禱不要有什麼急變，一面就寢了。但我的神經非常興奮，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翻來覆去的苦悶着，祇是祝禱先生能夠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時的鐘聲敲過了。一會兒，我就聽到了老板老板的喊聲。我吃了一驚，跳了起來，把窗子打開。「請你馬上來！并且請你馬上請醫生來！」於

是，我當即叫人去請石井醫生和須藤醫生馬上來診視；然後，我就急跑到先生家裏去。那是午前五時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額還溫暖，手也還溫暖；但呼吸已絕，脈搏也停止了！我用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一隻手按在先生的額上：溫度漸漸地消失下去了。許夫人靠著台子悲泣著，我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語，祇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醫生來了，但已經『沒有法子。』接著，須藤醫生也來了，但也『沒有法子。』不管怎樣地誇耀着文明的醫術也還把它沒有辦法。那就是生命。

我馬上就通知鹿地夫婦及其他的人們：

「嗚呼哀哉！魯迅先生長逝矣！時爲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時廿五分。」

「我的病究竟怎樣了！」這一句話，將永遠不會從我的耳朵裏消失去吧！「人生如朝露，」
「人生如夢，」實在不是虛語啊！

x

x

x

x

x

現在，我打算就記憶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談論之片斷記錄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聽着這十分愉快的漫談，還是最近的事情。

「大極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聽見我這麼說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來。

「老板，如果想要曉得自由人的標本的話，那祇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呢。」

我曾在商務印書館的西書部預定德文書。昨天來了通知，說是預定的書籍已來，可以帶四塊五角錢去領取。我以為那大概是運費，加上書錢，總要五六十元。剛才我就準備了這些錢去領取。夥計把預定的書拿出來了，要我付四塊五角錢。我問他這是什麼錢。他說，這就是書錢。於是，我就對他說：沒有那樣的事情，這書無論如何也要四十多塊錢，請你再細查一番。但他還是說：不，四塊五角就夠了。我又對他說：這的確不對，這是四十馬克的書籍，我想中國錢無論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還是請你查查看。但那位夥計先生却說是：麻煩透了！你可以不必那麼囉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塊五角錢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為必要，才去預定的。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萬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塊五角錢把它拿回來了。商務印書館賺不了錢，乃是當然的事情哩。

跟這相同的事體到處都可以看到。無論在郵政局，在火車上，在輪船公司裏，在商店裏，在旅館裏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處碰到過好幾回。」

「老板，你也曉得的那位愛羅先珂曾經說得好：『日本人很聽從 遵守上頭的人所說的話語，官吏尤其是這樣。所以，是一個最便於施行政治的國度。中國人却恰好相反，對於人家說的話語，首先就加以懷疑。尤其是官吏所說的話，是頗為靠不住的。所以，中國乃是最難於施行政治的國度。』」

我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

例如長官對一個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人（對於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個罪人，祇要被警察署叫去審問過一回，似乎就已經決定他是一個罪人；因此，一個給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這一點，也已經可以完全決定他是一個壞人。）那麼，警察的自我意識就完全不會活動。不，應該說是：他不會使自我意識活動起來去研究那個人。他祇是跟長官所說的一般地把這個人決定為壞人而加以處理。這似乎是在把長官的話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國，則完全相反。雖然長官說這是個罪人，是個極壞的人；但人家決不會相信他的說話。雖然因為是長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當作罪人來處理；但他一定會讓自我意識活動起來；一定有着別的看法。

他一定會有着自己的見解，譬如：這個人爲什麼是個罪人？爲什麼是個極壞的人？這總不像是一個罪人，也不能把他認作一個壞人之類。

這就是日本易於完成其統一，中國却難於統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把母乳給他吃的嗎？」

我說：

「不，也許因地而異；但，據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東西給他吃，然後再讓他吃母乳。」

「啊，原來如此。『五香』是什麼，我可不曉得。但那種習慣却跟我的故鄉（浙江，紹興）的習慣很相像呢。」

在紹興，小孩子生下來，在吃奶以前，要先讓他嘗五種東西。第一是醋，第二是鹽，第三是黃蓮，第四是鈎藤，第五是糖。

是從第一種開始，照次序叫他嘗下去的。醋是酸味，鹽是鹹味，黃蓮是苦味，鈎藤乃是人生的刺（荆棘），即是痛苦；最後才給他嘗嘗人生的甜味。

中國人處理小孩子的順序，從這件事情看來，也就很可以瞭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擺到最後，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處理方法的相異之點吧。」

這是一個普通的習慣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訓的意義。

「老板，你以為胡××不到南京來？」

「我不曉得。政治家的動向，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還沒有想過哩。」

「那末，×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那我們就不能賭輸贏啦。」

這且不去說他，這樣的時候，中國的大眾是很担心的。因為吸飽了血液的臭蟲，肚子已經膨脹着，再也不會吸得很多了，所以，稍為能夠放心。但，新的臭蟲，却還沒有吸血。是個空肚子的傢伙。這空肚子的傢伙一跑出來，那最後的吸血是很厲害的，哈哈……

這是多麼奇妙的譬喻呀！

「老板，在同樣的吸血的傢伙當中，我最討厭蚊蟲。嗡嗡……的噪鬧着，真討厭！臭蟲像這傢伙就頗為可愛。一聲不響地吮吸着，肚子吃脹了就運動也不能夠動地滾來滾去。這些地方，却很有點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當先生臥病了三個多月的很涼快的時候。先生用很大的聲音叫着「老板，」這種過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是病後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試行出來走一走。」

前幾天從南京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特地跑來探問我的。是個從前的學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從南京寄來了一封信。信裏頭說着這樣的話：

「先生的通緝令自從發表以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因為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關係的事情，我是不會幹的；但恐怕做了之後為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

我就問先生：那末，你是怎樣回覆他的呢？

「我因為很寂寞，就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講完了這段話時的眉目的躍動。

「老板，你看了報吧？」

報上載着：×××五十六歲的誕辰，祝賀的錢竟收到十餘萬之多。恐怕沒有人把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議或是發生懷疑的吧？

我覺得很傷心。原來在中國，慶祝壽辰，每十年一回：如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或八十歲……等等；跟這個人一樣地慶祝五十六歲的習慣是沒有的。所以，我想這

個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壽，并且，每一次祝壽，也一定可以收到這麼一筆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誕辰都可以收到十萬塊錢，這真是厲害！

「從前的受賄，都是很祕密的；但，如今，則賄賂似乎大抵都變成公然的了。」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想起先生當時的臉孔之變得非常陰鬱。當我去探問臥病中的先生的時候，先生還對我講過這麼幾句話：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樣還沒有拿來嗎？已經是十月了，他們究竟在幹着什麼事？五月間就約定要打紙版的呀，真是『馬馬虎虎』，沒有辦法。我已經寫信去了。」

我說：「翻譯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於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却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着讀者的死亡的嗎！」但，並沒有回信。」

曾經作過這種嘆息的先生，僅僅看到了上卷，終於還沒有看見下卷的完成就長逝了。這恐怕也是遺憾之一吧。可是，下卷已經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總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個不肯馬虎的人物。跟人家約定了碰頭的時間，一定會準時來到。對方如果遲了半個鐘頭，他就常常會說：馬馬虎虎，真不好辦。

有人曾經把先生祕藏的外國書借去，并且送回來了。可是，多麼暴亂嘍！書頁弄得皺得

不成樣子，美麗的插畫，也通通弄髒了。

看看先生當時的悲苦的臉孔的我，也覺得十分不安。先生并不是在悲嘆書籍的被弄髒，而是無論何時都在悲嘆着那把書弄髒了的人心的污濁。

每當碰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時常爲崇高之感所打動。

「老板，你曉得『黃河之水天上來』嗎？治理黃河的方法并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兩岸的堤防漸漸地加高的。

河床年年爲泥沙堆高，因此兩岸的堤防也漸漸地高了起來。大水一來，高築的堤防在什麼地方一潰決，水就會跟瀑布一般地流下來。

於是，黃河之水就從天上來。

中國實有把這種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從先生嘴裏說出來的許多話語，簡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於我的頭腦很壞，并且人又疏懶，沒有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實在可惜！

「老板，道路這東西，並非從開頭就有着，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經這麼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瞭，他決不妥協。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對者的三重壓迫下面，不屈不撓地戰鬥過來的足跡，我覺得，決不能讓雜草將它覆蔽了的！

讓那足跡變成大道：難道這還不是後來者的責任嗎？

大眾的殯葬

珂雲輯

魯迅先生死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的早晨。從入殮到下葬，種種詳情，備見上海各報，刪繁取要，輯系如次：

魯迅先生患肺結核重症，已有數年。今年三月二日，宿疾復發，繼以氣管枝性喘。據醫生診察結果，係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復接續犯有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性喘息及胸悶等症。月間病狀一度瀕危，先後延須藤醫院院長須藤，福民醫院醫生松井，石井三日醫診治。六月十五日曾由松井爲之照過一次X光，發見他的肺部祇有極小部分是完好的。當時醫生曾說：「這病的患者要是西洋人或日本的，五年前就早死了。」可見他的病根之深。那時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服藥打針，經過相當時期的療養，漸漸的好了起來。其間有人勸他上日本長崎的雲泉去療養，又有他要和友人內山完造同赴日本鎌倉休養之說；但一則爲了他每天還要發熱，不宜經舟車的勞頓，二則怕到了日本，必定有許多新聞記者要來訪問，恐無這許多精神去對付；至于中國內地又不便去。故易地療養之說終未實行。後自十月初起，病體漸見進步，健康大部均見恢復。和平常一樣，看書和寫作；餘暇時，

亦出去找朋友談天。雙十節那天，他曾到老靶子路上海大戲院去看了一次影戲，那天開映的片子是普布金原著改編的「復仇黠遇」。

十八日嘗執筆寫『關於章太炎二三事』一文，但未寫完。十七日午後三時許，他到虹口公園一帶去散步。因為秋風很緊，就到內山書店去和二三友人閒談。半時許告辭回家，在門外遇着一陣冷風，着了寒。四點半回到寓所，晚飯時胃口就覺得異樣。飯後只因散步過度，當晚就失眠，輾轉不能入睡。直至十八日晨一時，稍能入睡。至四時許，寒熱交作，繼之過身感覺酸痛，並且喘息不停。咳嗽亦烈。到天明六時左右，即親筆致函內山完造，請轉電須藤醫生來診治。此信原文為日文，大意是：『老板几下，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拜託你用電話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草草頓首拜十月十八日』

經須藤醫生來寓診治後，報告如下：『跪坐呼吸，顏色蒼白，冷汗淋漓，呼吸短微，熱度三五·七度，脈紉實，二〇左右，時有停滯，腹部扁平，兩肺時有喘鳴，加以應急處置後，始漸歸於良好。』結果認為病勢突變，形勢不佳。隨即用酸素注射兩針，都無效驗。呼吸仍感困難，咳嗽亦仍不止。須藤醫生對人說：『如兩日內無變化，始可脫離險境。』當時特為他請一日籍看護田島，他還深以為怪，向須藤說：『我病已如此嚴重了嗎？』須藤對他說：

『因在治療上實有設一看護之必要。』他始釋然。十八日下午二日續延松井石井兩醫生會同須藤醫生診治，其診斷報告如下：『呼吸漸緩。五十二至四十六 脈軟小一一〇至一一四，體溫下降至三十五度左右，呼吸困難，狀況不佳。晨僅吃牛奶百瓦，右肺喘鳴全無，左肺亦同，下半部經打診後 鼓鳴時作，有緊張性音調。肋間稍感陷沒，心臟下方漸趨右傾，肺動脈音，稍亢進，產生所謂 Borcím Forek's 病狀。』商討結果，即實行灌注「酸素」，期挽救呼吸之迫切狀態，但仍無效，羣醫認為病態已至絕境。

當晚復加注強心針一次，胸內甚悶，心部感有壓迫，終夜冷汗下流，不能入眠。十九日晨四時，天猶未曉時，苦悶益加，輾轉反側。但尙能以極微弱的聲息，向其妻廣平女士說『要茶』兩字，這便是他逝世前最後之一語。以後即入瀰留狀態。至五時廿五分，心臟麻痺，呼吸停止，溘然長逝。享年五十六。當時在側侍護者，僅其妻及胞弟建人，看護田島三人。先生逝世的噩耗傳出後，親友如宋慶齡，內山完造，胡風等都趕去弔唁。當時發出喪告，午前，消息即傳遍海上，各界都爲之哀痛萬分。先生生前文壇知友都集往施高脫路寓所。木刻家力羣並趕去爲他刻畫遺像。先生遺體安詳地躺在臥室靠左的一張床上，身上蓋了一條粉紅色棉質夾被，臉上也蒙着一張潔白的紗巾。揭開紗巾，他的口眼都緊閉着，一頭夾着幾根銀絲的黑髮，濃濃的眉和鬚，面容雖然瘦着一點，却並不怎麼難看。

先生死了的那房間的情形，某記者有如此的描寫！

「離床頭靠窗就是一張半新舊的書桌，上面雜亂地堆着些書籍，原稿，兩枝「金不換」毛筆挺然立在筆插裏，旁邊有一隻有蓋的瓷茶盅。這就是先生生前不知嘔去了多少心血的地方。現在顯得很雜亂。桌子橫頭是他在最近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的藤籐椅。靠上一張方桌，滿滿的堆着書；床頭床脚各有架小小書櫃。壁上掛着些木刻和油畫，有一張好像是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女士的版畫，而一張則是油繪的嬰孩的畫像，上面題着「海嬰生後十六月肖像」字樣。——海嬰是魯迅先生唯一的愛兒，年七歲，在私立大陸小學二年級讀書。這天真的孩子似乎還不懂人生的憂患，跳跳蹦蹦的十分高興。」

廣平女士則眼睛紅腫着，在嚴肅和靜穆中深深地透露出悲哀的神情。」

下午二時左右，明星影片公司得到先生死耗，由歐陽予倩，程步高，姚莘農率領攝影隊至先生寓所攝取新聞片。先生的遺體，寓所，以及生前日常工作的書案，也由廣平女士按照平日的樣子擺好了，給攝入了鏡頭。

先生在彌留時，因為呼吸困難，並無遺言。但于九月五日曾有一篇隨筆『死』發表于中流第二期。該文中除述病狀及雜感外，對於自身死後曾擬作七條遺囑：（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

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這在當時不過是文藝的寫作，竟成懺語。廣平女士就決定遵照着這遺囑去辦理喪事。

三時許，膠州路二〇七號萬國殯儀館派柩車來迎，由幾個人將先生的遺體用白布裹着昇下樓來，許多人在後面沉默而悲哀地送着。遺體移到了殯儀館，經過館方施行防腐的工作後，化裝小殮，于六時暫厝在該館二樓二號房間里，受親友的吊唁。房內空氣肅靜。先生身上仍舊穿着他生前所愛穿的咖啡色舊綢袍，上面覆着褐色綿被，上及胸際。在燈柱旁看到他的面容，兩頰瘦削，兩目緊閉，濃濃的短鬚聳在唇上。在他臉上依舊可以找出他生前的不屈的性格和永遠戰鬥的精神。在靈床的四週，放着許多花圈。

先生喪儀由其摯友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史沫特萊，沈鈞儒，茅盾，蕭參八人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一切。當日發出訃告云：

『魯迅（周樹人）先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時廿五分，病卒於上海寓所，

享年五十六歲。即日移置萬國殯儀館，由二十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依先生的遺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輓詞花圈等以外，謝絕一切金錢上的贈送。謹此訃聞。

並議定二十一日午後三時入殮，二十二日上午十時靈柩由殯儀館移到虹橋萬國公墓安葬。

是夜由黃源田軍等五個青年留在殯儀館里守夜。在夜深人靜時分，室內電燈發着柔和的光，先生安靜和平地睡在花圈中的靈床上，就像他生前睡着時一樣。

二十日。靜寂的膠州路上來往着成千成萬的青年大衆。他們都爲先生逝世的消息征住了，每一個臉上都帶着懷疑的目光，他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先生的死關於他們太密切了。可是當他們走到殯儀館門口時，又不得不都沉下臉來，懷着一腔重重的悲哀去憑弔這人間的巨人。有的在清晨七八時，就趕去候在殯儀館門口了。

殯儀館的大門上懸着一條白布橫額，上書「魯迅先生喪儀」數字。進門處設有簽字處，由招待員數人招待着來賓簽到，並爲每一個人左臂上纏上一條黑紗。因爲便于大衆瞻仰的緣故，先生遺體已在十時許移到樓下禮堂里了。禮堂由甬道折入，進門處貼着「肅靜」二大字。禮堂內前半間四壁都掛滿了黑字白布的輓聯，上面都是沉痛惋惜的語句。中有以世界語及

拉丁字書就的布額兩巨幅，對懸兩側。靈堂在禮堂西端，門首綴以法文工人讀書班所獻的松柏牌坊一座，上懸『失我良師』一布額。靈堂里的窗戶都垂着絨帘，燈光黝暗，空氣肅穆。先生遺像四週，堆置着幾十個蔡元培何香凝等所贈送的花圈。兩旁供着兩瓶鮮花，施下二條紙條，上書『魯迅老師千古』，『十二個青年敬獻』。下面是一張沙飛所作的先生的木刻像。桌上並置紙筆墨水之類。都是先生生前用品。桌旁即靜靜地躺着先生的遺體。他放下了他的筆桿——他的引導青年的手燈，而作永遠的安息了。

那天自清晨到黃昏，前去瞻仰遺容的共計五千多人，團體到的有五十多個。其中有包括文學界、藝術界、教育界、工人、學生、小店員，巡察，郵差，以及學徒等等。而尤以學生爲多，各大學且有特開弔喪專車的，亦有自遠地派代表來的。歐美人及日本人到者亦衆。宋慶齡，何香凝、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夫、暨祕書鄂山蔭亦親往弔唁。殯儀館草場上擠滿了靜待着的羣衆，他們和先生並不相識，但都感到了從沒有過的哀傷。他們失掉了他們心靈所依歸的明燈，他們覺得空虛，並且對『死』憎恨起來。『死』是那麼狠心、那麼不容情的捲走了這人海中的偶見的巨浪——美麗，強大、雄魄的巨浪。他們列了隊，挪進禮堂，像不敢擾亂了先生的睡眠似的，肅靜地致着敬禮。他們似乎在對先生的遺體致慰：他們將永遠合着隊、謹守着先生的遺言，大伙地向前邁進。

夜晚，這爲五千以上的青年羣衆帶着悲痛的心進來，又踏着堅決的步調走出去的靈堂又靜寂了。先生安睡在花堆里，旁邊仍由幾個青年睡在花香里伴着他。

那天治喪委員會並于下午二時在該館二樓集議殯殮儀節等。傍晚發表公告云：

一、魯迅先生遺體、定於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三時入殮，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二時止，仍備各界人士瞻仰遺容，並致敬意。二、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靈柩自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出發，下午三時，下葬虹橋萬國公墓。三、因萬國公墓距離頗遠，各界人士，由萬國殯儀館出發送，殯者，務請各備車輛。四、各界賻贈一概謝絕，輓聯輓幛花圈，請送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至二十二日正午截止。

二十一日上午九時到下午二時止，仍爲各界人士瞻仰遺容的時間。膠州路上羣衆仍絡繹不絕。殯儀館門口兩旁增添了大幅的輓聯，門內草場的籬笆上也亂掛滿了輓聯，多半是由文化團體送的。這天前來弔唁的，總數也不下五六千，團體則增加到八十多單位，尤以女生爲多，均穿一色之制服，排列整齊，態度靜穆。入門，由招待員引入禮堂行禮，並繞遺體一週而退。

午後三時至四時爲入殮時間，親視入殮的就祇周氏家屬許廣平女士，子海嬰，弟建人先

生，建人的夫人和子女。治喪委員會中之宋慶齡、胡愈之、及內山完造三人，治喪辦事處同人以及親友鄭振鐸，池田幸子等卅餘人，憑弔者都暫留室外。

入殮儀式很簡單，參加者分成前後四行，前排是周氏家屬，第二排是治喪委員，第三排是辦事人員，末排是周氏親友，由姚克任司儀，向先生遺像行最敬禮三鞠躬。敬禮方完畢，許廣平女士抱住了孩子突然倒在地上，哭不成聲，其他的親友也有痛哭流淚的。當時禮堂內的那種悲慘的情狀，稍閉一下眼睛，便可以想像出來。

接着開始換衣服。白紡綢襯衫褲，咖啡色薄棉袍襖，白襪黑鞋（白底），外裹咖啡色之棉衾，上覆緋色面子湖色夾里之彩繡綿被。

殮畢由廣平女士暨子撫首。建人先生暨其女扶足安置棺內。棺爲深紅色，質係楠木，製作爲西式，四週有銅環，上加內蓋，半係玻璃，露出首部，任人瞻仰。棺之四週放滿了花圈，正中有紅綢的一個乃是蘇聯大使鮑莫洛夫所送。

參加入殮儀式的人們依次向靈棺行禮，並繞棺一圈退出，禮成。靜待在靈堂外面的瞻仰者仍排隊入內致敬。

是日治喪委員會決定次日出殮的程序，發表公告云：（一）二十二日下午二時，送殮行列，從萬國殮儀館出發。（注意各界參加送殮者，無論車輛或徒步，個人或團體，請自成行列

，嚴守秩序。(二)行列經過膠州路，靜安寺路，大西路，至虹橋路。(三)下午三時半，到達虹橋路萬國公墓。(四)三時三刻，各界人士致最後敬禮。(五)四時入穴，禮成。出殯路由後經各方之提議，加以延長，擬繞道愛文義路，東行，經卡德路，折入福煦路，直西，經大西路，而抵虹橋路。俟次晨與租界當局接洽，臨時決定。

出殯行列：(一)橫額書「魯迅先生殯儀」(二)輓聯隊，(三)花圈隊，(四)輓歌隊，(五)遺像，(六)靈車，(七)家屬車，(八)執紼者，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等。至於葬儀：(一)奏樂，(二)主席團蔡元培宣佈葬儀，(三)報告事蹟，(四)誄詞，(五)演說，(六)行最後敬禮，(七)輓歌，(八)入穴。

同時並通過三種歌曲：『魯迅先生輓歌』，『哀悼魯迅先生』，和『安息歌』，將在送喪時歌唱。

二十二日是先生靈柩安葬的日子。上午八時起到午一時至，仍爲瞻仰遺容的時間，前去的青年羣衆還是那樣的擁擠。雖則有的已在前兩天致過敬禮，但他們似乎留戀着那玻璃面底下的臉形，在巡禮中時時停歇了步兒，在感受着這巨人的偉大的氣氛。

午一時五十分行啓靈祭奠，弔者都退了出來。禮堂的門嚴謹地緊閉了起來。與祭的三十多人分列數行，最先的是家屬，次是治喪委員蔡元培，宋慶齡，內山完造，沈鈞儒，再後爲

親友等。由姚克司儀，全體肅立靜默，向靈柩行三鞠躬禮。接着便由司事將棺蓋合上，親友們在這最後一瞥中再也忍不住的哭出聲來。禮成全體繞靈柩一圈而退。

這時禮堂外的送葬的幾千羣衆擁塞在草場上和大門外，膠州路上沸騰着濃厚的悲哀和煩燥的空氣。人們在指揮下開始列隊了，橫在地上的早就撥下的無數輓聯和花圈，也緊握在人們的手中了。當天練習起來的哀歌三支，到處在飛揚着，有幾個嗓子，還帶着戰士的情調。

二時光景，扶柩出禮堂，移置在柩車里。執紼者隨車而出，一起到門外整隊。

二時半，長達里許的六七千羣衆的送殯行列在音樂和歌聲中自殯儀館門前出發了。原定路線，因人數過多，改由膠州路，極司非而路，地豐路，折入大西路而至虹橋。行列前導是一幅『魯迅先生殯儀』的白布橫額，由蔣牧良，歐陽山掌執，跟着的是奏樂隊，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此後是一幅司徒喬亞所繪的巨大的遺像，布底墨畫，神采栩栩如生。後面像車中的遺像，由先生的姪女兩人恭侍左右。之後爲柩車，廣平女士和子海嬰，建人夫婦，蔡元培，宋慶齡分乘四輛汽車相隨着。後面，是執紼者，徒步送殯的羣衆，最後是有自備汽車的送殯者。同時臨時組織的自行車隊，糾察隊，救護隊在前後奔馳照料着。捕房方面也派了馬隊來『保護』。

在這偉大的行列中包含着童子軍，學生，工人，文學家，藝人，小職員等等。每一個人

低着頭，臉上凝結着一陣悲哀淒愴的情意。每一個人沉重地跨着步兒，低吁地嘆着聲息。他們在伴送着一個爲他們所最熟悉最親近的未曾會過面的人去作永遠的安息。『哀悼魯迅先生』他是我們民族的靈魂，他是新時代的號聲，……『羣衆在悲哀中振起了雄偉的情緒，哀歌不斷地在隊伍里發出來，歌聲响激了天空，歌聲震動了兩旁行列外的行人和居戶，歌聲激勵了每一個人的神經。無數的紙片從隊伍飛向兩旁人們的手裏，那紙片共有（一）魯迅先生輓歌（二）安息歌（三）魯迅先生前救亡主張（四）魯迅先生略傳四種。人們唸着那上面的字句，瞧着這一條純由民衆組成的血和肉的『鉄練』，都深深地感到了哀傷和雄偉。

明星影片公司的攝影隊由程步高指揮着，聯華的由蔡楚生指揮着，他們的汽車前後奔馳着，把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民衆們熱情激漲的波浪都用迅速的方法收入了鏡頭。

行列到達萬國公墓時已五時左右了。公墓門前已先擠站着無數的青年，在迎候着，大門上也已由一個『藝社』掛上了一幅『喪我導師』的橫額。

在一些服裝怪異的天主教徒們的注視中，大隊走進了大門。這裏雖沒有參天古木，但多少墓碑旁栽種着的樹木，都挺然地伴着死者。太陽已消失，殘留着的樹葉稀疏地蓋着雲天，枯黃的敗葉在人脚下起着碎響，老樹、輓聯、和隊伍一起在撼搖。感憤的青年遇不任悲涼，把下唇咬得緊緊地。

葬儀是在記念堂前舉行的。靈柩安置在廣道上，主席團治喪委員等站在堂前石階上，後面正中高高地掛着司徒喬亞所作的大遺像，兩面滿插着輓聯。羣衆的行列也分開站在堂前大道上。

奏樂後，首由主席蔡元培致辭，說「……要使魯迅先生的精神永遠不死 我們必要繼續負起他的責任來……」。接着「魯迅先生精神不死」的應聲和擊掌聲在羣衆中爆發了出來，羣衆的悲痛的情緒進而激昂起來。次由沈鈞儒報告先生事略，並謂「今天的葬禮是純粹民衆的葬禮」。在熱烈的要求的掌聲中未慶齡和羣衆見面了，她說：「我們要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解放運動」。掌聲和口號聲猛烈地在羣衆中響應着。次由章乃器，田軍相繼演說。後是內山完造的緊張的喊聲：「魯迅先生是個偉大的文學家，他給與日本人的印像是不可磨滅的……。他如曠野中的一盞燈……爲我們開闢一條大路……」。稻奮經羣衆三再的熱烈請求，也作了簡短的演說，他說：「別人是不能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羣衆的情緒興奮得流下淚來。

後由胡愈之代表主席團讀哀辭。辭云：「魯迅先生離開我們而永逝了。魯迅先生不單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世界勞苦大衆之友，青年的導師，中國民族解放的英勇鬥士。魯迅先生一生所企圖的，是人類社會自由解放，與世界和平，所教導我們的，是爲和平

自由而艱苦鬭爭。魯迅先生的遺體，埋藏於黃土之中，魯迅先生的遺教，却將永遠埋藏在全世界愛好和平與自由的人們的心底。參加魯迅先生葬儀的主席團和全體羣衆，包含着東西各國各界人士，老年與青年，工人與學生。在向遺體致最後敬禮的時刻，特鄭重宣言，我們決定繼承魯迅先生的遺志，與世界上一切惡劣勢力奮鬥。不妥洽，不投降，以使妖魔滅跡，和平和自由，出現在人間。

廣平女士也發表了他的哀辭云：『悲哀的霧圈，籠罩了一切，我們對你的死，有什麼話說。你會對我說：『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你不曉得什麼是休息，什麼是娛樂，工作工作，死的前一日，還在執筆。如今，希望我們大衆鍥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跡』。

以後是向靈柩行最後敬禮，並靜默誌哀。由王造時，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四人獻旗，旗爲白緞黑絨，上綴『民族魂』三字。當旗幟覆上靈柩時，人們在默默地致着哀的情緒中，感到了一個戰士的死的偉大。

這時夜幕已經下垂，梧桐樹下祇看見羣衆的黑影在蠕動着。趕着一絲殘光，人們送着先生的靈柩到東首的墓地去安葬。『安息歌』在墓道上吹拂着：『願你安……安息在土地里……』

先生就在這歌聲中被安放在墓穴里了。

淡淡的月光下，羣衆仍繼續唱着敬祝這巨人的安息的歌辭，歌聲在夜空中顫動着，漸漸的遠去，漸漸的散去。



葬後另訊

(一)

先生安葬後，治喪委員會方面表示預備做的紀念事項：(一)出紀念集，(二)整理先生的全部遺作。

(二)

魯迅先生家屬及治喪委員會，於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時，在八仙橋青年會招待此次參加送殯各界代表，及治喪處全體同人蔡元培、沈鈞儒、內山完造、茅盾、魯迅夫人景宋女士、周建人、胡愈之、夏丏尊等五十餘人。由蔡元培主席致詞，景宋女士向各界致謝，胡愈之，茅盾代表治喪委員報告治喪經過。胡風報告經費情形：(一)此次治喪費用完全由景宋女士籌出。但魯迅生前並無積蓄，版稅被書店拖欠，此項費用，應由中國及世界各國敬仰魯迅先生的羣集。雖景宋女士即席一再聲明願由家屬完全担負，但到會者一致同意由魯迅先生紀念

委員會收集各界的獻金歸還家屬。(二)治喪委員會任務終了，應成立包含各國各界與魯迅先生有個人交誼及敬仰魯迅先生的知名人士的大規模的紀念委員會，辦理一切永久的紀念事業。在正式紀念委員會成立前，先推蔡元培、宋慶齡、沈鈞儒、內山完造、茅盾、景宋、周建人為籌備委員。籌備委員應否增加，籌備會下應否成立辦事處，由籌備委員會自身決定。籌備委員會通訊處，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周建人轉。(三)李公樸、章乃器、聶紺弩等提議，全場一致贊成舉行上海各界人民追悼會。並決定由民衆團體代表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等發起，各學校團體工廠，並可舉行個別追悼會，至午後六時半始散。

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籌備會，二日下午三時，開第一次會議，到蔡元培、沈鈞儒、內山完造、茅盾、景宋、周建人，決定事項：(一)在建立正式的墳面紀念物之前，先作簡單的裝飾。(二)登報宣佈籌備會工作任務。(三)各界及各國人士對於紀念魯迅先生事業的獻金，請中國銀行代收，籌備會發出收據及回信，銀行方面由沈鈞儒接洽。(三)關於追悼會，民衆團體由各團體自行籌備發動。如欲與紀念委員會籌備會接洽，教育方面就商蔡元培，民衆方面就商沈鈞儒。(五)籌備會設秘書處，暫分文書庶務兩股。

魯迅先生逝世後，治喪會當即決定出版魯迅全集。據該會負責人表示，略謂整理魯迅遺作最合適的人選，當爲魯氏未亡人許景宋。因准許女士了解魯氏最透切，而魯迅生前對許也極爲尊重。

親友談話

(一) 宋慶齡談話

魯迅先生死後，新聞記者有以『對魯迅先生的死的感想』及『對魯迅先生身後問題的意見』詢及宋慶齡女士者，據說：『魯迅先生底死，在中國是一種重大損失。至於「身後」問題，魯迅先生生前既然爲中國民衆求解放而奮鬥不懈，死後我們便得拿他這種精神去宣揚給全國的民衆。紀念他的辦法，則是把他的那種求中國民族解放的鬪爭精神，擴大宣傳到全世界去而幫助完成他未完成的事跡和偉業』

(二) 內山完造談話

先生至友內山完造談稱：「余與魯迅氏定交已十餘年，氏之爲人，非常純粹，好好惡惡，態度分明；對於某一種人，似頗嚴格；然其本心，實甚溫和，且爲富於同情心之高潔之士。氏之一生，完全盡力於「正義之筆」，寫作無虛日，卽其日記，亦延至本月十六日爲止，殊堪欽佩。氏生前用心於中國民衆，與文化運動之發展，異常努力，今不幸溘逝，實足爲現代中國失去一偉大人物可惜。」又云：余識魯迅先生，係在一九二八年，他從廣州至滬，初住於寶樂安路景雲里內。第一次至余店內，談話內容已記不清。惟記其當時所穿者爲藍布長袍，其樸實態度，給予印象甚深。後因種種關係，曾遷於虹口公園公立學校對過之外國公寓內，前年始移住施高塔路大陸新村九號。其間曾因流言，偕其夫人避居余家二次。第一次在六年前，僅住三數天卽歸，第二次在楊杏佛先生被刺後，住余家約一星期。余等交誼頗深，惟無金錢等關係。日本文人經余介紹與魯迅先生會見或通信者，先後計有原田讓二、賀川寒彥、山本實彥、長谷川、如是閑、佐藤春夫、室伏高信、橫光利一、野江末次郎、新居格等。彼等對魯迅先生皆衆口一辭，譽爲「中國之國寶」。其著作經余介紹在日文雜誌發表者，計有一九三四年正月初大坂每日新聞之「上海雜感」、及改造雜誌之數篇散文。就中尤以「關於蕭伯納雜筆」一篇、最爲日人所愛讀。其著作經日文譯佈者、「阿Q正傳」計有井上紅梅、林守仁、山口等三種譯本。又改造社由井上紅梅譯有「魯迅全集」一書，若被書店由增田

涉譯有一魯迅選集」一種。其「中國小說史」已由增田涉譯成日文，今東京帝國大學已採爲教本，聲譽頗高」。

(三) 醫生談話

據先生主治日醫須藤五百三談稱：「魯迅先生素來自知其身體病弱，故即使略爲發熱，亦不在意；而其本人又係學醫出身，對於病症，頗具常識，故余對其治療，常感困難；渠嘗謂「如人力不濟，則只有聽諸天命」。其對生死，抱頗抱達觀，每在注射之時，決不言痛，其爲人方正不喜阿諛，今忽長逝，實深悼惜」云。

(四) 家屬談話

據先生胞弟建人謂：「魯迅生前，對身體康健，不甚留意，最近用X光探肺部，除左肺有一小部分及右肺有一狹條部分外，均已結核重重。但仍寫作如故，每至深夜不輟。故其死因實可謂工作過度所致。」

談及先生未完成之關於章太炎二三事一文的大意，謂：魯迅生前曾跟他談及馮章太炎，說是章太炎曾經下獄幾次，但他不怕淫威，仍談革命，那種精神是可以佩服的，有人因章氏

晚年思想變得腐舊，因而攻擊他，他認為這是不應該的。說是我們應該記住他的好處和優點，而不得隨便把捉住一件事來抹煞其他一切。根據魯迅生前的那話，推想起來他寫這文的動機，說不定就爲這個意思吧。

又據夫人廣平女士談：「其弟周作人現尚留平，或不南下。魯迅尚有年屆八旬之老母，亦留平。至家庭善後，尚未計及。幼子海嬰頗喜機械，長成而後，將使之學習機械科」云云。許女士並稱：「中流所刊之『死』，爲魯迅氏於痛體稍轉康復後之遊戲文字，有表示自己不會卽死之意。今日竟成讖言。」

電唁

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電云：「頃得噩耗，驚悉魯迅先生逝世，駭惋莫名。先生爲一大著作家，今遽崩頽，文壇損失，胡可殫述！尙希節哀順變，以匡一事，是所至盼。」日本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電云：「聞魯迅先生之噩耗，不勝哀悼。」郁達夫由閩來電云：「乍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祈節哀。」

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唁文寫着：「周夫人苦次。頃悉瓦先生溘然長逝。駭惋莫名，特佈唁忱！尙望稍抑哀思，不過悲痛，是所至盼。專此敬請禮安。」

華聯社東京電、中國文豪魯迅氏逝世消息傳到此間後、日本文學界、
秋田雨雀・藤森成吉・佐藤春夫・石濱知行・岡邦雄等均同聲悼惜、咸認魯迅氏文學修養
深邃、社會思想卓越、爲東洋諸國文學者羣中之明星、此次溘然長逝、實爲世界文化上之巨
大損失、現秋田雨雀等爲紀念此東洋文學巨人起見、已發起鳩集基金、爲氏鑄造銅像云。

佐藤春夫致哀悼之語

(東京十九日同盟社電) 中國左翼文學界之作者魯迅逝世之消息，傳至東京後，記者往
訪魯迅之研究者佐藤春夫於小石川、佐藤深致悼惜之意，謂余與魯迅除以文字通問外，尙無
一面之雅，然爲東洋作家之魯迅，雖受西洋近代文明之感化，然絕未因此失去東洋人之精神，
此點確爲現代一流之作家，日本尙無一人足與抗衡者。此後日本文學亦必因彼受大影響也。
余八年前曾赴滬往謁，竟未如願，至今引爲遺憾云。

蘇聯對外交化協會副會長齊耳尼夫斯基電唁：

「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中國傑出作家魯迅（周樹人）氏之逝世，爲中國文化界
與全人類之極大損失，敝會特致電唁，以誌哀忱。」

蘇聯作家協會斯塔夫斯基電唁，

「南京中蘇文化協會孫會長鑒：全蘇聯作家得悉名作家魯迅氏逝世，特致電唁，以誌哀忱。魯迅氏之寫實作品，切實反映中國民衆之生活，故對全蘇作家關係，至爲密切。九年來魯迅氏爲推進文學大衆化，耗盡心力，此乃中華民國之進步作家，堪引爲永久紀念，而尤爲吾人所極感佩者也。」